

[美]
保罗·A·萨缪尔逊
著

充满灵性的 经济学

SPRINGMAN
LINGXING
DE
JINGJIXUE

责任编辑 周瑶明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充满灵性的经济学

[美] 保罗·A·萨缪尔逊 著 胡承红 等译 邵 巖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3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8000
印数: 1—2000

ISBN7-5426-0215-2/F·43

定价: 4.90元

Paul Samuelson

ECONOMICS FROM THE HEART

根据[美]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3 版译出

译者的话

40年前，当年仅32岁的萨缪尔逊在接受由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届约翰·B·克拉克奖时，会长保罗·H·道格拉斯曾预言萨缪尔逊的前程无可估量。事实证明道格拉斯的赞扬并非过誉。20多年后的1970年，萨缪尔逊终于第一个以美国人的身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衔。除此，萨缪尔逊在学界和政界所树立的权威和产生的影响令当今大部分经济学家望尖莫及，而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则已成为千百万学子跨入经济学殿堂的阶梯。

萨缪尔逊于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地安纳州的加里镇。作为犹太人的后裔，萨缪尔逊在经济学这块领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和才能，当他22岁在哈佛大学毕业时，他的数理经济的创时代之作《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就已基本脱稿，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本书的评价仍然很高。1940年，年仅25岁的萨缪尔逊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教授，这个职位至今一直保留着。

除了在大学任教，萨缪尔逊在一生中还荣任过美国国家资源计划署顾问、战时生产署顾问、美国财政部顾问、兰德公司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顾问、联邦储备局顾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目标委员会咨询署顾问等重要职务。另外，萨缪尔逊还身兼多种学术头衔和荣誉头衔。如：国家社会科学学院会员、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国际

经济学会会长及终生荣誉会长、大不列颠皇家科学院荣誉院士等。

在著述方面，萨缪尔逊表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和《经济分析基础》这两部重要论著外，萨缪尔逊还撰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如《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交互作用》、《处于困境中的自由主义者》等），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甚至令后进末学者有萨缪尔逊无所不在的感觉。例如，他的一位学生曾将其1964年以前的作品选编了129篇，编成了两本长达1824页的《萨缪尔逊科学论文选集》；1964年至1971年的文章又编成第三册，合起来有900页之多。他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发展了一套严谨的科学分析方法，利用这套科学的分析方法修正和改写了很多经典的经济理论，并卓有成效地将其应用于生产理论、消费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的分析中。

萨缪尔逊除了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还为一般公众撰写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分析方面的读物。我们这本集子就是从萨缪尔逊连续15年为《新闻周刊》撰写的定期专栏文章中选编出来的。

与萨缪尔逊其他科学论著不同，这些文章大多以美国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为背景，娓娓谈来，全无一般经济学理论专著的晦涩难懂，却不乏真知灼见。读萨缪尔逊的这本集子，确实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陶醉。在这些文章中，萨缪尔逊极少流于纯理论的空谈，也很少廉价地兜售自己的观点，而是从一个又一个错综复杂的实际经济问题出发，循循善诱地把你领入经济学的迷宫。不管你是对高深的理论从来就感到头痛

的家庭主妇，还是虽长于理论思维，但对经济学所知不多的学者，甚或经济学方面的里手行家，都能从与萨缪尔逊这些时而如泉喷涌、时而峰回路转的娓娓长谈中获得启迪和营养。尤其是对矢志于改革事业的青年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极为难得的读物。

这本集子收入了萨缪尔逊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文章共99篇，分5章，内容涉及经济哲学、经济增长、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以及国内、国际经济繁荣的根本源泉等问题。

第1章“对经济和民主的现实期望”主要阐述了经济社会中人类的普遍动机、萨缪尔逊对现实经济体制中各种力量的评价及他所谓“混合经济”、“理想制度”的思想。他既不否认个人的合理利己性，又承认互利和社会契约的有效性；他既肯定市场的无可替代性，又提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他既肯定经济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又否定经济决定主义，充分肯定政府的、经济的、社会的、伦理的、法律的方法在解决人类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保证经济的健康增长、平抑经济周期、减缓通货膨胀是萨缪尔逊在第2章中讨论的重要主题。凡是能够维护总体经济健康发展和促进增长的办法，萨缪尔逊在这些文章中都无一遗漏地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萨缪尔逊看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供选择的宏观调节工具，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些政策工具适用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根据萨缪尔逊的观点，决策者应起的作用不是以膨胀来对付衰退或者相反，而是在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缩小这两者的背离。

在第3章“市场的优点”中，萨缪尔逊指出了自由市场体

制的优越性，分析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各自的利弊及相互结合的可能途径，并表明了他对私有经济中存在的垄断现象的立场和看法。萨缪尔逊认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完全的自由市场对策与完全的计划对策都未必能奏效，关键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收入与财富”这一章中，萨缪尔逊结合证券买卖讨论了个人投资策略及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提出了收入分配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这一章中，萨缪尔逊试图向人们指出一条谨慎而明智的投资方式：分散购买各种证券，并且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在讨论投资策略的基础上，萨缪尔逊又结合普通股票讨论了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造成资本收益率过低的原因。对于收入分配这一问题，萨缪尔逊既反对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又主张必须保持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成分。用萨缪尔逊的话来讲：要使人道的体制更富人道，但又必须使之更像竞争性市场一样地运转。

在最后一章“促进国内外经济繁荣的线索”中，萨缪尔逊着重讨论了关税保护、汇率及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等问题。根据萨缪尔逊的观点，一个国家只有遵循亚当·斯密的比较利益原则，放弃关税保护政策，才能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推进其本国经济的增长。在汇率问题上，萨缪尔逊在这一章中列举了浮动汇率制的种种好处。最后，萨缪尔逊指出，文化传统中留传下来的勤奋和节俭的美德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亦即经济繁荣的根本源泉。

本书由胡承红、宋晓非、吴钢等三位同志合译，其中第2章和第5章由胡承红译出，第1章和第3章由宋晓非译出，第4章由吴钢译出。能将萨缪尔逊的这本书介绍给广大的中

国读者，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也许未能很好地传达萨缪尔逊原作的风格和文字的精妙，而且很有可能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此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胡承红

1988年12月12日

前 言

托马斯·霍顿曾建议出版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和我的经济学专栏文章所编成的文集。我不得不同意，这对教育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弗里德曼教授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学者，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经济学的强有力的代言人。同时，他也是我的老朋友。然而，大量的保守主义言论并不能左右我的自由头脑。我必须承认，对于初涉经济理论的人来说，无论他的政治倾向居左、居中或居右，只要存在意见相左的多种学派，他就有必要了解各家之言。

虽则如此，对这一文集的出版，我还是曾有过迟疑。我对当时经济情况所作的这类分析有意包容了各派观点，以防以偏盖全。以我的观点影响读者的立场绝非我意。我的目的是想引出一系列有趣的经济学问题，而并非想把现实硬套在由简单说教所限定的扭曲了的框子里。

我从不相信经济学可以以一课而述之。这也是我犹

豫不决的原因。但是，我到最后还是默许了——不过，得附加个条件，就是不加入事后的思考，不在事后美化自己的预言，不事文饰。事实上，在编辑这本文集时，关于这些文章的取舍、形式的编排，出版商愿意负全部责任，而我的责任则在于为这些思维的结晶负责。

经济学曾经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它只告诉你何者不可为之。从学者的眼光看，这样的经济学从来算不得什么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当今一代的读者要比我们那个时代幸运。你们能够超越经济生活的量而追求经济生活的质——即超越国民生产总值追求净经济福利。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审视经济系统的长处和缺陷。你们能发现传统理论中哪部分应该被抛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发现从哪里着手进行新的探索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增加你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并能使你从中得到享受。

保罗·A·萨缪尔逊
于麻省理工学院

序

保罗·A·萨缪尔逊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在萨缪尔逊早年生涯中写下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他注重应用数学来加深并完善对经济的理解。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一书现在已出了十一版，此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由于萨缪尔逊在理论上的贡献，他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萨缪尔逊连续15年为《新闻周刊》撰写定期专栏文章，其中大约有一半已全文辑入这个文集中重新发表。

读每一篇文章，都能使读者感到好像在跟萨缪尔逊作一次简短的漫步。有的步履轻盈、活泼，而有时则只是悠然踱去。有时读者会被突然引到一个障碍物前以致累得气喘吁吁，或又为别有一番洞天而感到大惑不解。

除了敦促出版商出版萨缪尔逊的这本文集，对我来说，选择和介绍这些文章的过程，乃是与作者及作者的偏好、道德和文化反思发生共鸣的过程。这些著作的真

正拥有者是公众，他们将能发现这些著作的内在用处。
我殷切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萨缪尔逊的智慧中获得帮助和教益。

玛丽安·O·基汀
于印第安纳州南本德

目 录

1 对经济与民主的现实期望

| | |
|------------------------------|----|
| 人类动机 | 3 |
| “圣诞节”经济学随想 1974年12月30日 | 3 |
| 社会达尔文主义 1975年7月7日 | 5 |
| 爱 1969年12月29日 | 8 |
| 亚当·斯密 1976年3月15日 | 10 |
| 政府的经济作用 | 13 |
| 自由派的记分牌 1978年6月19日 | 13 |
| 纽约之困境 1975年11月10日 | 15 |
| 共和党的游戏计划 1981年2月16日 | 18 |
| 知识分子 1976年2月23日 | 20 |
| 公共选择和美国政党 | 23 |
| 阶层政治 1976年2月2日 | 23 |
| 政党经济 1976年4月26日 | 25 |
| 经济政治学 1974年11月18日 | 28 |
| 通往1984年之路 1973年8月13日 | 30 |

| | |
|-------------------------|----|
| 混合经济 | 33 |
| 给候选人肯尼迪的劝告 1979年10月15日 | |
| | 33 |
| 秘鲁的规划者 1980年9月1日 | 35 |
| 英国：不要期望奇迹的出现 1979年5月28日 | |
| | 38 |
| 美国还是首富吗？ 1975年8月18日 | 40 |
| 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了吗？ 1976年6月7日 | 43 |
| 经济与政治 1979年1月15日 | 45 |
| 经济大恐慌 1978年9月11日 | 48 |
| 民主太过了吗？ 1979年4月9日 | 50 |

2 维持增长的困维选择

| | |
|--------------------------|----|
| 经济发展和增长 | 57 |
| 是伯恩斯萧条吗？ 1975年3月3日 | 57 |
| 经济尚好 1979年2月26日 | 60 |
|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尝试 1980年6月16日 | |
| | 62 |
| 关于发展的好消息 1979年7月23日 | 65 |
| 经济周期，预测和均衡 | 68 |
| 又是大萧条吗？ 1974年10月28日 | 68 |
| 对付滞涨的政策 1973年10月15日 | 70 |
| 经济形势展望 1974年3月25日 | 73 |
| 问题和解答 1974年6月17日 | 75 |

| | | |
|---------------------|-------------|-----|
| 新的复苏 | 1975年7月28日 | 78 |
| 来自民主党人的富源 | 1976年7月26日 | 81 |
| 复苏的迹象 | 1980年9月22日 | 83 |
| 年终的问题 | 1979年1月1日 | 86 |
| 对付滞涨 | 1974年8月19日 | 89 |
| 诺贝尔预测奖 | 1980年11月3日 | 91 |
| 财政政策 | | 94 |
| 至关紧要的公共支出 | 1967年11月29日 | 94 |
| 阿尔文·H·汉森, 1887—1975 | 1975年6月 | |
| 16日 | | 97 |
| 我们应当减税? | 1974年5月6日 | 99 |
| 通货膨胀 | | 102 |
| 通货膨胀造成的损伤(II) | | |
| 1973年5月21日 | | 102 |
| 关于膨胀的谬论 | 1974年7月29日 | 104 |
| 西方温暖的秋季 | 1977年7月18日 | 107 |
| 一个新的经济方针 | 1979年2月5日 | 109 |
| 衰退: 华盛顿制造 | 1979年12月24日 | 112 |
| 与通货膨胀共处 | 1980年2月25日 | 115 |
| 控制的情况 | 1980年3月3日 | 117 |
| 滞胀(I) | 1973年9月3日 | 120 |
| 问和答 | 1975年5月6日 | 123 |
| 货币政策 | | 125 |
| 米尔顿·弗里德曼 | 1976年10月25日 | 125 |

| | |
|---------------------------|-----|
| 还是一个好年头吗? 1978年2月9日 | 128 |
| 现实的希望 1978年10月23日 | 131 |
| 美国的信用危机 1980年3月17日 | 133 |
| 经济形势如何? 1980年4月28日 | 136 |
| 展望80年代 1980年12月15日 | 138 |

3 市场的优点

| | |
|---------------------------------------|-----|
| 市场与计划 | 143 |
| 起缓冲作用的粮食储备 1977年6月6日 | 143 |
| 能源经济 1973年7月2日 | 145 |
| 石油经济 1975年9月29日 | 148 |
| 能源基础 1977年4月25日 | 150 |
| 诺贝尔奖获得者里昂惕夫 1973年11月 5日 | 152 |
| 弗兰克·奈特, 1885—1972 1972年7月31日 | 154 |
| 公司 | 157 |
| 巨型公司 1971年3月29日 | 157 |
| 企业家的伤感 1977年8月8日 | 160 |
| 评判公司声明 1979年8月13日 | 162 |
| 肯尼迪的反吞并建议 1979年9月3日 | 165 |
| 实业家日益减少的特权 1972年春 | 167 |

4 收入与财富

| | |
|----------------------------|-----|
| 财富的维持 | 175 |
| 对策 1975年2月10日 | 175 |
| 投资的奥秘 1976年4月5日 | 177 |
| 指数化基金投资 1976年8月16日 | 180 |
| 防范性投资 1976年12月20日 | 183 |
| 投资动向 1977年7月27日 | 186 |
| 悬而未决 1978年2月13日 | 188 |
| 明智的对策 1978年3月6日 | 190 |
| 谨慎而精明的投资方式 1980年2月4日 | 193 |
| 想入非非的投资方式 1981年1月26日 | 196 |
| 扼杀金融市场基金? 1981年4月20日 | 199 |
| 资本形成 | 201 |
| 卖出的时机? 1978年12月11日 | 201 |
| 资本短缺还是过剩? 1974年8月26日 | 204 |
| 股票的窘境 1979年6月11日 | 206 |
| 胜者与股者 1980年11月24日 | 209 |
| 收入分配 | 212 |
| 不平均 1973年12月17日 | 212 |
| 穿过黄金通道的黄金 1975年5月26日 | 215 |
| 失业 1976年9月6日 | 217 |
| 税制改革 1976年9月27日 | 220 |
| 福利改革 1977年8月29日 | 222 |

| | | |
|-------------|-------------|-----|
| 歧视经济学 | 1978年7月10日 | 225 |
| 社会保险 | | 227 |
| 社会保险 A-OK | 1975年4月14日 | 227 |
| 养老金筹集 | 1978年4月4日 | 230 |
| 不幸的一代 | 1977年10月10日 | 232 |
| 社会保险纳税 | 1978年4月17日 | 235 |
| 老年经济学 | 1981年3月31日 | 237 |

5 促进国内外经济繁荣的线索

| | | |
|--------------|-------------|-----|
| 自由贸易 | | 242 |
| 钢铁政策 | 1968年2月26日 | 242 |
| 新关税造成的威胁 | 1980年8月11日 | 245 |
| 汇兑率 | | 247 |
| 黄金 | 1974年7月8日 | 247 |
| 黄金和美元 | 1977年10月31日 | 250 |
| 美元本位制 | 1978年1月23日 | 252 |
| 维护浮动汇率制 | 1978年3月27日 | 255 |
| 国际金融 | 1978年10月2日 | 258 |
| 谁需要“新秩序”? | 1980年10月13日 | 260 |
| 世界各地 | | 263 |
| 富裕国家发生什么问题了? | 1971年9月 | 263 |
| 重访日本 | 1971年11月15日 | 271 |
| 两个成功的故事 | 1981年3月9日 | 274 |

对经济与民主的现实期望

萨缪尔逊与其他经济学家的差别表现在哪里？关于经济学家的治学方法，他有什么高见？在他看来政府在经济中应起什么作用为宜？经济分析的局限何在？人类的动机是什么？本章收入了萨缪尔逊写于1969年至1981年间的若干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萨缪尔逊对待这些重要经济问题的思路。

在这些文章里，萨缪尔逊不曾否认过个人的合理利己性，但他似乎在提醒自己、同行和读者们，人类常常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萨缪尔逊同意有一定限度的互利和社会契约，然而他不赞同经济决定主义，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政府和宗教活动都具有经济效益。生产趋势、收益的相对分配、通货膨胀及人均生活水准才是经济学家所应倾心的问题。

萨缪尔逊认为，经济体制具有随机性。人们并不总能按劳取酬，一些个人和群体走运，另一些个人和群体则倒霉。据此，为减少条件与机会的不平等，政府就应

介入经济。萨缪尔逊强调需要的是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受到限制的政府。他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定义是政力于提高生活水准和减少不平等的人。

与众不同的是萨缪尔逊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在民主国家里经济政策应由公众选择，而不应由某种理论和意识形态决定。或许应该这样说：他最为珍视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他也从不怀疑市场的效力。他深知，在民主社会里，少数人富有会给他们带来政治风险，但这些人得大于失，而且富者的社会地位可以使自己减少损失。在萨缪尔逊看来，很不幸，里根所采纳的弗里德曼主义将会鼓励富人，导致贫富之间差距加大。不过，在民主社会里富人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被力主理性、贤德、平等、公正的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多少冲淡了一些。

美国政党的倾向往往取决于宗教、种族、地域、阶层，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利益。中产阶级是动摇不定的，没有一个政党能垄断美国的意识形态。萨缪尔逊明确赞同混合体制，主张靠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经济问题。他不倦地告诫政治家们：走中间道路固然难，但这是唯一的出路。不管设想得有多好，偏激的经济政策对民主制度与政治家都是十分有害的。

在变化中保持连续性，或者在必要时适当地作一些调整是萨缪尔逊政策主张的特点。时光不能也不应该倒转，换句话说就是尽管自己不情愿，但也得接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宪政体制所导致的变化。时光流逝所带来的变迁在任何社会中都难以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相对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在制定政

策时应考虑到。

所有的经济繁荣伴随政治稳定是不多见的情景。进步不能消除不满，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萨缪尔逊面对经济衰退和政治不稳定深感担忧。民主社会的脆弱与无政府状态、极权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它的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威力是毋庸置疑的。

人 类 动 机

“圣诞节”经济学随想 1974年12月30日

“世上没有免费餐”。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这句老掉了牙的关于开动脑筋的代用语，此话虚实参半。

不仅在我出生后的头一年里，就连我整个的一生都是一顿长长的免费餐。社会给予我的远比我付出的要多，你也许会说我碰巧是个幸运儿，我想说的也就是如此。

我们的天赋与欠缺都是先天生就的。在每个家庭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的孩子口齿不清，有的孩子过目成诵；有的孩子生来幸运，有的则总是精神不振。特洛伊的海伦姑娘究竟是什么模样，凡此种种都是上帝的安排。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是这样。一个身高5英尺10英寸、智商为101的美国男性公民，其收入要比同等条件的中美洲人高8倍；而一个美国女性公民的智商即使比他高三分之一，其工资也只能是他的三分之二；如果他与他祖父的智商相同，他的实际收入会比他的祖父多2倍，同时，老祖父工作还得比

他更卖力气。

请注意，我这里没有用“挣得”而是用了“收入”一词。无论是庞姆波德女士的医疗顾问还是6月份才拿到文凭的博士生，凡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应该得到的与实际所得的并无很大联系。当维多利亚女王对梅尔本勋爵颁发嘉德勋章时，勋爵说道：“要说我喜欢嘉德勋章的话，那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嘉德可言。”此话也可出于一位到蒙特卡罗赌博的酋长之子的口。

共 同 体

我曾在我那本《经济学》教科书的许多版次中引用过英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我指的是L·T·霍布斯而非赫伯特·斯宾塞!)的至理名言,可概括如下:

“产业组织者们以为他们自己‘就造’了自己、创立了事业,但现在他们发现技术工人、机器、市场、和平及秩序构成了现存的整个社会体系,这一巨大机制和广泛的氛围是千百万人多年努力的产物。抛开这些社会因素连鲁宾逊都无法生存,他不会从沉舸中获救,也不具有所需的知识,剩下的只有靠草根、野莓和动物度日的蒙昧人。”

或如一位美国智者所说:“如果你把个人的观念根端化,便会产生出一种怪物,不是纳粹式的超人而是狼孩。”

这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也许你认为利他主义像勃艮第葡萄酒一样,是一项专属富人的奢侈品。可当我们考虑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时,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对自己婴儿的爱怜行为有留传价值并被保存下来。同样道理,母亲无私的爱与做个好邻居的想法一样都有存在价值,是自然

杰作的一部分。

我们，相互依存

同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相比，现代社会常把大部分资源交给政府。民主制度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交互再保险制度，当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排在领取失业补助金的队伍里时，我们都会说：“要没有供需关系的存在，我也会沦入此列的。”

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立下了这样的信条：“缴税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奉献。”虽然此人还说过“生活是绘画而不是算术”，我相信他的政治算术不会出差错的，对于霍姆斯法官来说，这不仅仅是华美的词藻，因为他像古时的雅典人一样，把自己无数的财富留给了美国人民。

在O·亨利的小说中，丈夫当掉自己的金表为妻子买了一套龟壳梳具来梳理妻子的头发，而他的妻子却忍痛割下一头美发为丈夫换了一根金表链，这样的一个圣诞节有多么美好啊！可是，倘若年年365天都是如此，那未免太过份了。政府的福利支出应根据最崇高的人道主义动机，但不是说就可以不征求意见而任意和无效地花费。政府往往也像凯萨诺娃一样，不知何时止步。

所以人们告诉我们说，在信仰、希望和仁慈这三者中，最伟大的是仁慈，智者把这个词翻译成了“爱”。

社会达尔文主义 1975年7月7日

本世纪初，美国商界的意识形态中信奉着一个赤裸裸的信条，“强权即公理”，“适者生存，并且只有适者才应该生存”。每一个幸存者往往伴以一打的消逝者，但消逝者也有其

功用,就像铁砧之于最坚硬的钢铁一样。

下面的格言是这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确切地说应该叫社会斯宾塞主义)的(产物):

- “百姓之命运乃天注定。”(威廉·范德比尔特)
- “笨伯受穷……懒汉挨饿、弱者力所不及的责任由强者承担,这些都是英明、慈悲的天意。”(赫伯特·斯宾塞)
- “绝大多数人道主义体系的公式是这样的:“甲和乙凑在一起商量应该让丙为丁做些什么,我将丙称为被忽略的人。”(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显然不是罗斯福)
- “……能够保护并帮助劳动者的不是工头,而是全知万能的上帝派来管理国家财富的基督徒。”(乔治·F·比埃尔)

上述观点首先就过不了它自身的生存关,既然据此理论大多数公民都要被视为愚者,那他们怎么还会接受这个观点呢?

社会生物学

我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新的、更有趣的翻版已出现了,我指的是有人试图根据“自然选择”这一观点来理解各群体不断变化的态度与结构。社会生物学的产生要归功于笛卡尔的三段论逻辑,即“有本教科书写关于我的事,那我就是一门学科。”这本教科书就是哈佛昆虫学权威爱德华·O·沃尔逊的那本了不起的新作,预计这本书将会受到推崇。

老社会达尔文主义曾把利他主义看作是反对优生,于是约瑟芬·肖·洛威尔奉劝慈悲的施主,如不想鼓励贫穷,施给别人够吃一天的食物就足矣。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之不同,他们重新认识了克鲁鲍特金的“互利性利他主义的存在价

值”。这个主义认为，蚁群并不按照耶稣的训导组织生活，蚁群中保卫多产的蚁后的卫士自己不能生育，它们的所做所为乃是为了本蚁群的传宗接代。同样道理，母亲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孩子活下去以便延续她的基因。或另举个例子，英雄们为了使美国民族昌盛起来而宁愿战死在佛兰德或者越南。

生 存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这一概念的启发意义。我敢打赌，企业若无节制地给产品提价，那它一定会败北。如果事实证实一种新的能源（如太阳能或风能）可广泛应用，那它可能很快就进入竞争市场。

经济学领域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安全的地带。我已预见到社会生物学家对付种族和性问题时将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你如何区分萨克利人与威尔逊人呢？如何区分希特勒分子与赫胥黎信徒呢？

想一想妇女的作用。有些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妇女因生存斗争所迫，必须留在家中以更好地照顾下一代。有这类想法的社会生物学家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再看看下面这段希望为人重视的论点，(A)从某种程度来说，同性恋是“遗传”的；(B)同性恋者的后代甚少；(C)为解释同性恋的基因何以存在，聪明的社会生物学家提出了下列大胆的假设；(D)同性恋者非常适合扮演某种社会角色；(E)他们也许因此特别喜爱其表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子女；因此；(F)互利性利他主义和自然选择把难题解决了。

再重新审视一下上一段论述，这不是存心要激化社会争论吗？上述推理链条中的每一环都可以引起疑问和争吵。有关双胞胎的资料能证实同性恋具有遗传性吗？同性恋者对亲戚特别有感情吗？等等。我们所掌握的或能够掌握的还只是一些推论和一些不完全的趣闻，它们只能触发众怒、引起争吵。

为了在智者林立的学术界生存下去，社会生物学家们对待种族与性问题最好还是慎之又慎。

爱 1969年12月29日

经济学家谈论“爱”？是的。你须知管道工人也可以写关于美景的十四行诗啊！

当然，我所说的“爱”不是古希腊爱神意义上的“性爱”，而是更加广泛的自发之爱（韦伯斯特三世将其定义为自发忘我的、自由表达的爱，施者不计得失，受者不必感恩戴德），但我不能肯定这两者是完全不搭界的，也许索姆斯·弗斯特床第之麻烦不会与他那过份的财产意识无关吧！

既然我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的头7版都没谈起这个题目“爱”，那第8版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样呢？这实在不是因为我的心肠忽然变软，而是一个事实在我头脑里变得明确了（尽管晚了点儿）：为了解释那些有待解释的科学事实，即使没有“爱”存在我们也必须把它创造出来。

乳 汁

真的没有免费餐吗？蠢话。如果说这是科学规律，那么其例外便有40亿之多。果真如此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存哪怕1星期。

弗洛伊德声称人的特性形成于早年的生活。(作为 6 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离题问一句，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不干脆分为咬齿玩具?) 如果弗洛伊德是对的，那我们都是从共产主义下发展而来的了。

正如塔尔莎大学的莱尔·欧文教授指出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共产主义，惟其较小而已。在家庭中流行的信条是各尽所能、按需取酬。好的父母决不说：“小泰姆脚跛，翅膀应该给他吃，谁能干谁就可以抢鸡爪子。”

只有到了 10 岁左右，弗洛伊德的现实规律才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时，我们在学校里也听说了远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约翰·斯密上尉的传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较之论述最佳竞争价格的另一位斯密，这简单的一课对国会议员们来说更有分量。

实际上我们正是从弗斯特的伦敦俱乐部中听见塞缪尔·巴特勒说的：“世界从来就是由个人私利主宰着的，我们不该取消它，而要尽量使粗俗者的私利与绅士的私利更接近一些。”

后来，剑桥德瑞内特学院的丹尼斯·罗伯特伯爵又把这一观点用内行的话表述了一番。在纪念哥伦布诞辰 200 周年时，他提出了“经济学家需要节约的是什么”的问题，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是爱。”因为世界上缺少爱，所以它是那么的珍贵。为了得到它我们必须作长期的努力。

贪欲之神

市场的原理已进入道德领域，除非在被围困时期，不要在如何分牛排的事上浪费爱国热情和爱情。

博弈规则告诉我们，梅西百货公司的举动可以说是将了吉姆贝尔斯公司一军，如果吉的报价超出竞争边际，梅就会因削价而获利，反之亦然。结果在这场特殊的竞争中，消费者从贪婪的竞争者之间的相互牵制中得到了好处。

博弈理论还讲了另外一种所谓的“囚犯的困境”：地方法官分别审讯 2 个犯人，他对犯人说：“不管你们是否坦白，我都有证据把你们俩关上 1 年，如果你们俩都坦白了，每人就要判 5 年徒刑。但要是只有你一个人交待，而且还向我提供你同伴的罪证，我就判他 10 年而只关你 3 个月。”

考虑之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人人皆有的自私之心使他们互相揭发，结果俩人各关 5 年；只有友爱才能使他们互不揭发而一起得到最好的结局——各囚 1 年。”证讫。

这又是个斯密上尉幻想式的传说吗？不。如果把“绝不坦白”换成“绝不污染”，你就会明白 1970 年发表的一篇经济专论为什么会强调“爱”，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必须强迫自己遵守公共交通规则。

即使用 100 条规则也难以捕捉到经济学的真谛。其实它就写在圣坛上的某块地方，那就是，不要把非市场的东西塞入市场。

亚当·斯密 1976 年 3 月 15 日

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管他姓斯密、姓布朗还是姓格林，要想留芳百世不容易，而吉塞普·沃迪的声誉在过去的 75 年里却一直在上升。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通过显微镜观测到跳动的胶态粒子的永恒运动，也就是我们说的布朗运动，从而为年青的爱因斯坦提供了有关原子、分子性质的第

一手可靠资料。

在经济学领域内有个姓斯密的伙计干得很出色。他真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之父，他是经济学领域的乔治·华盛顿，甚至还可以称为经济学界的托马斯·杰弗逊、本明杰·富兰克林及艾萨克·牛顿伯爵，他的大名就是亚当。

3月9日我们纪念了《国富论》发表200周年，1876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比《国富论》发表后的100年快得多，而亚当·斯密始终还是一股活跃的力量，今天我们仍在学习他的理论并希望它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时代精神

如果对亚当·斯密的种种说法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事实。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源于他处的时代正是政府恣意干扰经济生活的封建社会在瓦解，一种新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正在形成的时代。最近10年里，我们纪念了好多200年前发生的事情，但千万不能忘了200年前的工业革命。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有一部分来自对时代潮流的思索，但他仍不失为独具智慧的伟大思想家。正是他的经济理论在推动资产阶级秩序的形成上起了作用。

现代精深的经济学论文中充满了数学方程和统计回归，它们的成果通过缓慢的扩散才能对政治家及公众舆论产生影响。

而《国富论》则不同，它是一本生动的史册，充满了睿智的洞察和丰富的史料，可读性强，阅读它的人也确实很多，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不知道它的。如果不考虑它的影响，议会立

法及公众舆论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下所悦之，上所不齿。但斯密是个例外，他对公众和对经济学家都一样重要。大卫·李嘉图（一个自学成才的经纪人）就是从批判地阅读《国富论》开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卡尔·马克思在提出高度分工的社会制度下现代“异化”这一普遍问题上受到斯密的启发甚多，所以花了许多笔墨来评论他。

现时代的智者

虽说对斯密的评价甚高，我认为经济学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低估了他的贡献。现代均衡理论就是根植于斯密那让肤浅的人感到乏味的真正的折衷主义。他根据严酷的现实需要，抛弃了简单、教条的劳动价值理论，把组成价格的工资、利息、利润、地租等各组成因素逐个分开进行分析。

要想理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即在过去的 200 年间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工资的上涨趋势和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利率徘徊不前的后果等问题，《国富论》能提供的帮助要比《资本论》多得多。

在此庆贺之时，我想引用两段《国富论》中的话最合时宜：

- 我们不是靠着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吃饭的，他们是在自谋私利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温饱。

- 每个人都热衷于妥善地使用自己的钱财以期产生最大的价值。通常他既无意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公共事业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他只关注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就在这同时，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达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目标。通过追求私利，他往往也同时促进了公共利益，而这种做法竟比刻意追求为公谋利更为有效。

理解了这两段话的真谛与局限性，也就达到了经济学理论的至高境界。

政府的经济作用

自由派的记分牌 1978年6月19日

如果从竞选决定胜负结果，从公民投票决定纳税限额和拒购公债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反动的时代里。

瑞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这样的例子，那里的工党政府就是在竞选投票中被击败的。最近，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明确表示反对对财产税施行严格的法规限制，看来国会要实行的税收改革方案很难被接受。

我所关心的是改善生活水平而不是扩张官僚权力。减少条件与机会的不平等要比完成某个5年计划或实现某个社会改革方案更为紧要。

从那些对愿望良好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上看，有理由认为形势相当不错——虽不全是艳阳天，但绝不至于阴霾密布。

光 明 点

12年来，每年我都能收到一本国务院对世界实际收入动态的报告。这些全球性生产方面的估算是由赫伯特·布洛克博士整理的，它们包括分地区、分国度的主要产品总额与分类数据。报告的内容与新闻摘要及鸡尾酒会上的高谈阔论不太

一样。

1. 70年代实际收入以每年4%的速度持续增长，不仅普遍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比公认的作为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本世纪初发展得快。

2. 70年代中期除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外，发展中国家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相同，实际上近期内不存在所谓两者之间“日益加深的百分比差距”。

3. 比较一下东欧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到，人类无需牺牲自由以换取小康的生活水平或延长预期寿命。苏联的技术更新与资本净积累呈现出了令人失望的情景；中国大陆在其发展道路上刚刚走过了最初的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所以谁也不能判定她是否会比德国、日本及北美的早期发展阶段进行得更好；像奥地利、比利时、以色列、新加坡、南朝鲜（更不用说台湾和泰国）这样的混合经济国家和地区所创造的纪录，计划经济国家很难超过。

国内形势

历史的记载表明，自从肯尼迪—约翰逊首次对贫穷与种族歧视开战以来，美国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展。深受尊敬的联邦经济调查局新近发表了一本专题论丛——《经济福利分配》。书中所述的情况总的来说是激动人心的，这里只举其中几个重要的数据：

虽然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还有待进一步消除，但过去10年里美国黑人的状况确实有所改善，首先是黑人妇女的境况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65年后，黑人男子的待遇和其他少

数民族的待遇也有所改善,而且我觉得,很多成绩能在南方取得是一件大有希望的事。

由于大学毕业生求职人数增加,他们的工资和优越地位就有所降低了;妇女劳动力的激增在开始时使她们的工资率低于男性,但自1965年来,一些迹象表明性别歧视在美国正在被逐步消除。

白人的工资及津贴收入随其年龄增长仍处于上升阶段,相反,有色人种及妇女的收入却常在30岁时就达到了顶峰。当各类劳动力都随着年龄和经历增长而获得提升和较高工资时,我们社会的平等程度还会提高。

下一个世纪,当经济发展史学家回顾历史时,会惊异地发现消除不平等和争取解放是一个多么缓慢的过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要强调指出:历史进程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它不仅受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新法律及社会传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还必须为争取解放而奋斗——道路虽然艰难,但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纽约之困境 1975年11月10日

这是一个难写的栏目,如果一个人头脑简单,那问题该有多容易,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宣称:“就让纽约滚到阴沟里去吧,换一帮好一点的人随便怎样也不会落得这个地步,垮台不仅可以给人以教训,可以惩罚肇事者并制止将来的效仿行为,还可以从头开始走向财政复兴之路。”

同样,如果某人相信这样的指控:“联邦政府应对该城目前的困境负责,不管怎么说,‘导致危机的原因是全国性而非

地方性的’，任何波多黎各人和南方佬都可以随意地搬进城里，而任何有钱人也可以及时地搬出城镇住到郊区去，以此来逃避那些无法减轻的财政负担，把它丢给留在城里的倒霉蛋。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财力挑起目前压在城市和州政府肩上那难以忍受的重担……”，那他可以容易地坚持其立场。

对仁人智士来说，这两种观点没有一种站得住脚。在这两种极端的意见之间究竟哪儿是最佳政策的落脚点呢？下而一些尝试性的经济分析也许有助于确定可供选择的政策范围。

末日之后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垮台和失信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福特总统认为我们应相信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

然而，垮台并没有解决问题。以为把事情提交给法官就等于使纽约将来的财政事务可以合理而紧缩地处理，那只是天真的想法。眼下，我们对司法机构的曲解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正如国会不能强制推行禁酒令一样，波士顿及路易丝维尔的法官们尽管身着神圣的黑法袍，在处理学校一体化的问题上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抵抗。

安德鲁·杰克森在一次与最高法院的不愉快的冲突中说道：“既然约翰·马塞尔拿定了主意，那让他去强行贯彻吧。”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即使什么也不干，而只是像甘地或爱尔兰共和军那样拒绝服从法院的命令，那日子也够糟的了。

失信将会给政府与公共服务人员在谈判桌上造成严重的影响。所谓公共服务人员指的是警察、消防队员、教师、环卫工人。工联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工会对走下坡路的工业的加

速灭亡发挥特殊影响的过程。吹玻璃工人、铁路工人、矿工及北方的纺织工人就是明显的例子。

卡尔文·柯立芝借着粗暴地对待罢工的警察而入主白宫，然而因为自 1919 年以来，暴力活动逐步升级，所以对子一个拼命谋求连任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良策。瑞士的轮盘赌玩起来可以接二连三，可能比苏联的有趣，但两者都要冒风险，而且会危及无辜的旁观者。

纽约的问题与其市政雇员之中的不让步和低效率到底有多少联系，我从未见过有关这方面的审慎的分析；与芝加哥和波士顿比起来，纽约的工资支出可以减少几许，也许西蒙部长和其他强硬政策的倡导者们知道，但我没看到过有关这一严峻事件的令人信服的讨论。

我们不会允许纽约的大街重蹈贝尔法斯特和贝鲁特的覆辙。不管怎样，与为城市维护秩序和提供起码服务的人建立友善的关系是必须做到的。

解 脱 之 前

现在再说纽约的困难在赫德森时代就应采取控制措施为时已晚。市政借贷开支到处都涨了。

大银行持有过量的纸币会使其股东遭受很大的损失。如果事实证明了银行经理玩忽职守，那就应该迫使他辞职。但不可思议的是，经济上将遭受损失的是银行的存户。一个或多个大银行倒闭是不可忍受的，它的多米诺效应将波及全国。

不消等一切都发生，联邦政府会发现他们自己已严重地卷入了各种抵押之中。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史书中读到，威

廉·西蒙和安德鲁·麦伦一样，倒头来成了我国花销最大的财政部长之一。

共和党的游戏计划 1981年2月16日

威尔·罗杰斯过去常说：“我知道的事情都是从报上读来的。”

如果你想了解里根在经济方面的计划，读报是不会有有多大收获的。在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之后，你对里根政府的赤字是否会超过卡特政府，对1981年的通货膨胀将是缓解还是恶化仍不得要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坚决认为存在着公开的和不开公开两种计划。也许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伦敦是这样的。但正如外国间谍不无沮丧地发现的那样，以为在华盛顿官方机密遮掩之下有一个国会和政府所遵循的完整计划，这实为一个错觉。

然而，为了减少疑虑，我觉着我最好还是到华盛顿的黑箱里面去。通过出席学术顾问会议，通过与保守派及自由党派的智囊人物的切磋，通过与某些新兴经济学流派人物的交谈，以及与国会诸委员会会员的交涉，我对所谓的既定行动计划并没能了解多少。但我发现出征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可以对各种可能性作出一些鉴别。

表层梦幻

像弗洛伊德一样，先从有意识的欲望谈起。如果实际规律决定了这些欲望无法实现，就需要研究一下保守主义头面人物们所愿意做出的有意或无意的妥协。

- 罗纳德·里根企图结束通货膨胀。

- 他的目标是预算平衡。
- 他坚信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防。
- 政府这条章鱼已经开始膨胀，限制了个人自由和市场自主的空间，对这种增长趋势必须加以控制并应扭转之。
- 必须减少税收以刺激资本形成，提高生产率。税收这个再分配的制衡钟摆已摆得太偏了，根据起码的公平准则，中产阶级有权要求多保留一点自己的收入。

不管我的价值观将如何左右我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它们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选民和国会支持总统的话，那么他就能削减 10 亿美元的民用项目开支，这又使削减近乎同量的税收成为可能。从而通货膨胀的压力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是因为，资源可从公共方面转到私人手中，而且伴随减税而来的支出削减也限制了赤字的扩大。

我还没碰上一个认为这年头这个方案在政治上也是可行的人。靠吝啬度日无法实现这些目标，有一些大项目肯定会受到重大打击。

许多人会争辩道：在总统喜欢猎奇、保守主义盛行的今天，应即刻降低税率。

“如果所减少的税收大大超过所达到的节支项目，赤字肯定会猛涨并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迫使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及货币增长目标。”我要重复我的老调。

有人反驳道：“如果没有供方的奇迹，也许是这样，但如果存在这种奇迹，较低的税率反而可能带来更高的税收，赤字也将随之消失。”

然而固执的公众是不会基于对奇迹的厚望而行事的。我碰到的问题是人们几乎不相信拉弗曲线的奇迹。当然对此

事还是缄口为妙，这样人们就可以继续存在着希望以便兜售减税的计划。

基本事实

给我提供消息的人士中有一位极端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帮我弄清了财政计划何以出现矛盾。

他说：“比起现在，未来的日子更长。如果有点通货膨胀是减税的必不可少的代价的话，我们最好现在冒这个风险。到了竞选临近的1982年，我们可以把通货膨胀恶化的责任合情合理地推到国会的头上，因为他们公然地拒绝缩减开支以限制赤字。共和党人对两院有了强有力的控制，而民主党人为选民所牵制，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各个经济目标上都实现我们的计划。”

对保守主义者来讲，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政策，如果生产率和资本积累都上去了，好的；即使它们上不去，那至少你们也缩小了政府的规模；如果有些可怜的人们受到了伤害，那谁又说过生活是公平的呢？

知识分子 1976年2月23日

比利·格雷厄姆那本写安琪儿的书销路甚好，该书的内容一直追溯到安琪儿诞生之前。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他们写书只愿给知识分子看，所以销路就不怎么好。但他们读书的时候没有这种倾向。知识分子的全部爱好就是读书、写书、评论书。

有人抱怨，一个知识分子不过只是一个人，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超过了他们的人数。这种“指责”是符合事实的。

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与富豪们很相像。一个有钱人也只是一个人，然而，因为金钱能指使人，所以有权有势的人势必会在民主政治中发挥超常的影响。民众唯一的自卫武器便是在普选的情况下他们的票数能占优势。

如果不是由于在校学生不自觉地受掣于各类观念的话，富豪政治的超常影响还要大。当人们处于可塑性最强的年纪时，他们最容易受知识分子的影响——有相当一些人永远不能摆脱这种影响。

如今学生们在中学通常要读加尔布雷思的书，有的甚至是规定必须读。上了大学以后，学校又安排他们去学习像萨缪尔逊的教科书中所阐述的一类危险的说教。更有甚者，一个学生在苏里宛——克罗威尔能否谋到一个好工作，全靠他在考试中复述这些说教的忠实程度如何。正如某些哲人所说，既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们如此经常地、公然地背离那些造就美国的正确学说，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恼人的良知

让我们来正视一下我们周围那些令人讨厌的知识分子吧。他们自封为社会的良知。他们不遵守某一理性法则（立法机关将此解释为为生存面须遵守的法则），还让理性支配自己、控制自己，同时他们也企望将此加诸我们身上。

如果有什么尖刻至极的知识分子，威尔弗里多·帕累托可算一人。此人痛恨知识分子，视之为资产阶级秩序的破坏者。哈佛大学的约瑟夫·A·熊彼特亦非白领工资者，他完全赞同威尔弗里多·帕累托的观点。克里斯托、贝尔、伯克里等人在不满自身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算是新近的入伙者吧。

今天，当知识分子环顾世界的时候，他们牢骚满腹，一言难尽。在此，我只能对去年甘地夫人的政府强加给印度民主的某些限制一事略加评论。

如果以分贝来衡量抗议的呼声，那人们将看到，与对待智利压迫性军政权的态度相比，美国对印度的事态要冷淡些；而与对待苏联限制科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及少数民族人士移民自由相比，美国知识分子对印度的自由更少关心。

纠正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到了。

墨索里尼模式吗？

甘地夫人引入审查制度及对反对派领导实行监禁是以一个法院的案子为契机的，其大背景是甘地夫人原来占多数的选票减少了，而且客观上我们应该承认，一些并不热心于民主的反对势力壮大了。然而，甘地夫人指责说，“一个阴谋已在形成，它将直接造成威胁。为长远保卫民主，需要马上采取强硬措施。”这样的话是难以令消息灵通的陪审团赞同的。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便是众所周知的了：出版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不经起诉和宣判，甚至不公开事实真相就有计划并随心所欲地监禁成千上万的人。一个低效率的警察国家必然导致秘密组织的存在，而目前印度存在的似乎是一些彼此合作的秘密组织。

甘地夫人抱怨人们使用双重标准，对中国比印度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予以宽容。她没想到，正是由于人们对印度寄予厚望，所以对印度才有更高的要求，对她本人才有更多的期望。

公共选择和美国政党

阶层政治 1976年2月2日

杜利先生，这位世纪转折时期的阿特·布奇沃尔特，一定会欣赏杰拉尔德·福特的施政演说。罗杰·内森欣然要我们注意总统在演说中慷慨地引用了汤姆·潘恩的话。潘恩这个激烈的人民党员，曾被特迪·罗斯福贬为“那个污秽的无神论家伙”。

拟议的方案所吸引的是哪些人呢？最理想的是你在小企业或农场中拥有50万美元的所有权，这样即使农场马上就要卖给城里人，你仍可在已提出的财产税法中得到好处。（现行制度虽不会免掉你的纳税义务，但当你与地方上有交情的银行家核对之后，你会发现在物价每年几乎上涨7%的年代里，把利率定在7%是很慷慨的。）

这件事触发了杜利先生那奇特的幽默感。促使他留意到，财政部长西蒙一方面计划着要堵塞所有的税务漏洞，降低税率，大幅度简化税收程序，同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在大选年中把新的漏洞展示在高、中等收入阶层面前。

一般人是否可以通过买股票的形式而使其1500元的额外收入漏过税收呢？如果他有这笔钱，他会这样做的。买股票不仅可以增加资本积累，同时也会增加税收的复杂性与不平等。这项提议产生之时，正值福特试图限定最低医疗费用，以免无谓地浪费我们有限的医疗设备及人力资源。

美国的划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争论。如果你相信理性及科学方法，你将对 2 号红色试剂进行实验直到事实告诉你它是有害的；当新的证据说明环乙氨基磺酸盐的有害性比其替代物要小，你会改变对之禁忌的态度。

政治上的决策也应是如此。如果一项福利措施效率不高，结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你就该政变主意，另谋主张。

纽约市的危机，再加上近 10 年来人们因实际收入没能正常增长而不满纳税负担，使保守主义阵营增加了许多新的力量。保守主义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公营行业应缩小”。罗纳德·里根、理查德·尼克松、福特及乔治·华莱士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言人。

里根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位，他那所谓的“避开以示不同意见”的想法意味着（在逻辑上也隐含着），在美国允许任何一伙富豪们自成一团并减少他们对其他人的帮助。当然，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

昔日战火重燃

里根的逻辑必然会涉及大面积生活贫困和遭人遗弃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像被隔离的黎巴嫩和北爱尔兰一样，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中部濒临大西洋的各州、中西部和加州部分地区的飞地^①，在那里，黑人、波多黎各人、美籍西班牙人、印第安人、移民及普通穷人正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着。

纽约的根本问题在于有纳税能力的人们通常都离开了这

^① 指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译者注。

座城市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却来到或被迫来到这个“围栏”中。现在纽约的变态已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胡佛和罗斯福从前有关是否应结盟共同担负福利支出的争吵又重新开始了，历史的时钟转回到公元 1932 年。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选民已将其选票从劳工政府撤回，丹麦的福利政体已陷入危机，甚至持续统治了 40 年之久的瑞典工党也面临着国会内力量与之相匹敌的反对党的威胁。

如果民主党提名弗雷德·哈里斯，或其他某些会像 1972 年的乔治·麦戈文那样使中产阶级选民受到威胁的激烈的人民党主义者，那不管他们是对是错，共和党候选人很可能在 11 月份轻易地入主白宫。当然，人们不太可能承认这样的提名。

既然富豪是极少数，那么反动的措施肯定是政治冒险。

政党经济 1976 年 4 月 26 日

在这大选的年头里，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们都没有兴趣大肆渲染经济问题。然而在里根、福特、杰克逊、卡特、汉弗莱和尤德尔中谁能当选，这个问题确实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

见多识广的读者会注意到，我是将这 6 个最有希望的候选人粗略地按着保守的程度排列的，当然这样的排列只能是大概的，这是因为：

要从卡特的谈吐中推断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何等“解放”或“进步”是困难的。而且事实很复杂。尽管在国防事务上杰克逊可能是右倾的，但他对待国内事务的立场常是人民党主义的。

1932年时如果你盲目地听取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关预算平衡的书面意见，你对他上任后头100天的新政方案很难有所准备。但选择罗斯福而抛弃赫伯特·胡佛的选民们心里很清楚，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兴趣很明显地告诉人们谁是真正的保守分子。

不管汉弗莱和尤德尔自称是“进步的”还是“解放的”或是“折衷的”，在高失业率的年头里（即70年代剩下的几年），他们都会拥护更为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除了在国防缓和上的差别外，福特和里根都很可能选择那些阻止现代平均主义倾向的税收及福利支出决策。如果不是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中占多数从而对共和党总统施加了限制，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会更明显。

阶级利益

说到底，美国政党是以阶级的界限来定的，要么代表有产者，要么代表大多数无产者。汉密尔顿·亚当斯·麦迪逊和杰弗逊认识到这点甚至先于马克思。金钱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一切。除此之外还有宗教、种族、地区及社会阶层（社会阶层是与收入阶层有区别的概念）。

从政党由经济利益决定这一观点来看候选人立场的划分是有意义的，一个民主党人对富豪们来说比任何一个共和党人都具有更大的威胁。但要记住，总是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处于中立状态，不知道自己的经济利益应属哪一边。正是这些摇摆不定的选民才是必须追求的对象。

有产阶级的政党为什么总要寻找一位有吸引力的领袖（如迪斯累利、丘吉尔、艾森豪威尔），以使广大群众不至一

再要求动用政府力量为自己谋利而牺牲富人们的利益，原因就在于此。

许多人是应召来充当这一角色的，很少有人经过挑选。1964年，戈德华特——这个右派的宠儿——把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都吓跑了。罗纳德·里根目前正处于同样无能为力的状态中，在竞选获胜之前他应闭口不谈削减联邦政府福利方案的事。他对苏联的不信任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共鸣，但他们却不愿因一位鲁莽的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而提心吊胆。也许里根天生的作用就是使福特显得更稳健更精明吧。

老罗斯福的魔力吗？

我所举的例子也适用于民主党提名。千万别因民主党看起来可能威胁到摇摆不定的中间阶层的地位而使中间阶层敬而远之。4年前使尼克松实现竞选中的压倒胜利的麦戈文从而成了尤德尔的复仇者。

杰克逊能吸引的是哪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呢？也许是从1978年尼克松的支持者中分离出的犹太选民。他在工会中的选民看来不太可能倒向福特。

这里，汉弗莱必须意识到吉米·卡特的力量。像罗斯福和肯尼迪一样，卡特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已显示出可能从下面4个方面拉到选票的能力：(1)黑人，(2)华莱士的支持者，(3)普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4)1972年投尼克松票的民主党人。

说卡特能使所有的人满意你也许会反对。准确地说这只是我的观点，同时我想也是卡特的观点。那他会成功吗？

经济政治学 1974年11月18日

为了有助于了解1974年选举的内情，我与一位有趣的共和党朋友进行了一番谈话。让我们随约翰·亚当斯的姓叫他亚当斯吧。他无需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富人与穷人之间重新出现了阶级斗争，以及政党的存在是为了代表这些对立的利益。

首先，我请他就尼克松政府作一总结。他答道：“比赫伯特·汉弗莱政府要好一些，当然在所有方面都远远胜过乔治·麦戈文。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我过去要为每1美元收入付77美分的税，这就难怪我一直逃税，每1美元仅付50—60美分。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只有我注意到税率减了，以至没人需要为1美元的收入付50美分以上的税金。闷声发财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战 术

作为一个固执的学究，我又提出了一个异议：“这话不错，可如何看待尼克松执政期间根据社会保障利益而调整的价格指数？它对中低阶层的帮助比对你们要大啊！”

他答道：“言之有理！但你可千万别忘了中产阶级比富人多。我们必须有所失才能有所得。”

我问：“那么总的说来，尼克松的任期还相当不错了？”

他答曰：“你错了，水门事件后，尼克松就是个失败者了。依我看来，取缔尼克松是必需的。如果我没有学会知难而退的话，我便不可能在如此动荡的生活中取得这样的成功。在这方面，我要说即使洛克菲勒的证词侥幸通过了，1976年

的总统竞选他也毫无希望。”

他的玩世不恭几乎超出了我能忍受的限度，所以我赶忙转问一个较安全的话题，谈起杰拉尔德·福特，希望能听到他说换了个开明的总统是件好事。

亚当斯还是不改其初衷：“不妨以共和党的行动计划为背景来评论福特。1972年的压倒性胜利乐极生悲，国民生产总值受到了过分的刺激，因此，1973年必然成为衰退的一年。

“然而到了1974年，爱丝、西蒙、斯坦因和格林斯潘却劝总统通过给经济降温向通货膨胀宣战。结果：在他率领全党开始竞选时，失业率超过了6%，并且在投票日之前还在快速地增长着，汽车和住房目前成了一个灾难领域，衰退的疾病已蔓延到了早先经营得很好的钢铁、造纸、铝制品、资本货物等部门。”

总是急于为安琪儿们辩护的我忙跳起来捍卫政府的专家们：“无论如何你不打碎蛋壳就不能摊鸡蛋饼。假如眼下的损失到明年夏天确实能使通货膨胀率减少一半；假如到那时我们真的从谷底走出；假如到1976年总统竞选时，经济已经强有力地发展了整整一年，这对共和党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吗？”

亚当斯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假如、假如……你们这些学究的问题就在于不能充分地认识风险。也许事态的发展会如你所说的那样，但也可能不会。1970年春天尼克松的顾问班子告诉他，到了秋天退货膨胀就可望得到解决。那时共和党就会带着玫瑰花香参加1970年的竞选。但那回他们还是错了。这回也一样，他们可能对也可能错。我曾让我公司里的经济学家作过一个调查，看看长于预测的经济专家如何预

测在容许衰退发展引起成本增加时，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能带来几许利润回收。低通货膨胀率容许衰退，代价不言而喻。他的报告是每增加 100 万失业工人只能减少很小的通货膨胀率。”

战 略

我感激亚当斯为政府提出了一项可执行的建设性方案，他选择了比较安全的办法：

- 马上开始与衰退进行斗争
- 刺激住房建设
- 逐步增加随意选择的联邦支出
- 不张扬地征收附加税
- 严厉批评通货膨胀

我告诉他这不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药方，而且不一定有效。

最后他说：“我们还有秘密的武器呢，那就是民主党。”

通往1984年之路 1973年8月13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年代里。时代召唤着沃尔特·李普曼，而我们当中却只有比尔·巴克里及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式的人物。在他们左边的有马尔库塞派，右边的有哈耶克等人。

为什么“水门事件”的听证会没给人带来什么愉快？人们本以为总统崇拜者的不快被总统的评论家的幸灾乐祸抵消了。为什么华盛顿没完没了的内情披露引起了人们如此的不安？这是因为我们已从电视屏幕上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希特

勒的面孔。用非常流行的钦译《圣经》上的话来说，法西斯只不过是地平线之上的一块没有巴掌大的阴云。但如果乔治·奥威尔还活着并嗅出孳生在左派与右派中的法西斯主义的迹象，他会敲响警钟提醒人们看清《1984年》一书中所述及的危险。

一对孪生错误

当纳粹还在横行霸道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把罪恶归到希特勒周围的人的头上。“元首没错，要提防的是格林和戈培尔。”——有人以此为借口。

目前也存在这样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有些人把属于政府日常工作程序中的差错归罪于像厄里奇玛、米切尔、霍尔德曼或迪安那样现成的替罪羊或里迪、亨特、斯坦及时下随便哪一个无赖的头上。

事实完全是两码事。当基辛格博士着手写回忆录时，他不得不在前言里写上那些作家们爱用的、空洞的表白：“外交政策上任何过错均由我一人负责，所有的成绩和荣誉应归功于尼克松总统。”人们是不会对这种表白当真的。

上面我已谈到了那些想为尼克松总统贴金的人。还有很多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电话窃听、侵犯人权、偷税漏税等缺德行为和严重罪行归结为总统本人的坏习性和人们所传的总统心理上的不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家伙，一个妄想狂”。正是此人在“水门事件”上凑巧被逮住了；正是此人，1946年击败杰里·沃勒斯，1950年击败海伦·加哈甘·道格拉斯；正是此人，在麦卡锡迫害共产党人时开始成名，并凭借编排好的电视道歉而免遭政治上被遗忘的

厄运。

我发现这是一种肤浅的分析，事实也许更加令人不安。如果说我们的麻烦仅是由桶里的一个烂苹果引起的，那么，我们把它拣出来扔掉，就可以正常地继续政治生活了。

时钟倒转

当我们在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时，我吃不准知道这一秘密的亨利·基辛格和梅尔文·莱尔德是否把总统看作疯子，就像阿道夫·希特勒的许多助手看希特勒一样。我要问一问，理查德·尼克松是否比已故的J·埃德加·胡佛更为心理反常？我还没看到什么证据能说明他比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更鲁莽和傲慢。我认为理解政府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尼克松先生不是一个只追求选票的家伙，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有理性的人，而非主要受了机会主义的毒害。

不幸的是理查德·尼克松所信奉的原则只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所以如不偏离标准的民主程序就不能将之强加于整个国家。旧时所追求的在低水平上保持预算平衡、政府把关键的经济决策留给市场的信仰与其说是美国人的信仰，不如说是比利·格雷厄姆追求的标准，或是美国式的宗教观。

30年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了一本名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书。虽然书的主要论点错了，但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哈耶克派坚信，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不一定是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险制、劳埃德式的税制改革或罗斯福的新政所产生的后果。

尼克松的班子希望把历史退回到新政之前的日子。如果国会和能表达思想的美国人从中作梗的话，总统那可畏的权

力必须被用来消除障碍。

人们说我们应感谢“水门事件”，因为它说明美国的制度能有效地改革自身的邪恶。这是胡说。但至少这件事阻止了总统行使那个从未授给他的权力。

混合经济

给候选人肯尼迪的劝告 1979年10月15日

给肯尼迪家族提供经济咨询是贯穿我一生的事，积习难改。

最开始我是给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提供咨询，接下来是为候选人及获民主党提名的杰克·肯尼迪效力，并组织了一个专门工作小组研究经济状态，为总统竞选服务。与摩西的情况相似，我无缘进入白宫这块乐土，我有别的义务。但是我能充当一名圈外的出力者，支持圈内的全部由名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些名人是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及已故的克米特·戈登。因此，当博比主任吹响哨子，召唤其下属命令我放弃纯粹的经济研究，去为那桩伟大但不长久的事业出谋划策时，这就十分自然了。

第一次受邀前去帮助竞选

对特迪·肯尼迪来说，我的资历是不错的。在政界里早露头角很重要。回想起1962年，当年轻的爱德华·肯尼迪第一次召人组成竞选办公室时，我是马萨诸塞州支持他竞选参议员的6个学者之一。

朋友们问我：“难道你不知道肯尼迪 30 岁就有机会在参议院任职是因为他的姓氏吗？”我当然知道。但我指出了伟大的威廉·皮特之所以没能成为英格兰的首相，是因为他那双孩子般的蓝眼睛。我自己需要吃准的是“爱德华·肯尼迪能否成为一个出色的参议员，他能否很好地利用幸运带给他的优势？”

肯尼迪在参议院那 17 年杰出的经历超出了我最乐观的期望。我希望 20 年前所下的赌注能换来优厚的红利和资本收入。

现在让我谈一下我给肯尼迪参议员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涉及对他为 1980 年竞选所进行的咨询。

你应该抢先在经济政策上占领主要地位。 1964 年戈德华特和 1972 年麦戈文的竞选活动已指明了哪儿可能失败，千万要避免重蹈覆辙。

这不是教唆投机，这是依据政治上的可行性尽可能地完善人道事业的冷静的方案。

综合医疗保险既能满足实际需要又可在选民中引起心灵的共鸣，而你肯尼迪的名字恰与这一善举结合在一起。但中产阶级确实仍然感到忧虑，害怕在这通货膨胀的年代又得为公共服务交纳更多的税。目前尚不完善的制度已使医药费上涨。制定战略计划来控制整个系统的费用不仅是一项好政策，对经济状况和道德准则也有裨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当前缓慢的经济增长归罪于卡特先生。使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加速毕竟不是儿戏。但是人们恰到好处地采取了应急措施以保证控制住衰退。为此连华尔街也会举杯庆贺的。如果小城镇的居民知道联邦储备委员会不会像往常那样长时期地紧缩银根，他们可以睡得安稳些了。

所以我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是：避免过分的哗众取宠。保持一定的美元汇率并非最终目标。有必要注意实际的偿付能力及美国的工厂和工人的能力能否顺利地发挥作用。现在美国的生活显得不错。的确，我们 1970 年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着实使德国人和日本人羡慕。

在左的方面，要尽量避免短时期解除强制性价格及工资控制。1971 年 8 月，这些控制确实在政治上帮了尼克松的忙并在 1972 年竞选中保证了本来就很可能的向着他的压倒胜利。但尼克松在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B·康纳利怂恿下所播下的导致对经济猛烈冲击的祸种却要由福特总统和我们全国老百姓来承受了。

能源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储藏能源以备后用是绝对必要的，我知道要做到这点只有提高石油和汽油的价格使多数消费者买不起。

连最愚蠢的共和党人也清楚这点。政治家的问题是要通过设计一种社会契约来分享责任和好处，使选民们自觉地意识这一生活现实。作为民意测验的领先者，你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设计一个帮助最贫穷者的方案，以及向那些幸运儿所发的横财征税，以期结束在能源问题上所形成的政治僵局。这样说，就几乎没有一个共和党人能理解了。

不偏不倚的折衷之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在 1980 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秘鲁的规划者 1980 年 9 月 1 日

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从南美传来坏消息。例如智利日益严重的犯罪现象，玻利维亚发生的又一次政变否定了它最近

选举的结果，还有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恐怖主义活动。于是我更渴望亲眼看到今年夏天在秘鲁重新建立的民主。

秘鲁的军事政权持续了12年之久。在1968年的一个早晨，坦克车开进了总统府，秘鲁总统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被人从床上赶起来并被送上了一架飞往阿根廷的飞机，他的大部分重要官员只好偷渡国境以免陷囹圄。

这件寻常事件中的不寻常的地方是政变者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不代表右翼而是代表左翼的思想。秘鲁所谓的80家寡头集团的大部分财产横遭没收，由此他们的权利也被剥夺。像大通曼哈顿银行那样的外国投资机构在未经还价的情况下被收买了。大批土地的所有权在各工人合作社之间划分。国家扩大了其在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控制方面的作用。

经济混乱

遗憾的是只有崇高的目标还不够。开头的狂欢阶段度过以后，秘鲁经济开始垮了。贝拉斯科将军被免职，另一位煽动性差一点的将军代替了他。尽管他们幸运地发现了石油，可1975年以后实际工资和收入还是持续下降。

被拉了美洲的标准，秘鲁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一直还不错。后来由于政府印制货币为巨大的财政赤字筹资，通货膨胀才开始加速。外债最终也赶了上来，在经常拖延偿付外债的国家名单中也出现了秘鲁的名字。

在这方面，武装力量似乎急于管理经济。最近秘鲁发生的第二个惊人之举是，今年5月，军队允许进行自由选举，并很有风度地默认了前总统贝朗德及其中立的人民行动党在民

意测验中所取得的压倒胜利。

贝朗德是一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他的流放时期是在哈佛、约翰斯·霍布金斯、哥伦比亚和乔治·华盛顿等大学度过的。作为一个爱幻想的空想家，他对群众有极强的吸引力。他在公开投票中，以占总数 45.3% 的选票战胜了 8 个对手，这在拉美国家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绩，使即将下台的军政府大为吃惊。分裂为亲北京派、托派和其他派系的马克思主义党派一共只赢得 15% 的选票，这个比例与他们在工会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实际力量很不相称。

民 主

很明显，人民已厌倦了军事统治。现在他们能随便地评论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享受着难以忘怀的民主气氛。

“眼下的蜜月能持久吗？”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最近去利马和安第斯旅游讲学时，也向遇到的许多秘鲁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

看来局势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下面是一些有利的因素：

秘鲁有可供长期开发的有利的自然资源，如可用以发电的水力以及铜、银、铅和锌等，还有未来发现丰富石油的可能性和刚刚开发的在喷汽机时代发展旅游业的潜力。

即将下台的军政府通过以优惠的价格出口铜、银和石油，已在 1970 年还清了全部欠款，使国际收支扭亏为盈。

如果贝朗德是唐·吉河德的话，那么他的新总理曼努埃尔·乌略斯便是桑乔·潘萨。新内阁的许多官员是最近从流亡中返回的。作为内阁领袖，乌略斯必须努力把现在每年

60% 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 40%。这会很艰难，而同时又要减少对国内消费者的补助，这项补助以世界实际价格的三分之一向秘鲁消费者提供石油。

最令我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层次。执行玛格丽特·撒切尔或智利“芝加哥少年”式的紧缩政策肯定行不通。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虽然难走，但依我看是唯一的出路。

秘鲁人民靠不切合实际的希望是不能成功的。让我们祝愿民主给秘鲁带来福音吧。

英国：不要期望奇迹的出现 1979年 5月 28日

英国工党的惨败所引起的轰动已平息下来，分析家们正在研究撒切尔首相及其竞选班子成员的个性和思想。她和担任新工业部长及立宪制政府代表的基思·约瑟夫爵士上任后还会坚持他们在野时所提出的苛刻方案吗？

当很多人都把眼睛盯着医生时，我想仔细观察一下英国经济这个病人会有好处。当我们在诊所里看到这样一个病例，病人不是全身病症恶变，而只是身体麻痹却又找不出结构上的原因，这时我们往往更期望能有奇迹般的治疗方法。

很明显，英国是一个相当穷的欧洲国家。现在巴黎、斯德哥尔摩，甚至米兰都呈现着蒸蒸日上的景象，而伦敦却有一点破旧不堪。这已不是新鲜事了，20年前就有许多欧洲国家把大英帝国抛在了后而。自1960年起英国较低的实际增长率扩大了她和其他欧洲福利国家之间的差距，荷兰、法国、瑞典的税收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英国要高，但他们的生产率却还是比英国增长得快。

令人泄气的诊断

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们对英国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只看到不景气但没有看到显著的衰竭。实际上供血不畅的诊断比恶性贫血症更令人泄气。我认为布鲁金斯得出的结论更证实了早先的判断。

果真如此的话，那这一发现是很重要的。它说明人们不应指望会产生与艾哈德奇迹相媲美的撒切尔奇迹。1949年，路德维希·艾哈德大胆地解除了德国对物价和工资的限制，使企业大大扩展，物质生产猛增。

目前，英国也缺乏产生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3 年的精神奇迹的条件。如果病人不是垂危而仅仅是缺乏活力，懒散呆滞，那他是不可能神奇般地复兴的。

哪一段历史经验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呢？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竞选胜利地结束了长达 20 年的新政统治。艾克的政府确实使经营界从沉重的税务下得到一定的解放。但这并没把我们带回到赫伯特·斯宾塞那所谓“人吃人”的世界里去，或赫伯特·胡佛所说的发疯的个人主义的世界中。艾森豪威尔的班子由于缩减公共事业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他执政期间，起码有过 3 次严重的衰退。作为降服通货膨胀的结果，美国的平均实际增长率降为 2.5%。

这不是说撒切尔的胜利没有意义，不会带来什么变化。最近几年英国的情况实在不佳。我认为国会中有决心的托利党多数派将会改变政府支出和税收的趋势。修枝剪权的园丁懂得虽少胜多的道理，只有能经得起严厉检查的福利方案才是值得的，最近几年，并非所有的首创性工作都能经得起以成本—收益为依据的推敲。

英国把最高边际税率定为 98%，而同时又有许多漏洞使人可不用付税。即使我的立场比较开放，比较民主，我也觉得这是荒谬愚蠢的。卡拉汉当首相时的一大功绩就是把每年超过 25% 的通货膨胀率减少了一半。要想借货币政策再次将其减少一半，这个过程不可能没有痛苦。

路怎么走呢？

“确保稳妥”是费边主义左派所奉行的策略。其实有产阶级右派不妨也采纳这一策略。

在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地方，保守党派在竞选中的胜利已结束了社会—民主党派统治的时代。我注意观察了以后几年的生产和价格指数，我无法说这些国家有何显著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政府会丢职或甚至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会失去支持。

变革中保持连续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重要。如果英国工会向新政府大打出手，那将是个悲剧。黎巴嫩和爱尔兰的教训已告诉我们，国内冲突对国民生产总值将产生何等致命的打击。

如果热衷于恢复自由市场而引起阶级冲突和罢工，那将是一大错误。本杰明·迪斯累利是一个保守派领袖，他深知政治市场的承受力。让我们祈望玛格丽特·撒切尔能继承他的一些精明和迪斯累利那传奇般的运气吧。

美国还是首富吗？ 1975年8月18日

如果某位学者能建立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那他就可以赢得很高的声望。本世纪初，弗里德里克·杰克

逊·特纳认为,开拓新疆域在美国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

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已故的大卫·波特尔称此为丰饶的土地。美国的文化就是在自诩的世界首富者的形象上建立起来的。亨利·福特和大卫·克罗克特比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更被视为我们典型的英雄。我们怜悯那些异邦人,他们缺少我们这种蓬勃的朝气、自由的机制、美国精神、各种智慧的融汇、以及疆土上充裕的人均资源,故他们亦缺乏建立我们这种生活所依赖的财富。

身为首富也有它的烦恼,那就是怕被别人超过。这里我指的不是由于幸运地发现了石油并结成出口卡特尔而使自己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好几倍的古怪的阿拉伯酋长国。说到底,在休斯顿、曼哈顿及格雷斯—波音特,我们也有一些收入奇高的地区。

暴发户的传说

我指的是瑞典、瑞士甚至联邦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正逐步超过美国的不祥传说。如果说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营自由使我们富强起来,那么旧大陆那些衰老的、政府对经济施加干预的国家何以在基本方面会超过我们呢?有人预言,若干年后日本等国将赶上并超过美国,就像现在他们已把英国甩在后面一样。从这里我们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在解释事实之前,先让我们弄清真相。当福尔摩斯要了解一种罕见的有毒生物碱的性质时,他知道应向哪一位法医学教授请教(当然是爱丁堡的那位教授)。如果我想知道各地区收入的比较情况,我就去找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欧文·克拉维斯教授。为了深入进行他20年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

国家所作的经典研究，他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3 位同事一起，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与联合国统计署共同调查分析了 10 个国家 1970 年的物价。他们最近出版的《总产值与购买力国际比较方法》一书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信息。

虽然此书没有直接研究瑞典与瑞士的问题，但根据特拉维斯的同事罗伯特·萨默斯博士和苏丹·阿迈德博士在一份提交给经济计量学会的报告中所载的计算结果，我的结论是美国仍居第一位。按人均收入算，瑞典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七、瑞士为五分之四、法国和联邦德国为四分之三、日本为三分之二、英国为五分之三、智利为四分之一、印度大约为十四分之一、肯尼亚只有十七分之一。

过去已成为历史，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呢？

通向平庸

不管我们是否听从撒切尔·佩奇的不要回头看的劝告，但几乎人人都在向我们逼近。1950 年以来，我们的手下败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人均实际增长率是我们的 2 倍，法国的增长率比我们高三分之二，即使是我们很同情的英国，1950—1970 年间的增长率也比我们高 10%。说来奇怪，到了 70 年代末，它的资本投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2%，而我们还不足 19%。

有人会认为，更多地重视计划可能是成功的关键，而阿布拉姆·伯格森教授在哈佛的研究，却使此类想法可以休矣。该项研究表明，将“经互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实际收入相当的混合经济国家相比较，在 1955—1967 或 1950—1967 这样的时期内，政府干预经济的国家平

均增长水平并不高。

道理很简单却并不令人伤心，跑在前面的很容易被撵上，这是常见的，甚至是自然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熵及混乱程度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得克萨斯的增长快于纽约州，达拉斯快于波士顿，而斯巴达则快于雅典。

当然，山姆大叔，还有基辛格博士必须意识到，在美国拥有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1975年，它已不像1945年那样有作为了，那时美国拥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了吗？ 1976年6月7日

约瑟夫·熊彼特曾把现代混合经济的特征表述为“氧气帐中的资本主义”，1942年，熊彼特首次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一书。如果此后他能再活25年的话，我想他一定会被这病人的活力搞得惊诧莫名。

就整个世界来说，20世纪第三个25年的成就是足以使经济史上任何时期的业绩黯然失色。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总产出的增长速度这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莫忘记看看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富有戏剧性的成就是日本、联邦德国、以色列及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加拿大紧追其后。熊彼特对祖国奥地利所取得的飞速进展肯定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在他看来，法兰士·约瑟夫皇帝去世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熊彼特主持的战后财政部的崩溃已敲响了奥地利的丧钟。

较小的奇迹

我知道，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宽是一种时髦的说法。如果你看到了人类的理想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海地及亚、非、拉许多前殖民国家现实之间的差距，你就会认识到短缺的严重程度。

然而，即使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也出现了新加坡、香港、台湾、泰国、墨西哥的成功，伊朗、委内瑞拉、波多黎各、巴西和尼日利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很大发展。如果你们把这些事实都仅看作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幸运政府促成经济繁荣的例子，那我必须提醒各位，美国之所以昌盛，并非仅仅因为我们美国佬长着“瓦蓝色的眼睛”。

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曾说过，如果他参与造物，他会把一切都做得更好。尽管我希望最近数十年来更多的进展能发生在最急需的地方，但必须承认，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穷国家的进步比战前加快了。比起法国和德国，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些令人失望，但与本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相比，情况还可以。

乐极生悲吗？

是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混合经济偏离了幸运的轨道？是不是本世纪最近 25 年的前景很黯淡？

引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全球性的衰退，也不是欧佩克将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罗马俱乐部将石油价格的猛增视为马尔萨斯匮乏时代到来的第一信号。然而凯恩斯有关混合经济的方法尚可谓有效地抑制了致命的衰退。法兰克福、芝加哥及斯德哥尔摩的灯光是不会很快地熄灭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由于阅读了当前一些由欧洲财政金融出版界出版的悲观评论文章。同时用几种文字印刷的《视野》期刊 1976 年 5 月号，给出了下列一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据。

- 对 16 个欧洲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资产所有权进行的考察，发现国家所有的比例已占了 40%。还要补充一点事实，在德国、瑞典甚至美国，董事会中已出现了工人的代表。

- 丹麦、德国和西班牙政府目前分别占有国民生产总值的 40%、39%、22%，而其中有一半是用于福利目的（如退休金、医疗卫生等）的，10 年前这个数目分别为 36%、33%、16%。

我不想把这些类似的事实都解释为哥特达摩内的预兆，难道西班牙比荷兰和德国更稳定吗？西班牙的模式是更值得羡慕呢还是更值得畏惧？

市场可对盘尼西林和口香糖、警车和凯迪拉克作出反应，公司管理人员完全可以像与少数资本家相处那样与少数工会分子共处。

莫若先把鲜花或丧服都收藏起来，因为现在尚不是评论功过的时候。

经济与政治 1979 年 1 月 15 日

非经济学家常常会夸大经济学的作用。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要否认印度明年的收成会对其亿万百姓的饥饱和苦乐起决定性的作用，也不是说 70 年代若以经济的重大衰退告终，我对美国人的苦衷不以为然。

我很乐意研究那些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学问题，如生产趋势，

收益水平、国民收入中工资的相对分配、物价水平上的通货膨胀、人均生活标准等。但很多人在这些问题上走得更远，他们最终发现，社会行为、政府的权力关系、甚至宗教信仰的背后都有经济的基础。

“只有当资本主义灭亡的时候，妇女才能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解放，反犹太主义才能同精神神经病一起消亡。如果每个人都有面包吃，人们就无需乎去偷或想到去偷。”这是我以通俗的语言表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昂·托洛茨基、保罗·伯兰恩等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思想。

我现在并不关心经济决定主义的主要理论是否合理，我想知道的是伊朗国内的骚动与其近期经济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财力表决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恶化的经济条件导致了政府垮台并使社会立法翻开了新的一章。1929—1932年的大萧条无疑使得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广泛的失业、破产和银行倒闭，连中产阶级也逃不过经济崩溃的厄运。选民们按美国的标准变得十分激进，聚集在迄今仍占优势的新政福利政府周围了。

我们有理由假设，在失业率高达25%的30年代的德国，如果魏玛共和国能坚定地实行反周期循环的稳定政策，阿道夫·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上台的。如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0年而不是193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能避免。

然而，再看一看其他一些事实，情况就变得复杂了。法国大革命是在欧洲最富而不是最穷的国家爆发的。已故历史学家克兰恩·布林顿对此曾强调，真正太饥饿的人反倒失去了造反的热情，而从较优越的生活水平跌下来却常会导致难以抑制的不满。

本世纪上半叶经济学界的巨人约瑟夫·熊彼特指出，维多利亚时代卓越的经济成就并不能使其摆脱人们的不满。理性主义在给我们带来蒸汽机和电的同时，也带来了要求普选的执意主张。这一改革带来了收入再分配和费边式的社会主义。狄更斯笔下的奥立弗·退斯特想要的是“更多”，这就把问题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石油并不充裕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曾研究过物质进步能否促进人的幸福感。其结果表明，就业者比失业者愉快，新近长了工资或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人也会感到愉快一些。物质上的进步确实可以使人在短期内感到幸福。但伊斯特林认为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比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更加幸福，尽管我们的收入要比他们多得多。

现在让我们来解开伊朗的迷团吧。伊朗能够成为在最近10年里由落后而突飞猛进的国家之一，完全是因为意外地发现了石油。伊朗国王是伊朗的斯大林。尽管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情况一样，伊朗的收入分配很不平衡，但其实际收入增长之快是美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因此，进步可以减少不满的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事实证明，熊彼特的讥讽倒有一些道理。正是国王的巨大成功

推动了他的失败。

唉，人们想不出有什么罗斯福、马萨利克、尼赫鲁，抑或凯末尔·阿塔特克那样的人可以取代伊朗国王，以便在伊朗营造起瑞典式的乐园。

经济大恐慌 1978年9月11日

“又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在降临”，罗伯特·H·海尔布伦那这位不可多得的风趣的经济专栏作家以这句戏剧性的话开始了他的长文。此文发表在《纽约人》杂志上，专述经济繁荣与衰败。

如果海尔布伦那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在这始于秋天的经济年度里，还有什么信息比他的话更重要呢？既然接替垄断资本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也要让位于日渐走红的计划资本主义，我何必还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本世纪最后25年的贴现率政策大伤脑筋呢？既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至高权威将不复存在，我何必还琢磨其储备趋势呢？美国可能正受着50年一度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煎熬，而我学术界的同仁却忙于为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之病状贴药补疮。

我的大女儿爱看肥皂剧。有一次电视节目中，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家伙因贪污受审及奸情败露而发了心脏病。我实在不耐烦了，恼怒地问道：“告诉我，珍妮，你为什么喜欢看这破玩意。”她的回答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说：“为了它太吓人了。”

黯淡的前景

恶梦有时会真的变为现实。就是妄想狂也可能真有几个

仇人。紧接着充满奇迹的 50、60 年代后的 70 年代，是国外经济增长令人失望、汇率失控和经济困难的年代。

一个笔头流畅的中年作家怀疑现代混合经济能否很快找到医治顽固的滞涨综合症的良方，他这样想是可以谅解的。但这与“资本主义危机”有何相干？仔细揣摩海尔布伦那的词句，你会发现，连他也与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不相信丧钟仅是为了现行制度即将消亡而敲响的。他所相信的是，现代人类如同肥皂剧中的角色一样，面对着的不仅是一个问题。

海尔布伦那博士在从前的一二本书中指出，自然资源的匮乏要求更多的中央计划。而我们看一看瑞典的奥尔夫·帕尔梅、印度的英迪拉·甘地、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德国的维利·勃兰特、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且不说霍华德·查维斯、吉米·卡特、詹姆斯·施莱辛格、参议员拉塞尔·朗及杰丽·布朗州长等计划者自那时起的命运，就会认识到说计划时代已到来还为时过早。

向计划体制转变在政治上也值得怀疑，原因之一是从传统的计划模式中我们很难看出它对减轻目前的不满会有何帮助。

1979 年的增长衰退

自己站在旁观的保险立场，以不负责任和不可知论的态度对别人的预测冷嘲热讽，是一种廉价的娱乐。下面是我对今后 12 个月里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预测。

从今年劳动节到 1979 年的劳动节，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恐怕只能达到 2.75%，这将使失业率令人不快地保持在

6%以上。

这绝不意味着缓慢的增长一定能得以保证；所谓增长衰退是与那种实际产出至少持续下降两个季度的完全衰退相对而言的。由联邦储备委员会造成的或由货币紧缩政策失控引发的货币险情，可能触发住房与存货支出的减少，其严峻程度足可以带来真正的“衰退”（更不用说“危机”了）。

当然我们这个体制也可能还有足够的余力，继续其第五个年头的复苏。

可能发生的轻微衰退不一定会永久导致滞涨，但想要消除我们那可观的国际收支基本赤字，还须走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中产阶级的反对、纳税者的反抗并不能导致赫伯特·斯宾塞的自由竞争的恢复。无论左、中、右，都自有其科学的幻想。不妨谈之，不妨欣赏之。但不要想入非非，把自己的老本都赌进去。

民主太过了吗？ 1979年4月9日

许多美国公民对税收深感厌烦，他们目睹着物价以每年二位数字的比率上涨。随着实际财产在耗竭，他们为未来的生活而感到担忧。

在他们看来，国民收入中政府所得份额无情地增长着。人们一年中有4个月的工作是为华盛顿、州政府的政客和市政厅的官僚们干的。如果这个趋势在20世纪中间的50年中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到了2000年，那些受过最佳教育、在经营与生产活动中最勤奋的人将要把劳动成果的一半转交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手中。

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醒我们要提防民主。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也警告过我们。他们预言普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公众中最穷的51%将要夺走节俭的中产阶级的财产。

保守派的悲哀

今日耶米利式的预言家们更加沮丧了。他们认为，由于立法过程中所固有的官官相护，老百姓谁也别想捞到好处。即使是有钱人所损失的，穷人也得不到。

代议制政府的低效率和不负责任给国民生产总值造成重大损失。由于政府零散地消耗掉了生产新资本品和建设新工厂所需的资源，由于政府管理不力使发展技术和企业革新的动力受到抑制，经济前进的步伐被迫真正停顿下来。

工人和企业主同样也受到损害，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在人民党式的民主制度下，充其量只有那些政客和官僚才能饱私囊、发大财。

我相信上面几段所述的内容基本上代表了多数美国人最近的观念。而我本人对美国慢性滞胀的基本原因的分析则沿着另外一条比较复杂的思路。如果上述属实，如果旧式的由需求牵引的通货膨胀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所在，那一切还是容易解决的！

关于社会选择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所谓民主制度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必然导致过分庞大的公共支出这样一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集体决策和竞争理论等经济原理向我们证明，支出“过少”可以和过多支出一样成为政府的习惯。

人人负责的结果就是没人负责。追求个人私利就不可能保持河流和空气免受致癌物质的污染。人人为己，你我就不会雇用一支陆军和海军来维持一种制度，使我们在其中能有所建树，能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事业。

正如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著作《公正理论》中反复强调的，我们并非出于对华盛顿文职人员的同情才投票支持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作为人类，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那未知的失业与贫困所威胁的对象，若无上帝的恩典，丧钟也许就是为我们敲响的。如果我们明智的话，只能选择现代福利事业的相互再保险。可以说你得的伤寒也是我的病，而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广岛上的居民。

有关的证据

上周，当我在国会关于预算平衡的罗丁诺宪法修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上述所有的矛盾都出来了。我认为这不是我对各种具有不同道德观点的人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责任就是尽量客观、准确地给出各种政策可能产生的价值与收益。

即使从减少并扭转公共支出的立场来说，历史的经验也说明了利用宪法来永久固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模式是不明智的。

不妨回顾一下 1930—1932 年间。面对日益恶化的衰退，为了保持预算平衡，赫伯特·胡佛曾拼命地提高税率，因为赤字就是由税收减少而引起的。如果罗斯福当年屈从于宪法的压力也这样做，那就要血流街头。

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原先看似不错的规则到后

来会出乱子。温斯顿·丘吉尔是对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差劲的制度，但谁也没能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制度。只要占优势的多数人总是希望有较少的公共支出，那他们就可如愿以偿！

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意味着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灵活地进行改进，而不是把每一种风行一时的经济模式在宪法中固定下来。

2

维持增长的困难选择

宏观经济学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普遍被人们接受的宏观经济学的三大目标。尽管这三大目标不时会相互排斥，但必须以一种与决策者和全体公众的道德、意识形态体系相一致的方式追求这些目标。然而，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来讲，维持并不断增加人均产出才是最根本的。健康增长和强忍不够充分的产出是萨缪尔逊文中的重要主题。凡是能够维持总体经济健康发展及促进增长的办法，萨缪尔逊在这些文章中都无一遗漏地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根据萨缪尔逊的观点，对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其经济的上升和下降以及长期增长轨迹不能仅仅归结于政府的政策。但是，他承认确实存在政治周期。一个特定国家的经济不仅会受其内部异常状态的干扰，而且还会受粮食歉收、石油垄断和国外商业周期的影响。尽管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萨缪尔逊相信，高深的经济分析已使其无法变成观实，而政治上的适宜策略也将

使其不致存在。

所以，决策者应起的作用不是以膨胀来对付衰退或者以衰退来对付膨胀，而是在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缩小这两种偏差。通过变动政府支出和税收而对政府预算进行行政上的和由国会出而的控制，是可供采用的财政政策工具。而货币政策工具则包括选择性的信贷控制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货币总量的控制，从而影响利率。总的说来，萨缪尔逊并不主张非常严厉或持续不断地应用这些政策工具来对衰退或膨胀作出调整。他强调，政府采取这些政策是为了满足平抑经济周期的需要。就滞涨（普遍性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同时并存）而言，他首先是实用主义的，但亦偏向于人道主义的且对增长影响最小的扩张政策。在经济预测者们一致认为经济发展过热时，有时他也主张采取谨慎的限制办法。

经济计量学应用数学术语来表达经济理论，其目的是想用统计方法来检验这些理论。此外，为了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为了给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咨询意见，计量经济学家试图测度一个经济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萨缪尔逊与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商业界预测者的共同意见在基本方面并无二致。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直观预测家，这意味着他将以阐释在经济计量模型中从数理角度建立的经济关系里所未曾列入的现实世界之状况，来修正经济计量的研究结果。

政策的制定往往超越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而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萨缪尔逊坦率地为非熟练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人在政府实行收缩政策、劳动力市场不景气时的

处境而担忧。但同样，他也不断地直言相告，将相对充分就业作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目标必然要忍受通货膨胀的代价。

确实，在萨缪尔逊为《新闻周刊》撰写的这些文章中，找不到他与凯恩斯主义有重要出入的地方，也丝毫没有滥用或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痕迹。他似乎不曾关注到，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已对财政政策产生了免疫力，使政府预算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可能已经失效。在《至关重要的公共支出》（1967年11月29日）一文中，萨缪尔逊竭力主张将增加税收作为控制膨胀的收缩财政政策。在70年代，他建议用减税来防止严重的衰退。

石油垄断和粮食歉收产生了实际供应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膨胀是指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所以，如果在石油和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同时，有一些商品价格下降，就不存在膨胀。决策者们没有同意，也没有强求过价格的下降，相反，他们对价格上升倒很迁就。通常，萨缪尔逊也建议采用这样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他难以证明可以用衰退来纠正膨胀。

在里根竞选之前，有几位经济学家引进了理性预期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可以根据可得到的有关决策者未来行动的信息形成他们的预期。如果公众知道而且相信政府不会容忍膨胀，那么就能在免受长期衰退之苦的情况下使经济根据膨胀率向下调节。萨缪尔逊不接受膨胀主要是心理问题的观点，此外，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出，控制膨胀的实际代价将涉及很多方面，并且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现在，他承认，关于美国人会长期生活

在通货膨胀中的预测是错误的。萨缪尔逊可能曾低估了公众对控制膨胀的愿望，也低估了在很大程度上众多的家庭已经由两人工作而不是由一人工作，以此来抵消膨胀对家庭的影响。但是，萨缪尔逊还警告过，消除膨胀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严重的，而且会带来高利率、失业和生产中断。他的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他并不期望出现什么供方奇迹，因而，他也不曾失望过。

经济发展和增长

是伯恩斯萧条吗？ 1975年3月3日

一个词的含义有时会发生变化。“衰退”一词当初是用于描述经济周期4个阶段中由繁荣的顶端下降的那个阶段的。根据这个定义，紧接在繁荣的20年代末的1930年，是30年代“大萧条”中衰退的一年。

随后，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我们结束了旧式的萧条。但在我们的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较高的失业和实际上的负增长时期。我们需要一种委婉的说法来表示经济进步中这些不愉快的停顿。“衰退”一词正合此意，它逐渐被用来表示“温和的萧条期”。

目前看来我们正处于二战以后最严重的衰退期，既然如此，“萧条”一词的原来含义被淘汰的时刻已经到来。我认为，将涉及10%以上劳动力的衰退定义为萧条比较切合实际。

根据上面的定义，我们目前可能处于萧条，也可能不处于萧条。这主要取决于从现在到年底这一阶段的失业率是否

徘徊在9%—9.5%之间，还是高达10%以上，而后者是很可能发生的。

近来，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心下面的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是否还会重演？”说我们可能会进入萧条并不等于给这一问题以肯定性的回答。30年代的萧条是结束一切萧条的萧条。1975年的美国可能会进入像1873年和1893年那样的萧条，而不会是像1932年那样的胡佛萧条。

传说的形成

在谈论到对那位极有主见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F·伯恩斯博士的步步升级的攻击时，伦纳德·悉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道：在70岁的今天，伯恩斯所能失去的只是他的名声。说得客气点，这是一句古怪而又空洞的评论。依我的经验看，不管他年龄多大，在华盛顿失去名声就等于失去一切。所有的领袖人物在行动时总是要考虑他们将来在史书上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除非他们处在不得不竭尽全力免入牢狱的非常时刻。

伯恩斯正是这样的人。作为已故的韦斯理·克莱尔·米切尔（美国研究经济周期的第一流的学者）的最主要的追随者，亚瑟·伯恩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以其经济波动理论研究方面圆通、精深的知识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声誉。凡是一个学者所能获得的学术赞誉，伯恩斯都得到了。

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一（也是最好的！）任期中的经济顾问，伯恩斯博士显示出一个老练的政策分析者的才能，保守而不恪守教条。我作为尼克松当政时的观察家也经常提到，亚瑟·伯恩斯是理查德·尼克松拥有的唯一能够为他提

供锦囊妙计的人。而更多的赞誉不是我能给予的。

任何一个熟悉美国政治生活和了解亨利·基辛格的人都会同意，去年年中他所达到的显赫位置是出人意料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自那以后，他的神秘气息开始消散，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伯恩斯所达到的权力和威望之高只在基辛格之下，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也被公认略低一筹。对于了解内幕的人来说，巴尼·巴鲁克永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但他赢得的威望与伯恩斯现在达到的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众议员赖特·佩特曼是一位颇似民主党党员的言词激烈者，他与伯恩斯相处得比他的前任威廉·麦切斯尼·马丁要好。这可以看出伯恩斯在处理私人关系方面的才能和佩特曼的天真。

失乐园？

一个在顺利时受到拥护的人，有可能在形势险恶时遭受指责。历史总是以一个人在其最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来评判其功过的。

自去年夏天以来，对大部分经济学家来说，伯恩斯博士在评估膨胀和衰退的风险方面已经开始丧失其影响。他们控告他和他的同僚对经济系统中的实际货币卡得太紧，而对信用膨胀却没有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

由于经济情况不妙而对伯恩斯横加指责，这是否有失公平？也许是这样。但是，谁能说历史的评价永远准确无误？又有谁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对2亿人民所遭受的折磨不负有责任？如果我们确实进入了萧条，那联邦储备委员会理应忍受对他们的责难。

经济尚好 1979年2月26日

每隔几年，我总要对我的经济学入门书认真作一次修订。这时，我等于在上一次关于新近美国经济生活基本事实的速成课。重新回顾一下这件事是值得的，因为真实情况有被简缩的标题掩盖的倾向，不管标题起得是好是坏。自从70年代中期着手第10版的修订工作以来，经济中的实际进展令我惊喜。

当然，事情并非完美。所以我一开始就来提一下关于膨胀的坏消息。尽管1973—1975年的世界性衰退最终降下了1974年两位数字的物价上涨，值你可以看到，在即将跨入80年代之际，我们在对付美国的滞涨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重大进展。与年增长率为5—10%的膨胀共存，已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严酷现实。

美元汇率下降是否也应看作坏事？我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世界性农业收成有所改善，因而对美国农业出口有所影响。核能和其他替代性新能源的发展令人失望。在此情况下，汇率下降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汇率下降能降低美国商品的成本，从而大大增强我们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我也很乐意报导一下，“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问题在最近几年并没有进一步恶化：我们没有被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增长过速的人口问题难倒。新的地质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看来已经跟上多少有点减慢的资源开发速度。世界范围的出生率下降可望使全球人口增长在下一个世纪趋于平缓。实际资料表明，现在，人的寿命普遍有所延长，生活境况亦有所改观。

就业增长

从 1975 年起,美国进入了令欧洲和日本嫉妒的充满活力的复苏期。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吉米·卡特就职典礼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福特当政的年代。和平时期的长期生产扩张的记录可望被创造。

就业扩张显示了繁荣。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在迅猛上升;出生于上一个生育高峰的新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找到了他们想找的工作。

与德国、英国和法国失业率的上升正好相反,我们的失业率已经从 9% 降到了 6% 上下,也就是说已经降到了难以突破的低限。增加家庭中参加工作的人数就等于增加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商场帐款自动记录仪上的数字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繁荣带来了一个祸害,即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令人失望。让人不解的是,制造业的生产率看来没有服务业那么糟糕。

公司利润总额在最近几年上升很快,甚至在适当扣除了膨胀贬值因素之后,情况还是如此。确实,外国企业现在对此十分嫉妒。

不过,普通股票的价格却继续毫无希望地来回摆动。我们的中产阶级抱怨他们的储备已经追不上膨胀的速度。只有股实的房地产还是他们增殖的资本,但这不能给他们带来现金收入。

利益分享

如果像在 20 年代的加尔文·柯立芝“新时期”那样,经济总量的增长面对着一个贫富不均日益扩大的背景,那么,仅有

这种增长是没有多大好处的。那些以农为生的非熟练工人、美国黑人及少数民族团体现在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令人宽慰的是，美国黑人继续保持了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在相对收入方面所获得的改善。虽然他们仍然只能赚到美国白人所赚的 60%，然而与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 50% 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了。幸运的是，这些改善更多地是发生在收入水平的下层而非上层，所以，它们就不仅仅是好看的表面文章。虽说在华盛顿出现了拖拉机的游行队伍，1978 年农场的平均收入已经与城市非常接近。

然而，要一如既往地这类经济进步提出警告：这些进展还是会受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严重衰退或长时间缓慢增长的威胁的。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尝试 1980年6月16日

据说美国政治在向右边摆动。罗纳德·里根的赞赏者希望这是事实，因为里根的政策一贯倾向保守。

承受着福利国家的反作用的并非只有美国一家。瑞典的工党在其当政 40 年后，被一个非社会主义的联盟夺去了席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选民都已经转而反对在朝的工党。挪威在几年前就尝试过建立一个更资产阶级化的政府。

对美国人来说，目前玛格丽特·撒切尔所代表的保守党统治是这许多政治实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英国人一向是我们的盟友，即我们的表兄妹。至少，在语言上我们是最接近的。

“英国病”的某些症状同样使我们深受其害，它们是：

- 缓慢的经济增长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亦即滞涨

- 高消费、低储蓄和低投资
- 人们感到税收过重
- 令人失望的生产率发展趋势

为了对撒切尔目前正在推行的改革有更多的了解，我最近访问了英国。我以为一个人无须夸大他亲眼目睹的事实的价值。大街上那么多的行人你都可以随便找他们聊聊。当你与一位投资银行家交谈过以后，你就等于跟其他行人都畅谈了一通。

如果还有谁迷信于“供应学派经济学”这种荒唐的幻想——即全面降低税率及取消汇兑控制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将创造市场经济增长的奇迹——那伦敦之行将会消除这种幻觉。

尽管人们迂腐地崇拜某种幼稚的货币主义，英国的物价还是在上涨。金融界相信，撒切尔的班子将会紧紧控制货币的供应。但是，仅仅依靠紧缩货币供给，而不花几年时间实行严厉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使金融专家们对降低通货膨胀率抱有希望。反通货膨胀运动的成效仍未产生。

英国幸运地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这件事使得她不必再为如何对付欧佩克的油价上涨所造成的冲击面伤脑筋了。但是，石油仍不足以克服英国制造业的软弱无力。提高英镑相对于世界通货的浮动汇率，实际上使得英国在石油上得到的好处成了削弱英国出口业国际竞争力的面素。

对出差旅行的商人而言，伦敦差不多是世界上花销最昂贵的城市，这早已为人熟知，我无须再提起了。另外，关于英国人低工资的评论也不再具有新闻价值。尽管如此，得知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训练有素的会计、职员工资收入少得

可怜是令人难受的。他们不管挣多少，都要被征以重税，结果是无能以现行价格购得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服的许多生活用品。银行的借贷利率稍有上涨，户主们就会被自动要求为他们陈旧的抵押品交纳更高的税率；人们似乎在努力做到不再为未付债务交纳诸如 15% 的利率这样的事感到恐惧。

我们不能因为英国穷而谴责目前的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一个公正的人会期望撒切尔的自由放任计划能在 1 年、5 年中修补由 1 个世纪的习惯和法令所带来的东西。

没有发现奇迹

对保守党当政以来事态的发展进行一番回顾是正当合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直在用市场经济奇迹的轶闻攻击我们：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币制改革如何使饱受战争蹂躏的联邦德国得以奇迹般地恢复，旧金山如何在 1906 年的地震后重建家园——从而要求回到过去那种企业具有无限赚钱欲望而政府干预受到限制的黄金时代。

虽然我认为轶闻并非科学，但我还是在密切注视撒切尔成功的一切迹象。倘使我走的地方再多一点，我也许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献给读者。可能我对非我亲眼所见的东西缺乏信心。总之，无论是凭直觉还是凭一些统计数据，我都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征兆表明市场的魔力开始在发挥作用。

较高的生活水平非得值赖更有效的供给，这对美国选民可能是一点教益。不过，请不要相信某些人的动听言词，以为柯立芝的政策不久将会带来物品。

关于发展的好消息 1979年7月23日

我下意识地回忆起我母亲说过的一句古老格言：

我抱怨我没有鞋子
直到我遇见一个没有脚的人

这是最近在最严重的汽油短缺出现之际，我在翻阅世界银行所作的关于1960年以来经济进步的评述时想到的一句话。这个评述的题目叫《世界发展报告，1978》，里面收集了一些很难到手的有关125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珍贵数据，并由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作了序。

这个报告带来了令人愉快的消息——令我稍感欣慰，因为我周末去科德角的旅行计划有可能要落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按百分比计算的收入差距的扩大终于停止了。下面让我们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举一些例子。

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寿命有所延长

先从必不可少的统计数据开始。每个国家的人民无一例外都希望延长寿命。甚至在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已经提高了4岁而达到38岁。显然，这仅仅是挪威75岁的一半；但这已经打破了辉煌的古代雅典和伊丽莎白鼎盛时期伦敦的记录。说得更贴切点，它表明了1960年以来所取得的明显进步。

年轻学生往往会很幼稚地反对物质生活，而事实上，较高的人均收入确实能买到较长的寿命和较高的健康水平。小的

买来的时间

| | 实际人均收入 (1975年美元) | 平均寿命 |
|---------------------------|---------------------|------|
| 工业化国家 (美国、瑞典、英国等) | \$6200 | 72岁 |
|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苏联、中国、波兰等) | \$2280 | 70岁 |
|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巴西、墨西哥、埃及等) | \$750 | 58岁 |
| 低收入国家 (印度、肯尼亚、马里等) | \$150 | 44岁 |

也许是美好的，但贫困决无美好可言(附表说明了贫困和寿命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公共健康系统能补偿经济的落后？尽管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物质供给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短缺，但它们的平均寿命却与工业化国家非常接近，这个事实也许能够说明上述问题。

有关出生率的数据就没有如此乐观。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正在下降，但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却仍然维持在2.5%的高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还会在已经足够庞大的数字上加上三分之二。

从有关的数据中我们能发现一些经验教训。低收入国家没有成功地实现利润的再投资，它们用于投资的部分在国民生产总但中所占的比例没有中等收入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那么高，也就是说，它们只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用于投资，而后者用于投资的比例则高达四分之一。这一点对资本形成

的辩护者是有用的。

然而，这个记录没能证实下面的观点，即贫穷国家之所以仍然贫穷是由于它的政府在不意义的公共消费中挥霍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大部分。事实上，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政府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低于工业化国家！

解决贫困问题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称不上名扬全球。像赫伯特·胡佛那样，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像胡佛那样，他在提高商业(福特汽车公司)和公共服务(五角大楼)的效率方面赢得了声誉；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点也很相像，那就是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帮助过欧洲的饥民，而麦克纳马拉则认识到贫困是必须受到挑战的敌人。

在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前任的努力下，世界银行通过鼓励引用市场机制的刺激作用和赢利试验成功地促进了贫困国家生产总值的增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认识到，单靠成功的市场力量还不足以减少丑恶的不平等和悲惨的贫困。我对他有如此独特的眼光表示敬意。

他的一段话值得引用一下：

“在世界发展方面，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进步的时期。尽管这个记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仍然有1亿人继续处在被我们称为“绝对贫困”的困境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可以用营养不良、无知、疾病、肮脏的环境、婴儿的高死亡率、低寿命、以至于根本无法用文明社会用语来描绘的惨状所刻划。

“所以，加速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是发展的双重目标。”

经济周期，预测和均衡

又是大萧条吗？ 1974年10月28日

卡尔·马克思总是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的趋势是不断重复自己，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便成了闹剧。现在，美国人明显地感觉到历史确实会重复，不过，两次都是悲剧。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 51% 的美国人认为我们正在走向萧条。这种担忧并不为无知、外行的公众所独有。今年 6 月，在很有威望的伦敦《经济学家》上刊登了一篇后来被广泛转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由石油提价所造成的贸易赤字会把世界拖进大萧条的泥潭。一些大的公共机构的投资者曾就经济形势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目前，他们的投资在各种国库券中保持现金结余。当我问及他们为什么在我们最大、最安全的银行存款单上不要 11% 而要 7% 的利息时，他们承认他们害怕承担风险！

有人对发生像 30 年代那样的萧条仍存恐惧，这是否真有根据？我认为并非如此。但这个问题不是由某个人所能肯定的，甚至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确信的观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些你所需要的事实，以形成一个理性的判断。

大萧条是怎么回事？

在盖洛普抽样调查中，只有不满 20% 的人了解 30 年代大萧条时国内外的真实情况；

• 在美国和在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每4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工作。

• 在我们15000家各类银行中，竟有几千家银行倒闭，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不得不关闭所有的银行，以此作为在新的政府法令下重新开放最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第一个步骤。

• 在我们目前所谓的（也就是根据我定义的）衰退期内，我们的货币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保持了10%的年增长率。而在1929年至1933年，货币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 眼下我们正在为下一年的货币供给应当增长7%左右（像我认为的那样）还是应当增加4.5%（大多数货币主义者这么认为）而和亚瑟·伯恩斯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展开争论。而在30年代早期，无论从哪种定义看，货币供给都是向下跌的。

回想起30年代大萧条时国内外的糟糕情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当时的情况比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坏得多。但是，这不足以消除一个有思想的人的疑虑，即担心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还会往比我们今日所见坏得多的方向发展。不管怎么样，你能振振有词地争辩道：1930年，也就是1929年大崩溃后的第一年，看上去并不加此糟糕；而现在我们都知道，正是始自那一年，美国经济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非充分就业的增长。

是否1930年的衰退不可避免地恶化成1931—1934年的萧条？或者说一定要恶化成10年不景气，直至被拖进血腥和灾难深重的二次大战才得以真正结束？

我过去一直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历史不能逆转。你不能证明要是当时希特勒没有进犯俄国，或者拿破仑没有与约瑟芬幽会，结果将会是如何不同。一个人想要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通晓古事滔滔不绝的讲故事能手，其诀窍是根据所有可得到的事实材料来推断各种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

告别胡佛主义

为什么大萧条不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大萧条一类的险峻情况今天不可能发生？其根本原因是那时候全世界的政府都严格恪守正统的金融政策。当局势变坏，他们便勒紧裤带，并强迫他们的人民也这样做。

不断地重复说全世界的人民党或民主政府对知识了解得非常透彻并非空谈：我们生活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我们不会回到赫伯特·胡佛主义那儿去。

我预见到了困难。但这种困难不同于发生在1930—1933年的那种。

对付滞涨的政策 1973年10月15日

在经济周期中，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容易制定出正确的对策。

一种情况是在衰退的最低点。这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应该扩大货币供给，并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在这种时候，任何一个总统、预算署长和财政部长都应当明白，有意出现一些财政赤字是合适的。这种时候，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加强了人们简

单的常识,由于科学经济学的发现,因此,正确的建议不大会被束之高阁。

另一个容易制定对策的情况是当经济正在飞跃,很显然要与生产能力和充分就业的上限相碰撞的时候。这时,在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也许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约束。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威们必须努力摒弃众议员佩特曼所主张的贱币民粹主义。

而在其他时候,决策者的日子不会是很轻松的。如果他干得相当出色,混合经济也将永远只能在膨胀和失业之间走钢丝。如何选择一套合适的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专家委员会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不同的价值观

这种分歧是否意味着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性科学?当然,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是,要评价它的事实方面和分析方面的不足之处,用专家之间争论的分贝数的大小来衡量是有失公允的。

威廉·费尔纳教授是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新成员。他和我是老朋友。长期以来,我一直是钦佩他的人们中的一个。但费尔纳博士和我常常发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到何种程度为宜这个问题上我们存在着分歧。

像现在一样,我通常都建议将失业率方面的目标定得比他所建议的低一点。而我们在对经济系统发展趋势的预测方面并不存在重大差别。专家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轻微的衰退,对此,我们两人可能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所谓轻微的衰退意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正的,但其增长速

度低于与长期人口和生产率变化相符的 4%。

两个同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往往在价值判断方面表现出差异。由于费尔纳教授对当时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他对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退职人员会有一种自然的关切，并且担心为获得最后半个百分点的就业可能要付出进一步加速膨胀的代价。

而“大萧条”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所关注的自然是非熟练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人，他们由于国家劳动力市场相对不景气，被迫承担起与爬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重担。盖由于此，应注意我可能存有偏见。

1974 年的计划

1. 不要尝试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抗食物通货膨胀。因为那样做等于将一根止血带绕在病人的脖子上来止住病人的下巴流血。供求因素曾使食物和化纤价格抬高，在今后两年中又会使价格向下跌落。

2. 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亚瑟·伯恩斯在最近所建议的那样：现在的繁荣是旧式的，不必采用新税制。为冷却膨胀而严厉地削减预算支出的时候也已经过去。

3. 允许经济增长率从上一年已无法维持的 7% 的高速增长上降下来。为了保证从现在到 1976 年这段时间内平均失业率不超过约 5%，我们最好让它暂时超过目前的水平（重复一下，是暂时）。

4. 应当以增长率逐渐下降趋于零的任何一个明显的标志作为重新开始刺激经济的信号。最近几个季度的仅有 2% 的年增长将导致失业率爬高到 5.5%，面对妇女、青年和非熟

练城市工人来说，失业率的上升将更快。因此，我认为应当抵制这种劝告：解决膨胀的关键是必须来一场有益于健康的衰退。

5. 价格控制不能消除肉类、燃料的稀缺。但是，抛弃价格控制计划将会复活灾难性的工资螺旋上升的阴魂。

这是令人发狂的时刻。但在经济问题上，需要的是冷静的决策而不是设法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

经济形势展望 1974年3月25日

任何一个注意观察经济形势变化的聪明人，如果他对目前局势的把握深感绝望的话，是可以原谅的。就发展趋势看，现在似乎比以往存在更多的矛盾。所以，在此，我试图对1974年冬天结束时我们将到底如何提供一个导引。

经济专家们说去年春天美国正在进入“增长的衰退”是正确的。自去年复活节以来，我们从扩张繁荣一直滑落到4%的实际年增长率，而在一个技术进步的经济中，4%的增长率正好能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提供职位。目前，失业率在上升，到今年秋天为止，普遍认为失业率会高于5.5%而接近6%。

专家们预测，1974年将是“滞涨”（即停滞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一年。这是正确的。物价上涨仍在加速并已全面铺开。这个季度的膨胀率已接近10%的水平，而且看来还没有到头。我最近同各地的商人作了一些谈话。他们都告诉我，实际上他们迫切希望调高他们的售价——以补偿因原材料价格上升而引起的利润下跌。我想，如果工会对工人进行一次调查，将会发现工人们也将提出同样的要求：提高工

资以“跟上”物价的上涨。

1974年第一季度在实际产出方面确实经历了“衰退”——年下降率可能达4%之多。而对第二季度而言，甚至连专家们也在对实际产出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或将会持平下赌注。与此相反，几乎没有人会把赌注下在经济周期可能会走入谷底且随后会出现突然高涨上。

一 丝 安 慰

美国将会陷入萧条的说法并无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所谓的世界性萧条主要是由那些哗众取宠的记者、黄金迷和喜欢制造耸人听闻事件的商人捏造出来的，而这些人在过去曾有过预测失败的悲惨记录。

那些来自银行、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的具有代表性的预测家们都估计今年年底的膨胀率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我不知道这怎么能跟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所提出的警告统一起来，他警告说会发生拉了美洲那样的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也许有一种职业病会使在位者屈从于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曾使伯恩斯的前任马了主席常常为之入迷，即为了迫使选民和国会议员放弃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理的政策而发布言过其实的警告。不过，伯恩斯可能不久会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将他对问题的分析方法逐步公诸于世。）

不 确 定 性

前面的那些评述是对目前这本帐中最容易的一面的分析。更难回答的是下面这些问题：

• 失业率会上升到 6 % 吗？到年底，失业率将保持稳定还是向下跌落？

• 商业周期的情况不久是否会有好转，因而将不会以一次“真正的”衰退而被载入史册？另外，在滞涨方面是否不久会出现明显和有意义的改善，因而能使共和党候选人在今年 11 月份竞选中的负担得以卸掉？

专家委员会仍然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些问题最终被时间澄清之前，人们能够继续对可行的政策进行合法辩论。因此，我想敦促政府采纳下面的谨慎方案：

1. 不管在石油禁运、实际收入及产出的持续衰退方面会出现什么问题，必须立即增加个人所得税的豁免。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平均每人免除税额也达 500 美元。自那以后，在通货膨胀期间，一般认为免除 900 或 1000 美元而不是目前的 750 美元的税额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实行这一减税方案，那么越快越好。而现在，失业率正在上升。

2. 现在也该是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了。试图用制造衰退或鼓励失业率维持在 5.5 % 以上的办法来降低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乃是愚狂之举。当健康增长恢复以后，会再次出现适度的反通货膨胀的压力。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清醒而谨慎的方案，我相信这也是符合人道的。

问题和解答 1974年6月17日

从读者的来信看，目前，人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忧虑。我将在此对一些最普遍的问题尽我所能为读者提供解答。比

回答“是”或“否”更重要的是，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指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难题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甚至在最完善的经济分析中也是面有的。

问：经济系统是不是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正在走向衰落？

答：陀思妥也夫斯基、喀莱尔、亨利·亚当斯和斯宾格勒早就预见到了包藏在现代文明中的不可言传的恐怖。当你在阅读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在对罗马俱乐部打印出来的世界末日进行反复思考，在列举几位新近被革职的国家元首的名字以及在挑几本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的选集来翻翻的时候，你很可能开始忧虑，是否灾难的预兆正在显露。

然而，在我翻阅国务院关于一年一度世界经济综合报道时，我发现1973年是经济增长取得不寻常成功的一年：在修正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误差以后，世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结果上升了6.9%，而这样的增长率在经济史学家看来是非常高的。

在本世纪内，我们将会遭受撒哈拉干旱、亚洲的恶劣季风以及可耗尽原料相对价格的上涨。但从可得到的有关发展趋势的一些数据看，最有可能的进展是全球经济将对提高人的平均寿命提供必要的财力——只要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能决意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有效地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

衰退还是复苏？

问：尼克松先生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处在衰退中。但失业人口在上升，报刊的头版头条上登有很多产业境况不妙报道。事实到底如何？

答：大部分专家认为今年春天我们已经走到了谷底。不过，他们还是预计，相对于保证失业人口和闲置生产能力不再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而言，1974年是停滞的一年。

衰退是否已经发生，这只是一个语义上如何定义的问题，不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争辩。而复苏将是软弱无力的还是强有力的，以及政府政策是否应当努力增加复苏的活力，这些重要问题倒是值得我们去争辩的。

问：就算我不再为萧条和严重的衰退担惊受怕，那么，你能对我们目前所处的通货膨胀作出什么诊断吗？伯恩斯博士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再不利用最后的机会去根除恶性膨胀的危险，那么，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将会搞垮我们。听了这番话，我禁不住毛骨悚然。我们是否应当储备一些小麦，并且把越来越不值钱的美元花掉？政府坚持说今年年底通货膨胀会有所好转，但我觉得那不过是重弹老调而已。因此，它的每一次重复都使我不寒而栗。

答：让我们把政府的议会报告放在一边，来听听最出色的预测家们的意见——如经济学家埃克斯坦(DRI模型)、埃文斯(蔡斯经济计量模型)、格林斯潘(汤桑德—格林斯潘模型)、克莱因(沃顿模型)。1974年年初，总的物价年上涨率为11.5%，而这些专家们估计第四季度的膨胀率将在7.3—8.3%之间。

经济学是一门非精确性科学。所以我必须相当谨慎地估计今年年底的膨胀率仍有三分之一的可能徘徊在10%上下。是否估计得太坏了？是的。但没有充分的理由把我们与“香蕉园”相提并论，或者认为我们即将面临1923年德国所遭受的那种通货膨胀。

政策辩论

问：你如何能使未来的形势明朗化？

答：真正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不同的预测结果，实际上是关于下面双方的争论：(1)认为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在一两年内平均失业率不低于5.5%是可以接受的；(2)认为这么高的代价是美国选民不打算也不应该付出的。

问：那么哪一方是对的？

答：没有简单的结论。一方面，这个问题与超越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有关。但另一方面，政策争论的结果必须依赖预测的精度，而这是没有哪一位专家敢保证的。因此，有一些预测家认为，即使联邦储备委员会抽紧银根，复苏还将是强有力的。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在今后一年中，银根收紧对制止通货膨胀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会抑制建筑业从而造成复苏的软弱无力。

总之，看法上的不统一是对不确定的正常反应。

新的复苏 1975年7月28日

美国经济在5月份到达了最低点，这是官方消息。新公布的1975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证实了经济专家们一直信心十足地在进行的预测。

对此，不仅专家们感到高兴，福特政府也如释重负。只有失业人员不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在夏末或秋季到来之前，失业状况将继续稍有恶化，那时经济产出的年增长率将重新达到4%，而这样的增长率对抵消正常的人口增长及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的正常替代是必要的。

以后12个月的前景如何？在这样一个需要谋划的阶段，这

个问题远比“10年以后会怎么样”或“复苏将持续多久”之类的问题有意思。

在1975年年中到1976年年中这段时间内，产出增长及通货膨胀可能会达到什么水平？对此，我将摆出我的观点。不过，观点总是廉价的，你可以在一上午捡上一大篓这样的观点；在一下午又捡上一大篓那样的观点。而描述一下一个人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形成合理判断的也许更有用，而且一定更生动。

挖掘事实

中国人讲得对：上山千条路。既然不让我们窥视未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实进行思考。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大约每隔三年半经历一次经济周期，因此至今我们差不多有40次复苏的经验可供参考。但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有些历史是该记住的，而有些则可忘却。马丁·范·伯尔雷时代的世界乃至卡尔文·柯立芝时代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着重来考察一下战后的情况。

自1946年以来，我们经历了5次可以感觉到的衰退：1次是在杜鲁门当政时期，3次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还有1次是在尼克松时期。从每一次衰退中复苏过来的第一年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分别是：14%（1949—1950年）、8%（1954—1955年）、9%（1958—1959年）、7%（1961—1962年）、5%（1970—1971年）。

简单地平均一下，复苏时期的增长率相当于9%左右。如果不算受到朝鲜战争影响的1950年，则为7.5%。

这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考虑这种情形在其开始时有何特别之处。对 1971 年尼克松复苏实力的总的过高估计就归结于没有进行这第二步的工作。

目前看来存在三大特征：

- 有其自身生产周期的汽车工业看来不可能经历一次常规的强有力的复苏。在此，能源财团起了关键作用。

- 建筑业似乎缺乏活力，甚至在信贷较为宽松的乐观情况下亦如此。

- 主要的政策考虑仍然是对付通货膨胀。在 1971 年 8 月里查德·尼克松撕毁他的老的战略计划之前，政府反通货膨胀的决定一直在对 1970 年之后复苏的软弱无力发生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大约只有去年秋季的一半，但福特总统的监护人，不论是亚瑟·伯恩斯还是埃尔朗·格林斯潘，都在继续关注复苏不要达到过于繁荣。他们有权得到大部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有时则是太多了。

当然，不是一切都令人失望。股票市场的上涨是一个可喜的因素；我们无法看到的存货骤减也是一个可喜因素。衰退期间必然会出现顾客挨饿、有钱没处花的现象。

第三步，我们来浏览一下最出色的预测家们的推测。如：沃顿—宾夕法尼亚模型、蔡斯经济计量模型、DRI 模型，还有你最喜欢的预言家。

总 结

预测家们的一致意见大致是：以后 12 个月的实际增长率在 6—7% 之间；物价上涨率在 4—8% 之间；在这段时间内的失业率略低于 8%（即不同于今年 5、6 月份的 8.9%）。

对我而言，现在必须与上面那些预测家的意见基本保持一致。但是，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概率的可能分布范围。

这是我的估计：

-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4—9%；
- 物价上涨——4—8%；
- 利润上升很快，利率升高缓慢。

来自民主党人的富源 1976年7月26日

共和党是有产者的政党；而民主党是低收入民众的政党。这种人为的说法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不过，这样说不会引出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吗？目前，民意测验表明，吉米·卡特很可能在秋天将一个联合民主党引向胜利。而商业还是在上升。总裁们还是在对他们的行政人员高兴地低咕着。甚至证券市场上的道·琼斯指数也在忽隐忽现地显示其历史最高记录。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商业和银行界在而对被人们预计对他们是不愉快的前景时所表现出来的自鸣得意呢？

依我看，并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的东西，而且，也没有什么需要解释或辩白的。事实上，最近50年来，民主党政府对利润和商业是有利的。总体上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是不利的。而且，我们的大部分衰退是在共和党当政期间引发的。

不会消失的记录

让我们作一次小小的历史测验。

从胡佛时代开始，哪位总统在其当政期间，就美国经济

情况而言,是最不走运的?

答案不是里查德·尼克松。专家小组可能会在杰拉尔德·福特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之间有所争议。尽管福特衰退是战后最严重的,但我个人的裁决可能不得不对艾森豪威尔不利。在他的2届任期中,我们竟然有3次衰退。比这更坏、更糟的是,从股票市场价值、商业利润和充分就业机会来看,艾森豪威尔当政的年头是慢性增长、停滞的年头。而且,只有他的第一次衰退能用朝鲜战争来解释。

历史记载表明,在每一个共和党占据白宫的4年中,至少会发生一次全面衰退。相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将大萧条的烂摊子接过来以后,在他的4个任期中只发生了一次衰退。除了二次大战后的恢复期,只有1948—1949年的衰退你能够把它确切地记在哈利·杜鲁门的帐上。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没有发生过衰退。(不过,约翰逊确实在1967年经历过一次“轻微的衰退”;而且,对尼克松1969—1970年衰退的部分责难必然会变为对约翰逊越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攻击。)

这些规律并无神秘之处,但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它们是两个政党不同思想意识的无情产物。

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或者福特往往任命华尔街或工业界的代表人物如乔治·汉弗莱和威廉·西蒙为他们的财政部长和预算局长。在被共和党总统任命的经济学家的名册上,则包括那些在保守主义阵营中闻名的学者。如:亚瑟·伯恩斯、雷蒙德·桑耐尔、加布里埃尔·赫治、赫伯特·斯泰因和艾尔朗·格林斯潘。

当然,这些选择是很关键的。选举的实质也在于此。

对胜利者……

每位总统总喜欢把联邦储备委员会逐渐组建成他心目中的那个样子，正像将最高法院逐渐变成他所需要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全体选民也得到了我们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候选人之间投票选择时所希望得到的那种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最高法院。

一些民主党候选人更使富人害怕。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货币上的观点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商业利益和资本价值的恢复比共和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做得多，但还是有人憎恨他的“新政”。不管是对是错，乔治·麦戈文被认为与过激分子团体是一样的人，并且他的做法与他们的计划是一致的。

吉米·卡特被经营集团看作是一个不会反复折腾的人。他们认为一个如此虔诚的人对商业赚取利润需要的基本态度必定是稳妥的。

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商人更喜欢一个共和党总统。不过，他们知道何时应知难而退，安于可接受的次一点的东西。特别在经济复苏斯长、利润收益油水多的情况下，次一点的反倒变为最好的。

复苏的迹象 1980年9月22日

吉米·卡特在竞选年碰上衰退的坏运，现在开始有点转机。但我怀疑好转的迹象是否足以削减里根的优势。不过，目前自由下跌的阶段即将结束，查尔斯·舒尔兹和白宫的经济顾问们确实可以松口气了。

尽管自1979年3月以来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而实际衰

退是从1980年1月开始的。最乐观的推测是衰退将持续到竞选日,随后在80年代初期出现软弱无力的复苏。现实主义者并不寄希望于如此有限的一次衰退会永久性地结束通货膨胀。他们所希望的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目前已经达到的15%以上的年膨胀率。

经验证实了下面的格言:如果你想预测未来,你就不能奢望一劳永逸。今年夏天在我离开美国去秘鲁和挪威访问时,事情看起来都是井然有序的。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汽车销售和建筑业优势随着货币供应的负增长在今春令人沮丧地崩溃,这对预计会发生如候选人里根所说的那种萧条的悲观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安慰。然而,在我回到美国时,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

自动稳定器

在我们现代混合经济中,降落伞已经张开。由于财政政策开始自动制止经济下跌,在面临衰退时,政府很幸运地不用采取试图保持平衡预算的做法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准许利率下降以结束货币危机,并使疲弱的建筑业得以回升。

股票市场自始至终在平稳上升。这次,没有预料到股票价格会发生衰退。可以说,直至此刻,普通股的价格指数还没有对正在发生的衰退作出灵活的反应。

华尔街这种令人费解的行为使一些经济学家深感困惑,不过,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1953年9月,股票市场面对艾森豪威尔3次衰退中的第一次衰退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繁荣。货币经纪人似乎能够宽容共和党的衰退,直到1953年,对战后股票价格是便宜的看法才最终消失。同样,许多投

资者现在已经开始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弗朗哥·莫迪里亚尼带来的福音留有深刻印象，也就是持续数年的膨胀抬高了拥有美国工厂和设备的实际价值，而且这最终一定会在一个比以往高得多的普通股票价格上显示出来。

道列尔先生说最高法院会趋附选举结果。华尔街在对选举结果进行预测。罗纳德·里根是一群捐客中的漂亮小生。这些捐客带着除欠税款的幻觉上床，整夜做着资本收益税率会降到 20% 的美梦。最近，罗纳德·里根在取消对农场补贴和挑起与墨西哥的战争上作了轻率的批注，这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他的这一行动给在平衡中起决定作用的人带来了危险。而又有谁曾经给冒险者许过美好的诺言呢？

复苏当然还不能肯定。沃顿经济计量预测协会是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团体，现已被某商业团体接收过去。下面是其最近的预测结果：

- 第四季度实际产出将高出这个季度。我推测，这意味着在 10 月上旬，即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10 月 12 日）之前会出现回升。

- 销售价格 in 竞选日将以 12% 的速度上升，在以后一年半中将下降到 9% 以下。

- 预计第四季度失业人口占劳动力的比例在其最高点会达到 8.3%，但之后将缓慢下降，直至回复到目前的 7.6%。

华尔街对这些占星术非常满意。其他的一些预测结果（如麦克格劳—希尔的 DRI 模型和蔡斯经济计量模型）对第四季度的回升就没那么乐观。还有一些人则伤心地认为将会发生双重急降，也就是说会有一次下降中的微弱回升，随后又继续下降。

而我担忧的是滞涨。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表明我们正在恢复物价稳定。对衰退的关注不久将全面转向对复苏的关注。

然而有谁告诉过政策经济学家生活之路是铺满鲜花的呢？

年终的问题 1979年1月1日

上星期，在华盛顿，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与上个月在国外时有人问过的问题基本相似。从来信看，我知道这些疑问在到处困扰人们。

在此，我将对这些问题尽我所能提出我的意见和看法。除了指出如何解释有关的事实以外，我将尽力描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处于复杂的时势中，而且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性科学，因而读者不能只依赖某个人的观点，不管他的分析看起来是多么有道理。

问：1979年的前景如何？

答：自从卡特总统在11月1日采取抽紧银根政策及严厉的预算计划以对付通货膨胀和使美元稳步上升以来，消息最灵通的专家目前期望年中开始一场温和的衰退，并在1980年年初结束这场衰退。

问：为什么是温和的？

答：这次，世界其他地方不需要也不可能加入到美国的收缩中去。日本、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主要国家还没有经历我们已经享有过的充满活力的复苏，所以，他们的扩张可能还有一段路可走。

价格预测

问：这样的衰退会达到目的和战胜通货膨胀的威胁吗？

答：我并不这样认为。而且，比我更保守的经济学家——美国企业研究会的威廉·费尔纳和赫伯特·斯泰因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话值得一听——他们对这种温和的衰退能解决多少问题也表示怀疑。如果人们能够超越这一点而看到在华盛顿所唤起的竞选前的紧张活动，那他们就会发现价格稳定的政体是不可信的。

问：那么，为什么要费神采取某种政策将失业率提高至少一个整百分点呢？

答：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确实惧怕通货膨胀，尤其是害怕加速膨胀，到夏季为止，我们的复苏将经历 50 个月，这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记录。

私有经济看来仍然非常有力。顾客们尽管债务在增加，但仍在购置汽车，并往商店里拥。建筑业仍在支撑着。库存看来是平衡的。有人认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把实际增长率降到我们长期以来的 3—4% 的年增长率以下，那么，在 1978 年下半年已加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将在 1979—1980 年进一步加剧。

问：虽然一次衰退不能医好通货膨胀，但缓慢下降对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以及对通货膨胀率的稍许改善是有好处的。人们是否这样认为？

答：确实如此。我还想补充一点，瑞士的轮盘赌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你发射一次喷剂固然可以除掉有害的野草，但同时也可能毁了整个花园。

可怕的威胁

问：我听到人们在议论萧条。我们有必要为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担忧吗？

答：沃尔特·罗斯托认为有必要。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J·福莱斯特也这样认为。也许他们是正确的。不过，根据我和大部分经济学家对迹象的分析，你完全可以省去你忧虑的时间以防备更可能发生的祸害。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并不足以建立起长经济周期的统计可靠性。罗斯托和福莱斯特的说法并不一致，而且他们谁都不同意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最初建立起来的理论。

问：我听到了恶性通货膨胀正在逼近的谣传。如果这不是灾难性萧条的前兆，那是不是表明货币制度有可能存在大崩溃的潜在危险呢？

答：不。看来那只是滞胀的气喘病而非急剧上升的恶性膨胀，就像60年代和70年代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问：利率已经到顶了吗？

答：我很怀疑。1月和2月的通货膨胀数字将看坏。欧佩克的油价上升也将推动物价上涨。社会保险工资税和最低工资在1月1日的上升将抬高物价，从而使许多人觉得政府计划都是失败的。由此，我猜想在春季之前债券价格仍将疲弱。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都打赌说是我错了。咱们走着瞧吧。

问：普通股票的情况怎么样？

答：疲弱的债券会引起股票的疲软。然而在衰退走到谷底之前，股票通常会回升。在1979年，这种情况甚至会发生得更早。

问：现在是关于 300 亿美元的问题：美元汇率能稳住吗？

答：从目前来看，也许能稳住。过分缓慢地改善贸易赤字将会使未来的前景捉摸不定。

对付滞胀 1974年8月19日

福特总统入主白宫不大可能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下这种泼冷水似的结论并不排除下面的前景：

要是略交好运，美国经济在福特总统当政的第一年可能会比尼克松当政的最后一年有所好转。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显然是由于里查德·尼克松忙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以至没能抽出必要的时间来考虑制定解决膨胀的政府政策面造成的。通过分析，我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可取。即使他拥有世上所有的时间，我们目前仍然会面临**滞胀**的困难局面。

目前不可能期望福特总统在一个合作的国会的协助下制定出会对解决膨胀问题起到较大作用的可行的政策。如果你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严滞事实**，你可以集合我们国家 12 位最出色的经济学家组成一个评判面。假若你举出了几种不同倾向的政治观点，那么这些观点所造成的分歧将确证关于**滞胀**的一个基本事实：

没有哪个混合经济国家——美国或英国，瑞士或瑞典，德国或日本，法国或意大利——知道如何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

加尔布雷思主义者会对新总统说，一个深信其作用的总

统推行的价格—工资控制能达到目标。杰拉尔德·福特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学术界同行们也不会赞同这种观点。

而海克派会告诉福特，自由市场加上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是对付滞涨的唯一办法。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行会从现代世界的现实看到，推行这种办法的结果不会像梦想中的那么理想，其代价比想象的要高，而收益却要小。

连 续 性

那么，新总统将如何行动呢？他会听取各种不同的建议。他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而且还信奉连续性，因此，他会遵循像伯恩斯博士和在政府机构中接任的那些经济学家们的建议。

只要失业率仍然低于政治上的临界点（即 5.75%），福特还会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节制的财政政策推崇备至。

当代具有最高成就的 12 位预测专家估计：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实际增长在 1974 年年中到 1975 年年中这段时间内会很微弱。可以肯定，这比目前的负增长要好。不过，这显然低于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就业所必需的 3—4% 的实际年增长率。

杰拉尔德·福特是一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由此可以推测，以后当选民们开始对不断增长的失业有所反应时，他会越来越多地谈论我们滞涨问题的停滞方面。一旦 1976 年竞选的序幕拉开，民粹主义者的民主动力倾向于使遗留在现代混合经济中的唯一的商业周期——政治周期复活。在这种政治周期中，只要在大选之前，政策总是扩张的。

中间道路

我给新总统提些什么建议呢？

1. 你的眼光应放现实点。最佳的可行政策是努力将今年的两位数字膨胀减轻到明年的一位高数值膨胀。

局势的缓解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政府严厉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要靠推动 1974 年价格升高的外部因素的减弱，即中东石油垄断没有新的力量加入；幸运的话，没有世界性灾荒的冲击；没有全世界过热经济的同时突发性迸发。

2. 要认识到你所接管的通货膨胀比尼克松在 1968—1969 年而临的局而更困难。目前是成本推进而非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对我们起作用。作为全体人民的领袖，如果他想结束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分裂局面，那他必须用温和的语气演讲，并且把他的权杖扔掉，以免唤醒沉睡的阶级斗争。

3. 对那些坚持要对通货膨胀进行一致向外的宗教征讨的顾问进行一次简单的测试。问一下他的计划如果用减少通货膨胀的百分比来衡量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并且让他解释他那样做在失业和生活水平方面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总之，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代替空洞的理论。

诺贝尔预测奖 1980年11月3日

衰退在夏末结束，这是记录在案的最短的一次。如果它的持续时间更短，局势监测者甚至能让我们阻止这场衰退的发生。

秋季一到，我们就知道回升已经开始。我们应当为如此及时地获知消息而感谢那台伟大的计算机。

1798 年，当马尔萨斯警告英国人要提防人口过剩和大规

模饥饿的危险时，没有一个人对人口总数到底面临着什么问题有一点线索。著名权威人士里查德·普赖斯博士相信英国的人口自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来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我们现在知道普赖斯是错了，而当时却没有人能解决这一问题。

拿近一点的来讲，1937年，美国惊奇地发现它正处于急剧的衰退中。罗伯特·伍德将军当时证实道：在他进入加拿大丛林打猎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而当他从林中出来，经济的极乐之地已经塌陷。能够及时得到大范围经济方面的精确数据确实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一个发展。

克莱因时代

我赞美软件的设计及对它有所贡献的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劳伦斯·R·克莱因教授，由于他在宏观经济预测方面的科学创新，将于11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当之无愧地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惠于克莱因：不仅仅是银行、咨询公司、大学、企业和政府机构中的正在拚命使用他们的处理技巧的数百名经济计量专家，还有像我这种力求避免使用正规数学模型的直观预测家。

一个不怀好意的同事曾问我：“保罗，还有多久计算机会让你过时？”因为他是恶意的，我想让他知道这个真理：“一百万年以后也不会。”即使我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是错的，我的观点却是明确的。因为每一台计算机实际都包含有一个易犯错误的人，这人要编写程序，要设定其主要变量，还要设计这些程序的一般结构。

我重提这个故事，目的是想对计算机的威力提供必要的修正。以将判断科学和数量科学相对立的方式来展开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现时代的每一判断都是建立在数百台正在运行的计算机的输出结果基础之上的。当我手中拿着算盘，面对一个信封的空白背面，我的观点还是受到了包含在克莱因的沃顿模型、DRI的奥托·艾克斯坦模型、安·埃鲍模型以及其他一打经济计量模型中的知识的影响。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拉里·克莱因的研究生院的教师，我必须承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实。学术上的每一代也都是这样的。克莱因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而自那以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一代不如一代。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克莱因是以他全A的成绩记录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全A？对了，他在奥马哈的中心高中打字实践课上得过一个B。还有，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历史课上也得过一个B。）

继续努力

科学是一个自我破坏的创造过程。诺贝尔奖并不表示旅程的终结，而只代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经济学家的预测工作比过去做得要出色。他们的预测比碰运气要准确；比诸如“明天与今天一样”的幼稚法则要好；也比非经济学家能做的要强，不管这些人是占星术家、银行家还是总统候选人。

然而，经济学仍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在少数几十位意见值得考虑的预测家中，大部分人一致估计1979年而不是1980年是衰退的一年。他们的预测没有完全错。史书上

的记载确实表明 1979 年是增长衰退的一年——其增长率大大低于趋势。但结果很可能恰好是增长的衰退和全面衰退之间的差异足以使卡特总统在这次竞选中失利。新的复苏是否如大部分预测家所预料的那样微弱？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尽管预测工作已有所改善，但我们可能仍在走向高原。不确定性原则看来在跟踪我们，甚至进入了我们不能涉足的领域。

也许，在公立高中或洛杉矶的某个地方，有一位将来会使劳伦斯·克莱因过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多的权威将属于她！

财 政 政 策

至关重要公共支出 1967年11月29日

增税的考虑是基于来年货币总量需求可能过量从而可能导致过度膨胀这一前提之上的。作为纯粹的经济动力学问题，通货膨胀可用两种财政约束来对付，即较高的税率或较低的政府支出率，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这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承认的真理。（如果实用一点，我可以把真理定义为在 3 个《新闻周刊》经济专家中至少有两个专家达成的一致意见。）

跟下，应采取这两种财政武器的哪一个？是单单依靠较高的税率，还是单单依靠削减政府支出？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种武器，那它们之间的数量组合应是多少？

需要价值判断

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用经济学原理就可以回答的。任何一个由3个经济专家组成的评判团都可能合理地提出3个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而且，这种分歧并不反映一个学者的技术上的才能。

那么，合适的政策建议究竟是靠什么产生的？这类政策建议的选择最终必须根据全体公民中的多数人的价值判断。

如果人们优先考虑将经济资源用于净化受到污染的河流和大气，那么我们正在越南作战以及我们正面临通货膨胀这些事实就不应挤到他们所希望的计划考虑中去；如果人们迫切希望维持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和大力开展反对贫困的运动，那么不管是战争还是通货膨胀都无法对达到这些目标构成合法的经济障碍。

当然，事实上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资源在供给越南战场，事实上食物支出在爬行上涨并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这就是必须对国家的优先权再作一番认真研究的合法原因。不过，不能过分强调下面的技术上的事实：

今日美国不是不可能接近纳税能力的任何极限。如果人们希望更多地得到他们认为是关键的政府计划，那么在1968年经济公共部门的扩张方面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范围。

注意，我在谈话中已不很严格地使用了“公民”和“人们”这两个概念。你永远不要期望我们正在讨论的价值观念会趋向一致。有些人会竭诚关注贫困计划或税额的重新分配；而有些人则会憎恨这些改革；还有一些人对此更是深恶痛绝。

因此，在像我们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归结起来是全体选民表达的意见在起作用，而多数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我们

只得希望 E·B·怀特下面的话是正确的：

“一半以上的人在一半以上的时间内是正确的，民主就是对这种信条重复不断的怀疑。”

在目前大量的政治讨论中，似乎存在一种真正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用这些抽象的哲理性观点来提醒我们自己。通常，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削减政府支出必须先于增加税收或与税收增加同时进行。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必要，如果说存在这种必要，在经济学上是毫无道理的。比较一下其他西方社会，再把我们的富裕程度与公众的需要对照一下，我发现更容易作出这样的判断：今日美国在政府方面的花费不是过多而是太少了。

良好的社会

当资源出现紧张，你可能会想象存在某些假定，即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都应统统省去。由于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最后一个美元将削减我们对资源的最不重要的私人用途，因而补加税被我们证明是合理的。在这种时候，边际效益相对高的政府计划——如超音速飞机、混乱的农场改造计划，以及我们太空计划的大量费用会列入我手头的清单——也会成为急待上马的候选项目。

不过，在这里我想表明一下我对所谓的良好社会的基本信条。如果是为了经济上需要的某种神话而放弃甚至剥夺我们正在国内外进行的反对贫困和反对不平等的新运动，我相信那将是一场悲剧。

《新闻周刊》的读者知道我偏爱增税。让我说得清楚点，我并不喜欢不惜任何代价的增税。如果增税的代价是削减重

要的福利计划这样的合法交易,那我不得不指出:对通货膨胀的一定程度的放任不是最大的祸害。

阿尔文·H·汉森,1887—1975 1975年6月16日

就政治经济学而言,将哈佛的黄金时代称为汉森时代也许更为合适。在上周去世的年高誉盛的阿尔文·汉森经常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不过,这个称号对他并不公正。

确实,汉森是美国率先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济分析方面开辟的新途径和创造的新方法作出解释的人。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年发表时汉森已人到中年,这一点更显得可贵。正如伟大的物理学量子理论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说过的那样:科学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进步的——新的理论从来不去改变旧的理论,而只是简单地取而代之。然而,汉森却是一个例外。他开始阅读凯恩斯的著作时,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后来他重新读过,又改变了想法。

更重要的是,汉森设计出了可看作新凯恩斯主义范例的经济政策方案——主要是财政政策,还有货币政策。由于美国是一个富裕而广阔的大陆经济国家,因此它实际上比凯恩斯的祖国英国更适合凯恩斯新理论的目标。

萧条疗法

一开始,富兰克林·罗斯福根本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向胡佛所允诺的平衡财政发起了挑战。他早期的智囊人物在他们最为激进的时候是信奉威卜兰经济学说的计划者,这些人在现代宏观经济和计量经济复杂性方面的知识,与他

们所攻击的老银行家们一样贫乏。

直到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人们才开始了解到现代生活中的这些事实：国家复苏委员会(NRA)和炉火边的闲谈本身不会恢复繁荣；准备好的浮夸言词并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货币以使它为占人口四分之一的非自愿失业者提供职位。财政赤字根本不是萧条的不幸的附属产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创造出来的东西，只要它能使国家恢复生气。正是汉森和哈佛的那些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逐步使总统和国会明白了经济生活中的这些事实。

对公众而言，阿尔文·汉森的名声来自他下面的理论：像我们这样的富裕国家很可能而面临长期停滞问题。这是因为有着自由土地的疆域在渐渐消失。（汉森是在南达科它州他丹麦父母宅居的农场上长大的，他清楚耕地不断扩大的重大意义。）

汉森从凯恩斯体系的动态观点出发，认为随着土地的增长，需要储蓄和投资强有力的平衡及人口的高速增长。然而从人口统计专家所提供的数据看，二次大战前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事实上都趋向于不断下降。最后，汉森和他的哈佛同事约瑟夫·熊伯特强调了在刺激私人投资方面改革和创新的作用。汉森在浏览了创造金融内部来源的全部储蓄记录及相对于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的资本节约记录以后，形成了在纯粹资本主义中可能存在长期停滞的理论。

成熟的财政政策

汉森的这一理论使得他在保守派的圈子里不得人心。几乎没有人喜欢预告灾难的预言家。然而，更不受欢迎的是那种

建议对他的警告和他所防范的问题采取某种行动的预言家。汉森就是一个好战的改革家，他提倡盈余财政政策，其目的是想稳定经济周期中的上下波动并维持充分就业下储蓄—投资的长期平衡。

二次大战一时消除了所有这些顾虑。汉森是少数几个正确地预见了战争结束将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而会带来战后繁荣的声誉卓著者之一。而且，汉森是最先在30多年前就预见到了下面事实的预言家之一：没有一个混合经济国家能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自由市场的工资物价决定同时并存。

汉森活着看到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1946年的“就业法案”将政府对就业机会负有责任的条日载入了记录，这是汉森永久的遗产。

我们应当减税？ 1974年5月6日

1974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是可怕的。我们现在知道，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下降率几乎达到了6%。这比见多识广的分析家所预测的还要坏2个百分点；比尼克松先生暗示的预测要坏4个百分点。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坏消息。我们在第一季度经受了极为严重的滞涨，总物价膨胀率几乎又达到11%，这比非常出色的预测家所估计的要高出2个百分点。

为减缓滞涨，并保证我们不进入真正严重的衰退（一旦失业和收入缩减的恶性循环开始削弱商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这种衰退的局面就很难扭转了），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和爱德华·肯尼迪要求实行减税。这毫不足怪。

肯尼迪和蒙代尔都是以自由主义者而知名的。他们对衰

退所带来的失业和贫困负担极其敏感。当你了解到像众议员斯比克尔·卡尔·艾尔伯特和里德·迈克·曼斯菲尔德这样的中间派人士也已经开始信奉反衰退的财政扩张计划，你就能明白第一季度的那些数字有多么严重。

货币危机

有两种办法可用来对付即将面临的衰退：一种办法是财政上减税和增加公共支出；另一种办法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扩张货币和提供足够的信贷，以此来压低房地产抵押率，压低用于投资和耐用消费品的基金借贷利率及对业主面言的新企业资产资本的成本。

然而，一旦预算赤字开始剧烈增加，联邦储备委员会准许利率直线上升；银行最佳费用率会创造 10.5% 的记录；联邦基金利率会上升到 11% 以上；公司和政府债券的销路极坏，除非这些债券息票令人欢喜的程度能达到让借方拖欠几年。

利率的上升有很多原因。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的每一次讲话往往会在已经报价的收益上加上 50 个基本点。而这会依次削弱另一个“不动产投资托拉斯”的信贷地位并产生对一般商用纸张市场的怀疑。另外，这会促使商业借贷者不得不求助于商业银行。而银行的贷款风潮又会激起伯恩斯先生的另一次讲演。如此继续下去。在 24 位最近几年有良好跟踪记录的预测者中，没有哪一位因担心发生两位数字的长期通货膨胀而惊恐不安。而且，很幸运，某些人的惊慌也不可能导致这种膨胀。然而，利率上升很可能将建筑业市场压垮。

确实，作为一个精明人，一旦他在其他地方赚到的短期利率比他所付的长期帐户上的6—7%高出几个百分点，为什么他还要将他的钱存放在为建筑业筹措资金的储蓄贷款机构中呢？就在下一期专栏中，我将尽责告诉《新闻周刊》的读者们怎样成功地“失媒”，即把他们的钱从银行系统中抽出，并安全地得到较高的短期收益。

更大的敌人

从我已经描述过的衰退危险看，你可能认为现在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减税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政府没有这么做呢？很显然，是目前11%的膨胀率吓坏了权力机构中的大部分决策者。大多数实业家认为，到今年年中时，衰退会达到最低点。这方面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人们对复苏临近的信心不得不比以前有所减弱。除非失业率高于5%并更接近于6%，否则，保守主义者将会认为，对付衰退的任何做法只能使膨胀更为糟糕。

我的态度如何？我同意膨胀绝不是开玩笑。然而，我也明白石油和能源价格、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不是过分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具体地说，不管我们干什么，膨胀很可能在年底以前有所缓和。根据我所知的合理的分析，及时采取措施以防止更严重的膨胀是不会把我们推入无法控制的膨胀中去的。

温和的减税甚至能在今年骚动不安的劳动力市场上对维护工资限制起到一些作用。从目前来说，比较实用地放宽信贷是更为明智的。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造成的损伤(I) 1973年5月21日

目前的经济形势仍然高涨——可以说过度高涨。今年以来，物价膨胀一直在加速（尽管食物批发价的上升在4月份出现了停顿）。

那么，为什么那些经济专家们不去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政府推行严厉的信贷政策和限制性的预算及税收呢？

当然，有几位专家确实是在这么做。不过，他们只是少数。大部分经济专家则坦率地希望在年底以前来一场轻微的衰退。

为什么他们想要一场轻微的衰退？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那种对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冷漠残酷、希望让美国人民受苦的虐待狂。相反，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赞成轻微的衰退或者说增长的衰退是由于目前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制服经济过度繁荣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在以后10个月内没有短期衰退，那么将意味着会有某种比轻微的衰退更为严重的事件在以后的1974年等着我们——即全面的生产衰退，通常还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直至回升到6%或更高。

能够维持的增长

多数专家并不希望以遏制通货膨胀率为充分理由来发动一场预防性衰退。他们所希望的是经济能从目前无法维持的每年8%产出增长率水平逐步降低到能长期保持的4—5%

的适当速度。这样，就业机会将会保持有利。

诚然，没有哪个人对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任何仔细研究过 1950 年以后北美和欧洲的发展史的人都会认识到，现在众所周知的唯一能对付爬行通货膨胀的办法肯定比膨胀本身还要糟。

每当我讲述这个简单的事实，我都要忍受如雷贯耳的辱骂和缺乏理性的辩驳。对真实的坏消息的传播者采取如此愤怒和粗暴的态度会转移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的注意力：怎样制定政策，使得我们在不牺牲长远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的前提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不可避免的爬行通货膨胀。

我已经说过，大部分专家希望逐渐进入可维持的高就业的经济增长之路。他们认为我们真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仔细推敲了大约 15 种不同的预测。其中，有计算机所作的预测，有银行和经纪业务企业所作的预测，还有政府机构所作的预测。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而且，所有的人都担心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之前经济至少要遭到轻微衰退的袭击。这就是说，预测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估计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至下个复活节这段时间内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将以每年低于 4% 的速度增长。

经济在何处首先出现衰退？

- 专家们认为建筑业会不景气。
- 汽车销售一直频频拖欠，供不应求，估计在下一个模型年会有下跌。
- 许多专家认为在以后几个季度会出现存货储存过量，

结果造成年底库存投资的减少。

• 有些专家认为既成事实的货币危机会加速衰退的到来。

这个难题使我感到窘迫。6个多月来，我一直在建议政策制定者转向对付过分高涨的经济。我的建议遭到了冷遇，但这恰恰增加了我的优越感和自信。

政策的困境

然而，那是毫无用处的自负。面对几乎全体专家的一致看法——即我们将进入缓慢的增长时期，我还敢继续建议实行限制性的计划吗？

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所作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信心，因而，我还不乐意站起来与全体专家的合唱唱反调。另一方面，我对预测并非确信无疑，因而无法消除我对下面说法的怀疑：目前的过热经济可能仍然要与 we 相处 1 年之久。

在进行了一番绞尽脑汁的思考以后，我向大家提出劝告：我们仍然应当反对过分繁荣的倾向。放弃渐进主义的错误观点能使我们更清醒地行事；一旦衰退信号不仅仅是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一点微光，我们便能迅速行动。

关于膨胀的谬论 1974年7月29日

这些天来，世界已经证实了它对于简单的经济学是过于复杂的。怎样对这件事进行一番补救？其答案不是抛弃经济学。补救过于简单的经济学的唯一方法是细致的经济分析。而该项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发现因果机制的正确联系。

如果我们想在对膨胀的理解和治疗方面取得一点进展，

我们必须澄清两个普遍的误解。

1. “控制膨胀的失败降低了去年的实际工资。”这是一个谬论。标准工作周的实际工资确实在1年以前就下降了，而这主要是由能源、食物和其他基本原料更加稀缺所引起的。

为了理解这一点，假设我们奇迹般地回到了1900年时灵活变通的经济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能保持总物价水平不变。当食物和能源价格上升时，我们能采用相应地降低其他价格的办法来避免膨胀。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城市工人的工资如何支付呢？回答是以降低了的货币—工资比率支付薪水。因此，膨胀控制并不能防止酋长和衣阿华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城市工人实际工资的下跌。去年，我们没有对物价实行综合性的指数化并逐步提高货币工资，这是多么幸运！其实，试图维持无法维持的实际工资只是徒劳无益之举。

目前的实际供给的结果是造成两位数字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财政部长西蒙在政治上神通广大，强行大砍预算，他对美国和苏联在最近播种季节的降雨却无能为力。如果西蒙用等量的对企业投资支出的税额补助来抵消预算削减，那么这一揽子交易对目前的价格膨胀起不了什么作用。倒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影响目前的膨胀。

备受痛苦

第二个谬论更为微妙。为了理解它，假设欧佩克垄断力量有所削弱，能源的实际价格也稍有下跌，假设世界性的丰收将补充我们不充足的食物储存，并将压低食物和纤维的价格。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每年6—7%的均匀膨胀仍然有其存在

的可能。

2. “我的货币工资以每年 8 % 的速度上升。而生活费用的上涨却达到了 6 %。所以，膨胀骗取了我们正当的生活水平。”

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认为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懊丧。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去分析。人们感到懊丧，这是事实。正如华莱士州长和其他一些因公众在政治上不满而得益的人所清楚和知道的那样，这种懊丧情绪是无法排遣的。

不过，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是不可能把已被骗去的 6 % 的实际工资归还给我们的——尽管他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稳定价格水平方面的成功能超出他最狂妄的梦想。人们自然会把所有 8 % 的货币工资上升看作是他们应得的报酬。不要期望他们能认识到：正是由于正在发生的均匀膨胀，劳动力市场才会把由长期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超过 2 % 的工资增长赏给他们。

教 训

揭露这些谬论并不意味着膨胀是无害的，也不表示我们在对付膨胀时应当手软。只有拙劣的经济学家及会带给我们灾难的政治家才会持这种观点。

揭露这些谬论的目的是想提醒大家：对任何一个对付膨胀的建议，我们都要谨慎地分析其利弊。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我怀疑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对一直出现在报刊头版头条的某些要员所作的错误建议提出超诉。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财政部长西蒙最近提出的方案，他

要在联邦预算中削减几百亿美元的慈善项目且在此同时对企业投资提供税额补助。如今，由于原料稀缺，物价上涨，为维持利润率，实际工资业已下降。在此情况下，故意扭曲已经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实为一大冒险，结果会造成政治上的分歧。因此，制定这样的一种方案无异于搬弄是非，扇起已经熄灭的阶级斗争之火。希思首相和他的保守党正是因为英国推行这一政策而惨遭失败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西方温暖的秋季 1977年7月18日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代表了24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欧洲的非苏集团国家。最近，8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保罗·麦克雷肯的领导下为OECD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报告。该报告的题目是《走向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乍一看，这份报告的调子相当低沉。根据这份报告，这些国家在1980年可达到的潜在产出比在70年代初信心十足地为1980年规划的产出减少了十二分之一。

但是，即使按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去做，实际上，连这些已经降低了的在充分就业下的收入水平在70年代余下的年头里也将无法实现。由于害怕过于迅速的复苏可能会重新如速膨胀，麦克雷肯的报告建议OECD集团在今后几年将实际年增长率的目标定在5.5%。报告把这个增长率称为“重新回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狭窄的通道”。

报告起草者们承认，按他们所建议的这条路走下去，在进入80年代之后，失业率仍将很高，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仍将是严重的。

最明朗的且最好的

请注意，参加这个八重唱的并不是一伙老银行家，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也并非从银行家和商人那儿得来的陈旧的训诫。在所有共和党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中，麦克雷肯是最不保守、最善于搞折衷的。

这些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土耳其和瑞典的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平均年龄比我小得多，而我的年龄又比亚瑟·伯恩斯小得多。在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看来，这个经济学家团体可能“自由”得无可救药，正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冈纳·默雷可能会认为他们“稳重”得无可救药一样。

我认为，鉴于该专家小组在年龄结构上具有某种平衡，因此更需要我们仔细考虑其论断、证据和逻辑以确定他们的悲观程度是否有理。而且，一定程度上的悲观也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上的乐观，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该小组所作的分析，以判断在OECD实行垄断以及自然资源有限的时候西方是否还能增长。

事实会不会真的像麦克雷肯报告起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沿着他们的狭窄通道走下去，到尽头时会有一个“价格稳定”的局面？

我必须公开表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怀疑态度，尤其是因为他们相当一部分的理由看来是建立在轻率的观念之上的——即认为我们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折磨人的“膨胀预期”状态造成的。只要我们能用魔法驱除这种预期，代之以某种好一些的预期，那么，倾刻之间，膨胀问

题的很大一部分便会无影无踪了。他们真是这个意思吗？

光明一面

幸运的是，即使价格水平在 80 年代初不能达到稳定，文明脚步也不会停滞不前。

美国已经不折不扣地达到了该报告指导方针的要求。要是我们能像确信美国已经达到了新总统的经济目标一样地确信，联邦德国和北欧国家正在争取他们的复苏目标，那该有多好！

此刻，想要严肃地讨论 1979 年上半年的经济情况比 1978 年年末的一段时间是好是坏的问题是没有结果的。不过，如果卡特政府能将 1975 年之后的复苏延长至 70 年代末或者更远，那不会存在什么对技术规律和历史教训的违背，了解到这一点是有益的。

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并不意味着将来经济增长会放慢。不过，大可不必为此伤心。富裕本身具有减少进行物质生产的努力的倾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应。只有鸵鸟才会无视能源价格的永久性上涨及原料可能变得更为稀缺的事实。明智的观察家会考虑到这一点，在预测生产率发展趋势时打一定的折扣。

幸运的是，再次细读麦克雷肯的报告，你会知道，今年秋天对成熟的工业社会来说确实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季节。

一个新的经济方针 1979年2月5日

在 1976 年的总统竞选中，被弄得晕头转向的观察家们时常这样说：“真正的吉米·卡特会站出来吗？”现在，总统已经

站出来了，大家看到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民主党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亨利·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不可能写过卡特的国情咨文，而杰里·布朗则可能会写，他强调政府有必要回避如何在膨胀和停滞两大祸害之间寻找折衷方案这一难题。

卡特会偷走共和党的私有财产^①吗？或者，他会不会不仅没有争取到中、高收入阶层，反而还将占这个国家半数人口的收入较低的选民也抛弃呢？在1980年总统竞选之前剩下的20个月中，他的低调经济计划会有机会取得反膨胀的胜利吗？还有，他们能否在无沉重的人道和政治代价的情况下做到这些呢？

让我们来看一些先例。赫尔穆特·施密特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该党在历史上相当于美国的民主党，而且可以肯定不比我们的民主党更保守。然而，为坚决反对膨胀，施密特总理一直在推行必须忍受前所未有失业的经济紧缩计划，施密特的政治名望和政治生命力看来没有因这样一个计划而受到损害。

法国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鼓励雷蒙·巴尔总理下放权力，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然而，大多数法国人由于害怕出现左派侵犯他们的特权和财产那种前景，因而宁愿忍受经济上的萧条。

不需要完美

假定一个开明政党的领袖转向保守而获成功的先例是有

^① 即中、高收入阶层——译者注。

的，那么，卡特的策略能否成功呢？如果卡特必须像德国人那样制服通货膨胀才能连任总统，那么，他的新计划是毫无成功的可能的。新的紧缩计划最多只能把我们9%的膨胀率降至7—8%，而不是降到0，也不是像德国那样达到2—3%。

我不相信在1980年的大选中，总统及其政党的命运与他能否有效地治愈膨胀密切相关。公众只要能够看到，膨胀将不再恶化，并有某些缓慢改善，卡特政府的信誉在民意测验中就有可能上升。（法国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巴尔总理的计划未能使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美国的水平，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下台。）

不要做得过分

我个人对总统新近向右转的做法是否明智持保留态度。不过，这一次我不会将我个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如何制定最佳宏观经济政策以对付通货膨胀的讨论中。

大家也听到人们在争论卡特的预算是否真是紧缩性的。通常，那些不相信卡特的预算是真的紧缩计划的人只是声称，他们更主张长期地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同样，那些认为紧缩预算过于残忍的人常常只是重弹老调，声称应从整个国家经济能力出发照顾人民的需要。

而更为有效的问法是：29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加上明年的联邦储备政策，能够实现政府所宣称的实际低速增长的目标吗？如果我们要避免一场全面衰退，出现更大的赤字是否无法避免？

尽管1978年最后一个季度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经济高涨，

但面对所有事实，我敢打赌，卡特的预测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由于在1979年，商业软弱无力，税收短缺以及失业补助增加，看来赤字可能会超过300亿美元。

我觉得这样的赤字上升在经济上来说合理的。确实，现在卡特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应当谨防可能造成衰退的紧缩政策。全力以赴地反对通货膨胀，而丝毫不考虑实际后果，只会招致以后在政治上的严重恶果。温和的做法往往能在长时期内获胜。

衰退：华盛顿制造 1979年12月24日

美国的私有经济显示出非凡的力量，眼下，它正在为阻止美国陷入衰退困境而作拚命挣扎。

汽车价格歇斯底里的上涨已经影响到汽车销售。紧缩的信贷和昂贵的抵押利率在削弱住房建筑业。

然而，正像我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经济评论家们仍对我们目前是否处于真正的衰退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许多经济学家正为无法作出定论而感到垂头丧气。要是他们魔术般的货币公式能准确无误地宣告经济趋势的走向，那么，他们的虚荣心会得到更好的满足。当他们必须分析的资料是来自华盛顿——即来自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而不是汇自各地的商业信息时，他们会感到他们的经济科学不那么牢靠了。

我不得不对此表示异议。社会进化并没有为经济预测家们创造一个伊甸园。我们是领取薪金来忍受——并评估——这种含糊不定的现象的。

更重要的是，我宁愿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

克和总统卡特来策划一场衰退，而不愿让瞎眼的大自然来干这事。人干的事，可以由人来推翻。而上帝和魔鬼的行为则更难判断和修正。

过去的一年

为了证实你将其指控为乐观主义的那种观点是正确的，让我来回顾一下1979年。圣诞节是一年中经济的最高潮，因此，我们现在来搞一张计算表。

史书会把1979年记载为“轻微衰退”的一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美国每年3%的增长势头。

就业情况出乎意料地保持良好。由此可以推断1979年的生产率可能是很糟的。

这是否意味着利润下降？剔除膨胀因素，我们发现利润还是出奇地高。企业界发现他们能普遍以提高价格的办法将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我发现只有一个途径能缓和生产率的下降。以后的经济史学家会发现，每人、每天或每小时的实际工资已大幅度地下跌。而所有这些情况的发生并没有伴随不寻常的罢工和阶级对抗。要弄清楚这幕戏剧是如何地独特，你最好注意一下西欧的情况，西欧工人还没有经历任何与此类似的实际工资的下降。

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将我们实际收入的下降归咎于“通货膨胀”。正如一位顾客在电视摄像机前所说的那样：“我讨厌通货膨胀。膨胀从我的炖锅里拿走肉，只留给我土豆和萝卜。”

说得客气点，她弄错了美国实际工资下降的原因。真正

的原因是：(1)实际能源价格的上升；(2)国内外农业收成变化所引起的农作物实际价格的升高；(3)工业生产率过低。

假设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成功地避免了所有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那么，那位顾客炖锅里的肉还是会减少——还是由于上述3个同样的原因。

即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这3个因素也仍会以降低我们货币工资率的方式产生其影响。但要使现代混合经济接受如此明显的工资削减，大街上非发生流血事件不可。我们大家都诅咒通货膨胀，这诚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膨胀对不可避免的生活水平调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将到来的一年

我对1980年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在今后12个月内，物价指数只上升11%，而不是目前大约13%的年增长率水平，那么，我最好的愿望也得到了实现。

如果私有经济看好，并无明显畸形发展，那么，我们为什么预期1980年出现衰退呢？我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有信心的：货币充分紧缩会导致货物滞销，而且，我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因为通货膨胀厉害而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会造成衰退。我记得，卡特总统曾向世界许诺，美国在1978年11月1日会出现一场衰退。11月6日，即保罗·沃尔克突然发动“深夜大屠杀”的那天，总统的借据提交付款了。

我并不认为有人会有制造一场严重衰退的政治意愿。那就是为什么我打赌在今后的9个月中美国会发生温和收缩的原因。除非伊朗局势不稳定给世界石油供应带来不利影响，

否则西欧和日本再多不过出现增长性的衰退。

目前的这种情形会不会造成华尔街的恐慌？谁也说不清。我觉得经济衰退并非与证券价格暴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新问题水火不容。

与通货膨胀共处 1980年2月25日

我年轻时，曾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布拉特剧院看过克利福特·奥德茨的一出无产阶级戏剧，剧名为《等待左派》。演出中，我们观众也是整个戏剧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工会会议上，大家就是否要举行罢工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于是一种悬念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然后，戏剧进入了高潮。一个信使走到剧院后部，告诉大家，“左派”已遭枪杀。于是，罢工开始了，资本主义之墙将面临倒塌的危险。

对有价证券的管理者来说，当他们等待衰退的到来，并使他们从长期证券损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忧虑同样也在与日俱增。自从1979年4月份的愚人节以来，预言家们一致认为一场衰退在所难免。但对他们来说，灾难不会马上到来。尽管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过去一直断然否认不久会发生衰退，但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兹在最近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却对我们将要经历一场为控制两位数物价上涨而必需的衰退表现出明显的乐观。

僵 局

同时，尽管美国经济步履维艰，但至今尚未出现明显的增长性衰退的迹象。底特律合作得不错，停止了小型汽车的供应。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下决心控制货币供

应。建筑业的优势已经下落，不动产的买卖面临着稳定或下跌的房产价格——至少暂时是这样。

但消费者正在不断减少其银行储蓄，以此来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得不至于像他们的实际税后收入的下降那么厉害。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库存过量。股票市场像是在寻找涨价的理由。工厂与设备的投资者好。新的国防定货计划帮助我们消除对衰退的忧虑。

认为人们的这种悬念不应持续很久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而且，你也许会争辩，要是遇上一场严重衰退或过热的增长，事情可能会比经济的不景气更糟。

目前阶段的轻微衰退使人感到如此懊丧，是因为美国经济还未显示出任何征兆以表明通货膨胀正在减缓。货币和财政当局所推行的计划的全部目的不是为放弃增长而放弃增长。会加剧失业缓慢增长的计划的制定不是出于虐待狂的心理，也不是出于对非熟练工人、年轻人及非白人工人的敌意。这场游戏的名义是反对通货膨胀。

由于国外石油价格上升及国内油价对世界水平攀高，加上金属和纤维价格在有组织的期货市场上被不断抬高，在此情况下，即使出现所期望的微弱衰退，基本通货膨胀率也很可能不会下降多少。

我已经引用了保守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会议上讲过的一段话：“如果你们正在为我们安排一场极其轻微的经济衰退，那就请不要自找麻烦。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真正需要的是发表一项可信的声明，告诉大家，为了将我们带到物价稳定的道路上去，华盛顿将会允许严重失业的存在（只要有必要）；并向大家表明华盛顿有铤而走险的意愿，不管短期失业、

生产下降、利润骤减的结果会使政府在政治上多么不得人心。”

严酷的真理

即使美国选民在11月份会转向保守，我怀疑美国政治制度也不会给他们做他们想做的实验。然而，根据有关经济事实，我并不像他们那样乐观地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为走出滞涨所付的代价不高。

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是谁当选为总统，美国人都将与通货膨胀长期共处。

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铁一般的事实——严峻地摆在必须与之共存的我们的面前。如果你不是鸵鸟，你就会想了解这个事实。

大部分总统候选人都避开这个问题。你可以推断共和党候选人会愿意比卡特总统在失业方面付出更高的短期代价。只有爱德华·肯尼迪准备对汽油实行配给制并冻结价格和工资——但这种货色能卖得出去吗？而吉米·卡特处于并不舒服的折衷地位。

控制的情况 1980年3月3日

卡特的经济战略明显脱轨了。通货膨胀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正在加剧。计划中的衰退在继续躲避华盛顿。

这是赛劳蒙兄弟公司的主要合作者、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上星期告诉银行家们的话。当他说出他赞成推行一项全新的方案、实行全面的经济控制时，华尔街一片恐慌。

直到最近，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赞成工资—价格控制。不过，现在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的阵营在不断扩大。加上2个月来生活费用以18%的年增长率上涨，卡特总统就很可能在1980年结束之前被迫要求实行控制。

巴里·博斯沃思——原卡特的工资和价格机构的负责人、而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最近表示，他赞成和反对控制的对比是1:99。不过，博斯沃思博士赞成给一次试验的机会。我以1:2的赌注打赌，卡特先生会被迫改变他反对直接控制的立场。因此，这个问题值得一番详尽和客观的讨论。

困难的选择

有没有其他方案可取代工资—物价控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方案可供选择：

- 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政府当局可以抛弃其渐进主义方针，现在就行动起来，采取严厉的紧缩信贷和财政政策。说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导致衰退是一回事；说当局很想来一场经济衰退而又无力制造一场衰退是另外一回事，并且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采取此政策可能意味着主要利率在短时间内会上升到20%，货币总量持续数月下跌，今年的非国防开支剧烈紧缩。）

- 当局可以继续奉行稳健的逐步限制政策。幸运的话，18%的膨胀率可能会降到13%，进而下降到所希望的9%。在5到10年的紧缩期内，失业率平均升至8—9%，实际产出勉强以1—2%的年增长率缓慢上升，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是非常艰难的。不过，这可能会实现对美国通货膨胀的逐

步控制。

·我们可以对滞涨应付了事，得过且过。如果我们不愿忍受较为严重的衰退，我们就得冒以下风险：主要膨胀率可能在80年代中期超过一位数，到80年代末则更高。这是因为物价稳定已成为历史并不意味着青草一定要长在大街上，文明已到尽头。

考虑到上述方案的弊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接受控制。

直接控制可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下面两种不同的控制：选择性的信贷控制和工资—物价控制。像纽约许多保守派和中间派的经济专家一样，亨利·考夫曼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警告人们：利率极限点的突破和对自由获取信贷的高利率成本的完全依赖，将意味着联邦储备委员会控制活动力量的减弱，同时还必然导致利率摆动幅度更大。（如果在1972—1973年间以及在1978年，总统就使用其权力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机构在信贷方面安排优先次序，且对借款实行直接限制，那么，就可以实现减缓总体经济活动的设想，并使利率不至上升得如此之高。）

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们是否希望1980年汽车工业和建筑业的下降比看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更为萧条？消费者令人惊异的购买力在非耐用消费品方面。因此，信贷控制的好处在目前还不是关键的。

主要争论

目前卡特和肯尼迪分歧的关键点是工资—物价控制和汽油配给问题。如果选民对汽油配给有胃口，那倒可能是强加

真正的能源短缺的一个办法，这样，又不会使这种短缺成为官方价格指数上升的成本推动力量。因此，这就成为一个政治上是否可行的问题，对此，我不予讨论。

40年来，有十多个国家实行过直接的工资—物价控制。其经验可归纳如下：

控制在1年中往往非常奏效。这以后，强制性的控制逐渐变得不起作用、没有效率和不公平。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膨胀问题是不是混合经济中反复出现的滞涨所导致的困难局面，而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现象？1年以后，我们干什么呢？

滞 胀 (I) 1973年9月3日

生活费用在逐月上涨。我们家庭预算所有项目的费用在不断上升，而昂贵的食物价格仅仅使这一事实变得更具有戏剧性。甚至由于你资历加深及工作出色而提高的工资也只好够支付生活费用。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他的实际收入无疑不能像过去那样得到稳步改善。对于更不幸者，他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

因此，7%的膨胀率是当今人们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如果总统能对此有所作为，那么，这将会比任何一项别的行动更能提高他的声誉。如果国会能利用自己在水门事件后的影响来治愈膨胀疾病，那么，民主党将会卷土重来，重振声威。

当然，问题并不容易解决。除非实行彻底的配给，否则价格控制不会使肉多起来，也不会使其售价变得便宜。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而且这种做法只要经过

一段时间的延迟，将会给经济带来萧条。

要是存在容易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早就尝试过了。若老是说是水门事件使得显然必要的行动陷入瘫痪，那么，这肯定是不动脑子的胡说八道。如果尼克松总统在戴维营 1 周的 7 天里没有考虑任何事情，那他和他的顾问们是提不出能使目前的通货膨胀转变为物价稳定、持续繁荣的计划来的；同样，国会和来自常春藤联合会、苏黎世银行或麦克索利沙龙的专家团体也提不出这样的计划。

背信弃义的联邦储备委员会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是不是把问题都交给联邦储备委员会去处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任务是管制货币供给。可是，事情不好，伯恩斯博士和委员会的其他主管人员也不知道如何控制货币供给以达到下列目标：(1) 将失业率维持在 5% 以下；(2) 使物价上涨率指数在年底以前降到 5%，下一年降到 4%。他们更不知道如何恢复过去曾被委婉地称为“合理的稳定物价”的局面。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威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批评的夹攻。当膨胀一出现——至多是 4% 的增长率，货币主义者认为这些权威们就乱了手脚，随随便便地让货币供应增长率上升 7%。另一方面，在货币市场上，人们指责联邦储备委员会使利率升得过高，几乎制造了一场货币危机。抵押贷款及其他基金越来越难以得到，且昂贵得出奇。如果允许这种危机继续下去并进一步发展，从事金融活动的人们会认为，在投资和消费支出方面出现不可逆转的减少的不祥前景就在眼前。

我本人并不厌恶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指责。没有其他事件能比这更多地增加一个经济学家专业上的知识和他的自重感。然而，如果不是出于慈悲，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需要大家认清，有责任感的权威必须在 一根折衷的细绳上行走。

腹背受敌，进退两难

一方面，中央银行不能使目前的高通货膨胀率长久合法化。同时，与 10+% 的货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应的货币增长率是不能接受的。

另一方面，联邦储备委员会被教训说——不仅仅是从货币主义者那里——货币政策要经受长时间的延迟方能见效。所以，如果以低于 5% 的货币增长率来对付目前的物价膨胀是过于凶猛的，那么，这个政策将到下一个情人节才见效，而那时几乎每一位声誉良好的预测家都会认为我们早已进入增长性的衰退。

那些现在吵着要实行严格的限制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人已经丧失了时机。去年秋天，而对下一年可能出现的过于高涨的经济势头，我们这些敏感的观察家曾建议实行宏观经济控制——降低货币增长率，甚至使它低于 4%，削减国防开支和其他不处于社会优先地位的开支。那时，他们在哪儿？有哪位主张收缩的强硬人物会真正指望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甚至能跟上我们劳动力和生产率的上升步伐？没有谁会把钱押在这个问题上当赌注。

评论家们如此大喊大叫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私下认为，衰退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需要的。

下一次，我想对这种观点的是非曲直进行一番探究。

问 和 答 1975年5月6日

在这儿，我将对这些天来人们不断向经济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作出我最好的答覆。

问：膨胀消除了吗？

答：事实表明，在目前和年底之前，年膨胀率将由1974年的两位数字降低到4—7%左右。如果世界性的丰收、中东和平和正常的生产势头能够有幸维持下来，那么，明年这个时候的膨胀率就能够保持在这个范围。

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我们在回到价格稳定的路上去。也没有人能够担保膨胀再不会重新加剧。

问：衰退处于何种状况？

答：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很糟，专家们能比以往更肯定地断言国民生产总值的最低点即将临近。为了机会均等，你还应当与意见一致的预测家打赌：他们是哈佛大学和数据资料公司的埃克斯坦博士、研制蔡斯经济计量模型的埃文斯、还有研究沃顿模型的克莱因博士。180亿美元的库存积压在6个月内的大量减少为使库存接近令人满意的水平带来了希望。该水平一旦达到，总的消费和生产就可能趋于上升。

较为缓和的通货膨胀也是有帮助的。而不久将会实施的减税则提供了最后的保证。

现在还不能确定，复苏是否能在年中之前到来，其步伐是否能令人满意。建筑业和汽车业可能不会马上对宽松的信贷和财政刺激作出反应而得到振兴。历史遗留下来的失业率上升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达到4%的水平。即使我们现在处在衰退的最低点，失业率

还是有可能超过 9 %。

问：经济学家不再意见分歧？

答：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既然我们有减税法案，那我们自然会在这件好事是否过头的问题上有分歧。

问：赤字是不是太大？它会引起不健康的、过于迅猛的扩张吗？它会挤投资出去吗？

答：让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请弄明白，价值判断和客观的经济科学都必须包含在政策决定中。代表纽约市一个少数民族选区的议员雪莉·蔡勋与代表依靠固定养老金生活的退休选民的佛罗里达的一个议员对于赤字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会完全不同。他们各自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的忍耐力是不同的。即使他们凑巧在某个方面对某些可能性持一致的意见，但他们在权衡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减缓未来的通货膨胀这一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妥协。

下面是几个主要结论：

1. 赤字不是不可控制的，远远不是。国债券可以出售。
2. 1 美元赤字不会等于吞掉用于私人投资的固定资本中的 1 美元。因此，不管“挤出效应”的含义是什么，它不意味着每增加 100 亿美元的赤字会取代原来能形成的 100 亿美元的设备、建筑和库存资本。
3. 如果这个赤字会引起过于迅速的生产 and 就业复苏，能强化“需求拉上”的价格、工资膨胀，如果这个赤字会抬高利率，结果致使大量的资本形成活动不再能获得所需的信贷，这时，这个赤字是“太大”了。如果这个赤字迫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创造过多的货币，从而有害于复苏时期的经济，这时，这个赤字是“太大”了。

问：好，我们的赤字是否过大？你是在告诉我怎样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我是要你以你专家的判断为我回答这个问题。

答：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以后，我认为1975年需要的赤字比我们在和平时期任何时候的赤字都要大。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赤字大约是840亿美元——这会吓坏那些外行，而这仍然不过是6%而已。

有这样的财政赤字，1980年的物价水平会比没有这么大的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稍高一些。然而，如果是一心一意追求物价水平的稳定，那么你必然会赞成继续衰退，甚至希望陷入萧条。

复苏时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谨慎的目标至少是6%。成功的结果能证明冒险是必要的。用合乎理性的眼光研究一下可行的经验模式，就知道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没有实际风险的令人满意的行动方案。

货币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6年10月25日

很久以来，经济学界的同行们一直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76年荣获该奖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对值的科学贡献及学术上的领导地位的承认。

我没有必要再在这些专栏中描述他作为一个保守的经济学家的重要观点。要了解值的观点，最好还是去读值本人的著作。

我必须强调的是，弗里德曼不只是保守派观点的一个解

释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保守主义传统的相当一部分精华成分的创立者。此外,“保守”这个形容词用在这样一位思想家身上并不合理。他会拒绝对钢铁工业实行进口配额,会取消得克萨斯的石油补贴,会取消铁路和公路货运利润的保护性规则。

为什么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我们来看一看以下几个方面。

履 历

他在拉特杰斯读大学本科时是亚瑟·伯恩斯的學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后,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明星。

注重人的自由和市场定价效率的“芝加哥学派”可以说是由弗里德曼尊敬的老师福朗克·奈特创立的。现在,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这一学派在其影响及理论深度方面都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今天的麻省理工、哈佛、牛津以及任何一个第一流的经济学系都有持芝加哥学派观点的教授。如果成果辉煌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没有在这些学府得到反映,它们就会有知识贫乏和片面之感。这个新的事实本身就是对弗里德曼这样一位伟大导师的赞扬。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是因为他们有独到的科学见解。弗里德曼早年在统计学和数理经济方面曾有所建树。作为一个非凯恩斯主义者,他曾在收入—消费模式的预算衡量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二战期间曾指导财政部如何缓和通货膨胀。亚伯拉罕·沃尔德在被称为“序列分析”的统计技术方

面的重大突破部分地是从弗里德曼那儿得到启示的。弗里德曼说过：要想证实一窝蛋是坏的，没有必要对每个蛋都进行检查。这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牛顿的自由落体苹果现在看来也很简单。

如果保险对减少风险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怎样才能使以支持不大会成功的尝试来增加风险的做法值得一试呢？弗里德曼(和L·J·萨维奇)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另外，弗里德曼(和西蒙·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首次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分析和测量。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我们在医疗教育和其他教育方面的投资以及由这个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富人从每个美元中节省的是不是比穷人节省的要多？如果真是这样，把财富从富人那儿转移到穷人手中的收入再分配会提高消费支出并刺激商业活动。弗里德曼对“永久性收入假说”的研究表明，一旦我们习惯于收入的永久性上升，我们存款的比例事实上并不会改变！这个发现经受住了他对手的攻击，这一点表明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货币主义是弗里德曼在最近20年中所作的重要工作的特征。他与安娜·施沃茨合作的不朽巨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奠定了他的国际名望。

完成的使命

事实告诉弗里德曼，物价水平从长远来讲是由货币总量决定的。与1939年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及1959年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顽固观点相反，货币供给的短期波动提供了与名义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一半确实有关的一个因素。鉴

于其他因素基本上都是噪声，货币增长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由此，他得出了他的基本法则：保持总量货币以不变速度增长。

我还没提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活力和欢乐、他的机警的聪慧以及在争辩中那永恒的谦逊。世人因为他的成就而仰慕他，而他的亲密朋友则因为他本人而热爱他。

尽管我与他之间在政策主张和科学见解上有分歧，但我们已经保持了40多年的好朋友关系。这一事实也许说明了几分我们之间的友谊关系，但我敢说，更多的，它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还是一个好年头吗？ 1978年2月9日

既然G·威廉·米勒已经接替了亚瑟·伯恩斯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货币政策会有什么变化？人事变动后，预测家会有何反应？我们估计的不确定性是否在增加？

当杜鲁门任命司各脱造纸公司的汤姆斯·B·麦克凯伯接替马里内尔·埃克列斯时，他发现很难继续搞埃克列斯的那一套。同样，坦克斯特隆的米勒也将不得不对付伯恩斯留给他的疑难问题。

对伯恩斯离职的最初反应是令人欣喜的。普通股票的行情在几小时内有所恢复。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波动比人们所担心的要小。

我在坦克斯特隆的股票在米勒任主席的几年中情况一直很好。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与米勒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共事过的经济学家——诸如过去的民主党顾问、哈佛的詹姆斯·杜森贝里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梭罗——都对

米勒的才智、创造性和为公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

当我们经济学家运用计算机模型研究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新方针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膨胀的估计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采用一系列新的合理假设，得到的结论是，1980年的消费品价格水平的变化不会超过半个百分点。

勉强的折衷

问题的另外一面是，要想在失业率方面取得很大改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新的最高法院比一个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更多的真正的自主权，因为最高法院不必每季度向国会汇报。可以预测，米勒领导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将继续在压缩过量货币增长和抑制利率过度上升方面寻求非常勉强的折衷。

虽有上面的情况存在，但对美国经济而言，今年应当是个好年头。有证据可以支持下列有关1978年情况的估计。

- 有2:1的可能不会发生失业加重的增长性衰退。
- 有5:1的可能不会发生实际经济负增长的衰退。
- 几乎百分之百不会出现类似30年代的大萧条。
- 有10:1的可能不会再出现两位数字的物价膨胀。
- 百分之百没有可能实现物价水平的真正稳定。

情况之好还不足以实现吉米·卡特所许下的为年轻人、非熟练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诺言。那些为仍在继续的通货膨胀及美元汇率疲软面担忧的人还会坐立不安。股票市场还将受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人们对未来的担忧的影响。

40位第一流预测家中的30位认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第四个年头而言，前景不坏。德国和日本的预测家只希望他们国家1978年的复苏能够像有事实根据的美国预测家所描述的我们的前景一样乐观。

对预测家而言，自鸣得意是最大的罪过，也是最无法抵御的诱惑。我之所以总是觉得很有必要密切关注对普遍看法抱怀疑态度的少数派的意见，原因就在于此。

蔡斯经济计量模型在一年之前也是持悲观态度的，现在它认为我们正处于增长性的衰退中。根据该模型所作的预测，到今年秋天，失业率会从6.9%上升到7.4%。我同意下而的说法，即目前汽车销售的不景气很值得注意。不过，所有这些事实并没有表明，存货购买的减少会像蔡斯模型所预测的那么猛烈。

衰退的观点

奥古斯研究公司为华尔街的顾客们提供了不很严格地以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理论为其依据的预测。根据该公司的预测，1978年会有一场增长性的衰退，且这场衰退将会因下面几种原因而变得更加严重：到年底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8%，长期利率上升到9.7%，普通股票指数下跌。

另一方面，吉地班克银行的预测家却不同意奥古斯的悲观论点。芝加哥哈瑞斯信托公司的金融家甚至更加乐观。

今年10月份对家庭和公司实行大规模减税一事，预测家们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同意有这种可能性。

鉴于上述事实，我认为1978年经济复苏将继续下去。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亚瑟·伯恩斯为我们留下的知识是可靠的。

我为他，为一个时代成为过去而欢呼。

现实的希望 1978年10月23日

最近，我就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问题对一个金融集团发表过一些简要的看法。于是，就有人指控我对经济形势估计过分乐观。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一门沉闷的科学，因此，对我的这种指控就显得十分新奇。指控的大意是：

“按你的观点，美元疲软只不过像一场重感冒。既然1978年的发展开始显露出类似发生在1973年的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国际性衰退的前兆，你却声称觉察到了德国及其他地方复苏的信号。眼看公债增加，赤字严重，你却连假惺惺的眼泪却不屑一流。你有什么事可担忧的呢？”

这些问题提得好。不要相信轻松快活的外科医生，要谨防那些善于甜言蜜语的经济学家。

是的，我忧虑甚多。的确，我必须分配我一天24小时的时间，集中精力去考虑最严重的问题，丢开完全不必要考虑的事情，将次要问题留给业余爱好者去研究。

美国会衰弱吗？

我不断收到关于美国经济在1979年下跌的预测报告，这使我非常不安。根据这些预测，美国经济不仅仅是出现增长性衰退，即低于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而是出现负增长。

举例来说，布鲁金斯学会的乔治·佩里现在预期明春会出现负增长。这些年来，我对他为沃尔特·海勒所作的预测的平均准确程度作了统计，在我的档案里，他的预测结果是比较出色的。因此，当他的信号灯由黄色变成红色时，我就

予以关注。

尽管一些大银行也作出了美国明年会有一场衰退的预测，但持这种观点的预测家仍占少数。就连最精明的评判家也不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贸然发表看法，这是因为——正像我经常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在经济科学中似乎也存在着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超过了一定的精度范围，即使我们有最好的计算机及最新的数据，我们也不能刺破偶然性的面纱。

决定沃顿和DRI模型是否正确及衰退模型是否错误的未知因素是什么？以我的判断，这不是减税争论的结果。我相信，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货币供给上的政策对估计1985年的价格水平是重要的，不过，对新兴企业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因素。

最大的无法正确估计的因素是未来的库存行为。DRI觉察到库存水平相对商业销售和生产似乎偏低，于是预测未来库存增长不会骤减。佩里的衰退模型及制造商汉诺威银行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你们认为库存倾向于减少，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不同的预测模型中的重要部分。

其他争论

在国外，人们有理由更乐观一些。二战以前，所有国家都倾向于有同一个商业周期模式。在美国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也同样出现了繁荣。而在1973年之前，凯恩斯的新时代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在打破世界范围的一致的商业周期的共同步伐了。

哎呀，1974—1975年的衰退好像是对更为古老、更为恶

性的模式的一次重复。在 1972—1973 年间，日本、印度、北美和欧洲一起哄抬物价。在 1974—1975 年间，这些国家又一同陷入困境。

我觉得没有充分理由能说明美国出现近期衰弱。国外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衰弱。从 1975 年初到现在，美国的复苏势头一直比国外有力。

德国和日本政府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拒不接受美国政府的劝告，不愿像美国那样促使经济高涨。他们现在承认自己是错了。更为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刺激政策正在开始奏效。如果德国的新的发展速度能够维持，法国、意大利、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能更安全地进行经济扩张。

因此，只有指控我犯现实主义罪，我才会服罪。

美国的信用危机 1980年3月17日

我们正在进入一场真正的货币危机。我刚刚和一位经营一家规模很大的租赁商行的经理交谈过。他现在每年要为信贷交付 29% 的利息。因此，他目前的日子很不好过。

我们东部的一位教授在南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但她保留了在东部的房子，没有在波士顿疲弱的市场上出售。而她的家庭在新地方需要有一所房子。因此，她在那儿做了一笔廉价的交易，交了一笔款子，同时她抵押了她在波士顿的房屋，想以此取得 18% 的二次抵押贷款作为在南方付款的补充。但可怕的消息刚好传来，波士顿银行已经停止以任何条件提供抵押贷款。

西部的一所商业研究生院的一些助理教授喜欢根据他们

自己的经济分析投放他们的钱。上个月，由于汽车销售在下降，房屋建筑业势头在减退，他们确信利率已达到了顶点，因此，他们的辛迪加的每一位成员都为芝加哥贸易委员会期货市场上的国库券交易投机提交了5000美元的保证金。现在，他们输得精光；辛迪加解散了，他们的妻子在发怒。

严峻的考验

由于谨慎的存款人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现在利率已达14%的货币市场存款中，信贷协会的存款每月都在减少。为了降低货币的外流速度，现在信贷协会不得不使其利率与公债的市场利润相匹配。一些信贷协会不敢将抵押业务上所得的收益留为专用；它们自己也在纽约货币市场上投资，以捞取微不足道的差别利息。这是一个非常伤脑筋的生存方式。

你还能成倍地举出这样一些轶事。在一个银根紧缩的时代，这样的轶事俯拾皆是。尽管信贷紧张的影响对毫无准备的受害者而言看起来很可能是无情的，但以限制货币的办法来对付膨胀会按我已描述的方式产生影响。

影响的产生是缓慢的。汽车销售业和建筑业在走向萧条，住房价格的暴涨还未转向暴跌。然而，新旧房屋的价格指数对消费品物价指数的比率已经下跌。

要是在过去，这种情况下会有大量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一下子破产。在金融危机中银行和保险公司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是很常见的事。抵押物的出售是市场机制重新发挥效力的一部分内容，它通过矫正过正的通货紧缩来消除通货膨胀。

甚至连西尔斯—罗伯克邮购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萧条中也几乎到达了穷途末路。要不是朱

利叶斯·罗森伍德拿出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附属担保，那么，西尔斯—罗伯克邮购公司很可能就像那时的许多其他企业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危机是不是差不多已经过去？我不相信那些宣称能够非常精确地预测这种转折的人。要估计短期利率什么时候达到最高点，必须确定预料中的衰退什么时候会真正成为现实。要确定利率会从目前 11—20% 的水平降回到更正常的 8—11%，必须首先找出年物价膨胀率正在降到一位数的迹象。

传 说

几乎没有哪位预测家还认为 1980 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有下降。至于第二季度的实际产出会不会有一个较明显的下降，现在还很难说。

通货膨胀率能否及早下降的前景甚至更加捉摸不定。消费品物价指数仍将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主要是因为石油价格和家庭用品价格的抬高。关于即将冻结工资和物价以及采取新的选择性信贷控制的传说引起了预期的物价上涨。尽管去年工会争得的工资增加相对物价指数的上升来说是不高的，但关于钢铁工人工资的讨价还价的传说使人感到工资非涨不可。

我们这些不需要借钱、手头有可用于投资的灵活资金的人将努力渡过危机，保住我们的不动产。我在上个月关于投资要谨慎、要不慌不忙的忠告恰逢其时。

很多来信问及免税货币市场资金的问题。让我强调一下，只有那些收入远远超过 50000 美元的人才应关注这类深奥

的问题。

经济形势如何？ 1980年4月28日

我在美国及国外讲学时，经常有人问我一些同样的问题，即：

- 衰退已经开始了么？
- 利率何时达到最高点，又何时向下降落？
- 通货膨胀会更严重么？或者，如果能看到某些缓和，那么，我们能指望膨胀率下降多少呢？

• 银行会破产么？谨慎的人是否应当将他们的普通股票换成现金，购买土地、黄金、钻石、古董、邮票，在树林小屋里贮藏食物，用枪支防范盗贼？精明的人是否应在瑞士、巴拿马或库拉索岛开帐户？

• 11月份的竞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卡特总统的新的信贷方案和财政计划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上述问题对知识最渊博的人来说已经够伤脑筋的了。但更困难的是以下的长期性问题：

• 在80年代，是否会拉下经济增长的帷幕，宣告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得到普及的进步模式的终结？

• 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保守主义重新复活的时代，回到新政前的经济模式？

有根有据的猜测

首先，我用一句老生常谈来警告大家：经济学远非一门精确性科学。下面，我来谈谈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

20% 的利率会将 1979 年的增长性衰退变为 1980 年的全面衰退。生产水平在年底即将下降。失业率在竞选日还会上升。公司的利润率将会下降。

这事是否肯定？当然不能肯定。你可以以 2:1 的把握打赌。

我怀疑现在我们正在接近利率的最高点。如果通货膨胀继续恶化，那上述判断有可能不对了。但如果随着亨特兄弟公司垄断白银市场的失败，主要产品价格暴跌，那么，债券价格持续上升的日子就可能提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不会阻止由普遍的经济衰退所引起的利率下降。

仲夏以前，利息和食物价格会下降，这样抵消了还在上升的能源价格，因此，目前 18% 的年膨胀率将降到 10—12%。这样的前景还是令人烦恼的，但至少是对最近情况的改善。（警告：对经济计量学家来说，价格水平是最难预测的变量，此外，他们对膨胀的估计一贯过份乐观。）

对那些渴望保护自己的储备金的人来说，灾难的预言家是冒险的领路人。我知道，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在黄金、不动产方面得到收益。而我知道有更多的人未能捷足先登，因而情况不妙，买下的仅仅是那些故意制造恐慌的经纪老手以高价卖给他们的不可靠的资产。

最精明的大投资家在滞胀时期会尽可能减少实际财富方面的损耗率。我只能提供带有一丝安慰的建议：

避免拙劣的错误。分散购买不同的证券。不要想达到不可能达到的完善。这样竭尽全力，就可以安心睡大觉了。

未 来 论

大选之前，这场衰退的严重程度会如何，会持续多久？对

这个问题，你必须保留你的判断。我对有关卡特的新的计划的几种分析进行了一番研究，所有这些分析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

卡特的紧信贷和紧预算计划将使今年实际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并使今年的膨胀率稍有上升。卡特计划所带来的利益只有到1987年及以后才可能逐步增加。

如果下一届总统决定采取坚决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以对付膨胀，那么，衰退会加深，且持久。从瑞士、联邦德国和日本所得到的事实看，恢复合理的价格稳定的轻松的办法是没有的。我真希望我们能依靠某种新的“供应经济学”来制服滞胀，然而，这样的经济学并不存在。

我应当报告一下，目前有一种新的学派，即所谓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态度乐观，认为只要政府能使人民相信它有决心消除通货膨胀，则无需经受多少痛苦就可做到这一点。不过，历史上没有人尝试过，理智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美国经济还有潜力实现正增长。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怀疑在目前到1981年期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展望 80 年代 1980年12月15日

我在欧洲作巡回旅行时，了解到外国人对里根的重大胜利甚至比我们更感到惊奇。而他们适应新的现实的速度是异乎寻常的。

一位第一流的奥地利记者问我，里根的计划将怎样才能在大增加军事支出的同时成功地结束通货膨胀。他问道，“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你是否相信会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出现能使这一切都成为可能的供方奇迹？”谁也不应事

先相信尚未成为现实的奇迹。在事成之后，再不相信也是极其困难了。有人认为资本形成会在以后几年激增，还有人认为肯普—罗斯建议的税率削减 30% 会增加而不是降低税收，我觉得这些说法证据不足。

幻 灭

我不得不纠正一个基本的误解，我在丹麦和英国所碰到的商人也有这个误解。他们的观点似乎是：罗纳德·里根是在美国人中树起新繁荣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希望后才入主白宫的。依我的评价，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后凯恩主义政策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已使人们失望。人们知道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能断定卡特总统未能带给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给共和党带来压倒性胜利的选民对新班子有真正的信心，相信他们会在经济方面大有起色。在两害中作一选择时，你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比较好的就是非常好的。

当代美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的期望已经降低。这似乎是对 70 年代的情况的一种理性而非病态的反应。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80 年代，今后 10 年的经济合乎情理的前景会怎样？也就是说，里根政府应取得哪些成果才算称职？

在此，我想借助一个著名的私营经济研究机构在 9 月份所作的竞选前预测，对未来作一番探究。

好消息是，从现在到 1987 年，每小时的实际收入将会上升。这扭转了自 1973 年以来由于物价上涨比货币工资上升

更快而导致实际工资下跌的局面。

如果这些研究人员是对的，那我们的经济将不会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斯劳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那种零和对策。由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以 2% 的平均年增长率上升，我们有一张更大的馅饼可以在工资、利润和政府之间进行分割。公司利率将比总物价水平上升更快。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坏消息。自 60 年代以来，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这个研究小组通过计算机计算估计到 1987 年失业率的平均水平将达到 8.3%。这意味着每 12 个想要工作的美国人中有一个人找不到能接受的职位。

不仅美国的增长率只有约翰·F·肯尼迪所追求的目标的一半，而且今后几年的失业率也将达到 60 年代平均水平的 2 倍。这就是这个时代美国人已经学会与之共存的悲哀现实。我们是否至少能取得价格稳定？许多选民认为，这值得作出某些牺牲。不过，这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的前景并不乐观。

未来的价格

据这个小组的计算机统计结果，在 1960 年到 1973 年期间，消费品价格指数平均以每年 3.2% 的速度上升。同样，根据这个预测，在 1982 年到 1987 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将上升 9.4%。

由于最好的预测家对价格水平的预测也不会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看到，在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两位数字物价膨胀的可能性是明显存在的。

竞选的压倒性胜利会不会使这些预测过时呢？这可能取

决于一个还没能得到解答的问题：罗纳德·里根是像轻松的艾森豪威尔，还是像好战的撒切尔？那些最可能被里根任命为重要内阁成员的人，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我看没有理由对前景乐观。

3

市场的优点

我们能否指望市场提供生活必需品？萨缪尔逊的例子说明：私人投机商起了使食品市场趋于稳定的作用，私人 and 政府方面的适当囤积不会改变平均价格水平。因此，无论丰收年还是歉收年，市场上都购销两旺，但总的价格有所升高，以致最穷的人无力购买。

对于能源问题，萨缪尔逊提出了两个明确的对策：自由市场对策与全面计划对策。但他又悲叹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些文章中，他证实了两种方法均为有效，而他所推崇的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据萨缪尔逊看来，由资源匮乏决定的一般美国人分享收益的程度是国家的法律问题，不是那些坚持要严格解释产权概念者的事。萨缪尔逊对社会的看法考虑到了由于互惠原则而存在的公共利益，但他认为应允许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是基于“在有效的经济活动中，供需双方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上的。还有，他不相信

无限制的自利一定会促进公共利益的说法。

市场与计划

起缓冲作用的粮食储备 1977年6月6日

我们都还记得70年代初的那些荒年。苏联小麦生产连年不景气，撒哈拉局部地区发生严重干旱，印度季风对农作物产生恶劣的影响，亚洲周期性的旱灾使水稻大批死亡，使中国大陆大豆产量骤跌，这一切人们都记忆犹新。

我们在美国也没能幸免于难。我们曾寄希望于几种新的杂交玉米，可到头来却发现它们极易遭受霉菌的侵害。在美国，不是播种时节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就是仲夏时分衣阿华州旱情险恶。

灾难所导致的后果我们也都还记得：孟加拉国儿童那肿胀的腹部和骨瘦如柴的肢体，撒哈拉大面积的饥荒。在美国，一块面包要一美元。美国人餐桌上的牛排越来越少，大豆肉条和鸡越来越多。

城镇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易的恶化在经济上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减少。欧佩克石油价格的上涨构成了引起西方世界两位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衰退。

市场混乱还是有条不紊

上述情况就是历史教训。乔治·圣大安那希望我们牢记历史，不让它重演。但确切地说，我们应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

训呢？

埃及的约瑟夫在连续7个丰年中不断储备粮食以对付接下来的7个荒年。从表面上看，虽然今天的周期不像以前那样有规律，但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仍拚命坚持要扩大生活必需品的储备以稳定食物、纺织品和钢铁的价格，防备未来的饥荒并把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收入输往贫穷的亚非拉国家。

虽然基辛格博士看到了这一政策的一些优点，但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经济学家都不赞同这种将发达国家的援助与保持食品供给稳定联系起来的方案。（如果要对付1846年的爱尔兰饥荒，他们很有可能建议取消对马铃薯价格的管制，实行配给制并鼓励生产。）

卡特新政府的顾问们的观点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并不承认我们的富裕是以最不发达国家的饥荒为代价的。但他们希望我们美国能更多地承担储备基本食物的费用。

令人不解的是，倒是美国的农场主生怕这种储备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波动。他们不理解物质短缺只有在动用储备时才能有所缓和，他们忘了在开放市场上购进食物并囤积起来可以提高价格或起码保持价格不变，面否则的话必然跌价无疑。

错误的希望

适当的储备不会引起平均价格水平的波动。不发达国家认为这种对策可以成功地提高原材料价格，面美国的农场主相信这会降低平均价格。他们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话虽如此，但缓冲的储备方案效力仍不很强。有数据表

明，现行市场确实在如愿地运行着：在受到一次歉收的冲击之后，原先所储备的物资便消耗殆尽，恰如 70 年代的情形；而获得一次大丰收之后，为了预防未来可能的涨价，人们会扩充储备，正像眼下这样。斯坦福大学的豪布里克·沃克英以其毕生精力研究、证实这两种模式。

然而，我们能肯定政府储备将使价格进一步稳定并减少世界性饥荒的威胁吗？其效果相当小。经验表明，当人们知道政府在扩大储备的时候，私人储备就会减少。因此“法老”为防备歉收而想增加储存的愿望就落空了。

人如想要安然度过下一次全球性饥荒。现在就需开始攒钱，到时好抢购地球上为数有限的粮食供给。对于储备方案，我认为最好马上就开始落实以便适应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需要。希望过多反会陷入失望。

能源经济 1973年7月2日

当上帝俯瞰我们人类的时候，他一定会为我们解决能源问题的方法而忍俊不禁，一定会对社会理性感到失望。

对于那些不断出现的、预料之中的问题，我们既不用灵活的计划，也不靠竞争价格机制去解决，而是把这些问题丢给了工业寡头，而他们只能去猜测政府未来的政策。

蠢事

这里有几件憾事：

• 长期以来，我们对石油进口加以限制，对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在税收上予以优惠。这些都促使我们尽早地用尽了大陆上的宝藏。

• 我们故意降低了宝贵的天然气的价格，以致于我们许多最好的天然气被浪费于本可用煤、石油或核能来满足的需求上。

• 当中东石油垄断还相当薄弱的时候，我们的国务院和石油公司就向它屈服了。在等待阿拉斯加、加拿大、北海及印度尼西亚的后备资源时，我们不去和欧洲、日本结成联合战线对付波斯湾的卡特尔，却转向了跨国石油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的兴趣只是充当垄断者的收税官。

• 在汽油、柴油、喷气机燃料、残余渣油的需求汹涌增长的同时，却没能形成新的提炼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中，不管眼下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提炼能力均会不足。

• 由于多年来我们忽视环境与人类的安全，所以当我们最终开始关心生态问题时，下述工作已陷入了困境：(1)按规定程序安装核能装置；(2)扩大煤的地下和露天开采；(3)建设早就该建设的发电站(热发电或核发电)。

• 为了满足清洁空气法的要求，1976年我们将要给汽车装上催化转换器(说这项技术有助于实施法规，本人实不敢苟同)。由于烧过几箱汽油后，汽油中的铅就把催化剂污染了，所以国内所有的加油站都必须准备供应无铅汽油，而美国的提炼能力甚至连老式汽油的正常增长都不能保证。我们对环境问题一会儿完全忽视，一会儿高谈阔论其标准，这种标准即使不是确实达不到，也很可能会被随后爆发的公众意见所推翻。

• 各石油公司建立了群体式的加油站，经常一个路口就有4个，彼此通过广告上的小花招和免费服务互相竞争，以提高自己的销售量。而现在，人们突然发现周末和晚上可

以关闭加油站,从而又造成了加油站稀少,这样只得一次限量只加 10 加仑的油。而这更延长了去加油站的路途和排队的时间。

对 策

老办法就是让汽油、燃料、煤、天然气的价格漫天飞涨,1 加仑天然气 70 美分,这样穷人就不能多开车了,其他人也要减少驾驶里程,汽车小型化趋势就会加速。

但国内外的石油工业还是获利颇丰的。如果公共事业公司能从繁重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会通过提高我们的月用电量以攫取丰厚的收益。但那种月耗电量为普通电冰箱两倍的除雾电冰箱已不再值得一买了。尽管有空调机,一些人还情愿使用电风扇。

这种市场自由调节的办法因易导致通货膨胀和不平等而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即使政府通过大幅度提高石油税收防止石油工业因石油短缺而获取巨额垄断利润,生活费用的提高在宏观上仍将对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起促进作用。为此还必须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

走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马上引入一个综合配给制度,每辆车每月只能得到一定量的汽油,每户人家冬天只能得到保持 5°C 的燃料供应,同时,再制定一个紧急的研究与开发方案,以寻找替代资源和更有效的技术。

天堂里的上帝清楚,我们不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明确的方案。我们只会得过且过,越搞越糟。

石油经济 1975年9月29日

我要介绍两个不成熟的、但又彼此对立的石油政策。

唯一高明的价格控制方案就是取消价格控制。所有的控制取消得越快效果越好，福特先生的石油进口关税也一样。

根据这种观点，长时期的紧急事件是不存在的。假如我们任价格随市场的供需情况波动，到了80年代，美国的石油进口量肯定会达到总量的一半。假如我们任各种能源（天然气、煤、石油、可分裂铅）以市场价格出售，问题会自行得到解决。

此外，有人争辩道，现代欧佩克垄断（像其他任何垄断一样）正在走向灭亡。实行国内能源价格开放很可能是促进垄断消亡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对立观点

下面这种观点与上面的颇有不同：

石油管制的解除、美国对进口依赖的减轻，必定会增加通货膨胀率。管制的解除来得越突然，情况越严重。高水平的燃料价格会剥夺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于是经济恢复的步伐就要慢下来。

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工资率呈上涨趋势，因此这恐怕会导致更进一步的成本与价格的上涨。航空费用的增加和耗能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上述情况更趋恶化。此外，目前不仅成本提高了，附加毛利也有提高的迹象。

如果政府实行的解除管制和封锁石油进口的政策真的使通货膨胀率严重恶化了，值得担心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及政府的决策者们会在经济已面临崩溃、复苏十分微弱的情况下

采取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若匆忙采取错误的能源政策，在70年代剩余的几年里失业率会保持较高的水平，最容易失业的非技术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人的负担就会加重。如此等等。

后面一个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的立场，他们在能源问题上持积极的态度。前面的观点与福特政府的观点相近。为了更充分地说明政府关心石油独立的问题，我们应看一看处于三足鼎立状态下的第三种观点。

与主张市场自由调节或主张继续实行控制(那怕是不严格的控制)的人不同，以国务卿基辛格及其前助理托马斯·恩德斯为首的美国政府持下面的观点：

根据这个观点，目前非常需要政府制定政策以促进摆脱对石油进口依赖的努力。只有通过与其他石油进口消费国，如日本、西欧一起采取严厉的措施，才能迫使欧佩克减少石油出口，加速欧佩克的瓦解。

这一派着重强调应由消费国形成买方卡特尔以抵抗卖方卡特尔。正如西奈半岛问题的解决要取决于熟练的谈判和条约那样，这一派相信石油危机解决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公开或秘密的国际会议来商定油价的上限与下限。

结束争论

哪儿是政策的黄金分割点呢？我的结论如下：

首先，逐步放弃控制是较好的方案，也许这是最佳方案。

其次，即使立即取消控制也不一定就会断送稳定的恢复。沃顿预测模型对“立即解除控制”后的9月份的情况计算表明，1975年中期到1976年中期的实际增长只降低1%，大选日失业率只是从7.9%升至8.1%（乐观者估计是从7%

上升至7.2%)，大选日的价格水平亦只上升1%。

寓意：对能源问题的争论没有必要如此热烈。

能源基础 1977年4月25日

经济学家知道如何才能减少经济增长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无论哪个教授都会给卡特总统开这样的药方：

“放开石油价格，停止对石油生产商征税，停止补贴出售低价石油，以免个人消费者和公司任意购买，使用浪费。任价格竞争性上涨将限制能源总消费量并降低对进口石油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垄断卡特尔的力量。”

总统不接受这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并非他本人或他的顾问们缺乏经济常识，而仅仅是因为这个方法对美国人民和国会来说在政治上行不通，它涉及到许多问题，包括把2.15亿美国消费者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到数万石油生产商和国内石油储备者的手中。

另一个可以考虑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对每位购买燃料、天然气、汽油的顾客课以重税来实现同样的“按需分配”。在对小型节能车和隔离住房予以资助的同时限制新的大型车的马力更能促进能源总消费量的减少。如果税收很重，石油拥有者日益增多的利润就会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付税；同时，国内勘探、开采新油井的诱惑力也会变小。但这种强制性放慢国内开采速度的现象至少不会使北美那有限的地质资源很快被用尽。

难点

为什么“自由市场加税收”的方案在政治上行不通呢？很

明显，这是因为归根到底美国国民需要的是廉价的能源——比美国从国外进口的还便宜的能源。

选民确实不希望我们能结束对大量石油进口的依赖——故此形成了美国能源问题的症结。

这正是需要领袖们施展才能的地方。我记得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美国人不希望卷入战争，但又实在不愿意让希特勒统治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这是一个贴切的类比。现在我们虽然希望有充足的石油供我们阔绰，但我们美国人实在不愿意将来会因资源枯竭而受窘，或者是将来因石油输出国卡特尔把石油价格提高5倍而懊悔。

像罗斯福一样，卡特总统必须要顺应时势，他必须逐渐地提高能源消费税，必须逐渐地解除对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管制，必须对保护自然资源予以鼓励，对浪费的行为予以惩罚——奖励也好，惩罚也好，均不得超过现有政治条件的承受。

很自然，没人会对这种权宜之计感到满意。“自由竞争”的坚定信仰者会因这方案仍对涨价带来的收益施以控制而强烈地谴责它；平均主义的拥护者会抱怨有产者因享有不打折扣的巨额资本收益而变得越来越富，相形之下，低收入家庭所承担的重负太明显了。

最终检验

我的文章是在卡特新能源方案的详细内容公布之前写成的。我们对这个方案的全貌正拭目以待，而如何才能评价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

没有一个方案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希望卡特的方案能在未来几年里使能源总消耗量低于目前的每天3800万桶的水平,同时提高其中煤的比重,这还是不过分的。

最终我们能否成功地促使进口额低于目前每天的700万桶原油的水平呢?我们能否缓和石油进口上升的趋势呢?

这只是我们所期望的最低标准,我们不应忘记还要调节各个收入阶层的支出费用。

诺贝尔奖获得者里昂惕夫 1973年11月5日

人们常说世界上只有12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这其中只有1位不是德国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它确实说明了一般老百姓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工作所了解的是多么少。

哈佛大学的瓦西里·里昂惕夫新近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国家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分析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是值得获此殊荣的。投入—产出分析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统计技术,既可以用以分析经济结构,也可以用以分析经济功能。它除了是一种有用的描绘手段外,还是一种有价值的预测与计划工具。从理论上讲,一个人能掌握的东西,其他人也可以学会,那么我就来解释一下投入—产出的基本逻辑吧:

生产煤需要劳动力和钢铁。生产钢铁除了需要劳动力以外还需要用煤。我们这里是不是碰上了一个恶性逻辑循环?煤依赖钢铁,钢铁又依赖煤。

不是的。这是一个循环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个循环是良性的,它可以用你在高中代数里所学的解联立方程组的方

法来解决。(回想一下关于杰克和吉尔的数学题, 吉尔的年龄为杰克的一半, 杰克比吉尔大 5 岁, 这不是死循环, 因为吉尔可以在 5 年内使她的年龄加倍, 所以她现在一定是 5 岁。知道了这点,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杰克的年龄为 10 岁。我们通过先舍去一个未知变量即杰克的年龄, 做了个巧妙的替换, 结果只剩下了一个含有一个未知变量的简单等式, 这个变量就是吉尔的年龄。)

里昂惕夫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就得了 12 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吗? 别急, 你还应该看看他那繁重的统计、估算工作。

宏大的模型

里昂惕夫所做的工作是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要素分成容易处理的部门于因素。开始他计算了只不过 10 个部门: 农业、制造业、运输业、政府部门, 等等。从实际数据中, 他测出了 1 美元的产出需要每个部门各多少投入。为了使问题在统计上易行, 他做了大胆的简化假设: 从战争向和平过渡、从管制向自由贸易过渡时, 每个部门所需其他部门产品的投入要么保持不变, 要么按着可以识别和估计的趋势变化。

10 × 10 个系数还不太多, 但当他掌握了 100 个部门或 400 个部门的数据时, 系数就有成千上万个了。而解这些联立方程组所需要的计算次数达数百万次。恰好这时及时发明了大型计算机, 里昂惕夫是大型计算机的第一位顾客。

至此, 我只不过描述了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中的 T 模型统计形式。近些年来, 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在各基金会的资助下, 在劳动统计局、国家基金会的协助下)已经建立了动态模型以计算各类既定发展速度所需的投资。

科学成果

里昂惕夫是一位在自己国家之外享有更高荣誉的预言家。联合国、世界银行、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政府部门及发展中国家的五年计划都采用了投入—产出预算方法。

苏联肯定了投入—产出方法(用奥登的诗欧语言来说,不禁止的就是所要求的),并且认为它和无线电一样,毕竟也是真正的俄国发明。这是对里昂惕夫的最高褒奖。里昂惕夫是早期科学家移居浪潮中的一员,这些科学家们丰富了美国的学术界。苏联这种抢夺记录的民族主义做法倒是完全无害的。

投入—产出表用途举例如下:

- 印度支那战争之后,国民生产总值中有 10 亿美元将要从事军事方面转向民用,这对总就业和技术需求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里昂惕夫的结论是就业将会增加,这一定使他异常高兴,因为对于“学者的反动程度与年纪成正比”的规律来说,他是一个例外。)

- 里昂惕夫第一个发现了美国的出口相对进口来说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后来,这个与通常见解对立的反论被证实了。

- 国会运用他的模型预见到了 50 年代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对钢材价格的巨大压力。

我还可以继续写上许多页。一个伟大学者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弗兰克·奈特, 1885—1972 1972年7月31日

最近,美国一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于逝世了,但他的名字却几乎无人知晓。

弗兰克·奈特半个世纪来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他

从不歇息，当他以八旬高龄离开人世时，他那支钢笔仍饱蘸着墨水。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如果把他比作亚伯拉罕，那么亨利·西蒙便是艾萨克，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雅各。

就我所知，奈特从未被邀请进入白宫，但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关于兑换率的决策中，或者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因的连珠妙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华盛顿的影响，而这只能算是冰山的可以看见的顶尖部分。我还要说，甚至那些激进派经济学家的思想上也打上了弗兰克·奈特的烙印。

高谈阔论的苏格拉底

《纽约人》怎么会没给这位如此独特的人物树碑立传呢？他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一位第一流的经济师，同时也是一位乡间的无神论者和与威尔·罗杰斯同时代的智者。现在的不少教授早年就学于埃塞特中学或布伦克斯科学中学。奈特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他和卡尔·亚瑟·康普顿、韦斯利·米切尔一样，也来自农场。

过去他常爱用他那尖利的声音声称他之所以成了一个经济学家是因为他双脚受伤不能继续务农。下述事实也许更切合实际，他身为康奈尔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收到过最后通牒：“不许再到处演讲，否则就离开哲学系。”因此奈特除转学经济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也使他成了演讲方面的权威，正如他的格言所说的，“社会学是一门演讲的科学，社会学只有一个规律，坏事只要讲得好听就可以胜过好事。”）

弗兰克是个怀疑论者，他怀疑人类具有邀过政府改善其

环境的能力。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建立的最好制度。因此，如果弗里德曼博士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天下最好的制度的话，那么，奈特博士就是害怕这一点变成现实的悲观主义者。

在此，我不想将宿命论与自由意志比高低。如果你相信迫切之中人类可以加速时钟的转动(马克思和列宁可以将那毫无依据的革命的日期提前)；那么你必须承认，人类也可能放慢时钟。另外，在1932至1945年间，人们已抛弃了那种把市场价格机制当作经济生活主宰的信仰。

反对革命

提醒我们要看到市场的优越性是弗兰克·奈特和芝加哥学派的一项不可估价的贡献。在老牌英国大学的教室里，人们对他这句话置若罔闻，但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人能掂出这句话的份量。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市场消亡的谣传和马克吐温死了一样是极大的夸张。在本世纪第三个25年中，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府常常被迫下野，美国也一样，钟摆来回摆动。在这场反对革命的运动中，弗兰克·奈特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奈特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对混合经济的反感。正如他所指出的，计划经济简直是一个管理良好的监狱。正是这个过于简单化的分析，使我童年的幻梦破灭了。对于1932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奈特恐怕就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了。在绝望的时刻，他曾声称要么选择共产主义，要么选择法西斯主义；他本人倾向于选择共产主义。

奈特对新政时期以后的社会的反感与赫伯特·马尔库塞没有什么不同，许多新左派就是撇开市场的奈特。

正如一位智者所说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不管是对还是错，其威力总是超出通常的理解。事实上，世界是被一小撮人统治着的，实干家们相信自己能免受任何知识分子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我坚信与思想的慢性侵蚀力比起来，人们大大地夸张了既得利益的威力。”

尽管连J·M·凯恩斯也说过：“最终我们都将会死亡。”但弗兰克·奈特将继续活下去。

公 司

巨型公司 1971年3月29日

小A·A·伯利逝世了。他的逝世勾起了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段黄金时代的回忆。据报道，那时伟大的学者都是了不起的大学老师。当威廉·詹姆士、乔瑟亚·罗伊斯、乔治·桑塔雅纳走在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FORTRAN语言，连对微积分一知半解的人都很少。但我对那段时间的评价很高，因为那时每个学生都体验了宗教信仰那丰富多彩的内容，而听基特里奇的课就等于结识了莎士比亚。

改变学院生活面貌的不仅仅是因为荷兰榆树生了毛病。过去岁月的一个特征是人才济济，侏儒和巨人都一样漫步剑桥。在那学术的中世纪，学院里到处可见像斯托弗和梅里威

尔那样早慧的学生。

伯利就是这样一个天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和音乐家罗杰·塞逊斯也恰在这时进入了剑桥。维纳在少年时代写了本名为《超天才》的自传，但认识他和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他根本就没能成长为一个超人的奇才。

从早熟的行列跨入系统分析与控制论的王国要比做一个处理具体事务的人容易。毕业于法学院、从事律师工作和法律教学的伯利继而却成了一个新政专家、拉美问题专家、拉瓜伊拉改革运动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和纽约自由党的奠基人。

一个新类别

然而，小A·A·伯利得以在思想史上名垂千古却并非由于上述事迹。使他饮誉扬名的是他早在1933年发现和 研究过的问题。

当然，我指的就是伯利——米恩斯命题，该命题指出，大公司已成为美国生活中一个新的类别，一个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单位。当我们重读加德纳·米恩斯和阿道夫·伯利的小册子《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时，我们会发现其内容是如此的熟稔、真实，以至于让你觉得平常。但接受这样的评论实际上就是犯了马后炮的错误，好比一个孩子说：“哥伦布当然会发现美洲大陆，他怎么会错过呢？”

爱钻牛角尖，认为公司不具备与所有者、工人、消费者相分离的独立身份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按这站不住脚的逻辑，简化主义者会把葛莉泰·嘉宝看作脱氧糖核酸的简单集合，把太阳系看作9个东西围着太阳转而已。收税官最清楚，公

司确实是存在的。(我补充一下,公司是合伙冒险的好方式,因此它是征收所得税的好目标。)

统计数据日益证实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一事实。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单位,都是由有效的少数派共谋做出决策的,不管这些单位是工会还是宗教派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事实的证据越来越清楚了。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野兽之行踪

伯利—米恩斯之前的那种资本家说了算的企业是不是都像经济学教科书上说的那样信奉最大利益原则呢?是不是现代巨型公司转而采取了与降低成本、追求盈利不同的方针呢?

过去我很相信这种流行的神话。然而,对现实生活有了研究以后,我发现老的工业巨头都是反复无常的家伙。我们不但应该根据经营分析和经济管理手册了解他们的行为,还可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了解他们的行为。世界上只有大公司的委员会才会尽可能地减少成本并计算贴现率。确实,某些股份很少的内部管理人员会搞些诡计,使公司受点损失,但欺骗老板的事又不是昨天才开始有的,它像巴比伦的楔型文字板一样是可以考证的。

多亏伯利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谁是受欺骗的:(1)政府,(2)雇员,(3)消费者,千万别忘了还有(4)受代理人控制的财产所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些巨型公司能够对公众利益负责任。

企业家的伤感 1977年8月8日

半个世纪以前，企业家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当一个亨利·福特式的民间英雄声称“历史是堆废话”时，历史学家却庄重地把他的话载入了史册。

而现在，当亨利·福特二世宣称美国对文明的独特贡献在于联合化企业的高生产率时，谁来理他？难怪他最近极为不满、极为沮丧地辞去了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职务。商人确实感到他们在同代人中成了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所说的“被遗忘的人”了。

商人常常因此而责怪新闻媒介。但深究一步，我们要问：当洛克希德和海湾石油公司的不光彩行动被新闻界披露时，报刊杂志读者、电视观众为什么会表现出求之不得的欣慰？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兴奋地欣赏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内税务局对海湾和西方联合企业集团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的调查？为什么人们看到伯特兰斯公司的财政困境，心里只有掩饰不住的高兴而没有同情呢？

天鹅绒装饰的狗窝

如果观众、听众对商人的作用怀有满腔的热情和由衷的赞叹，新闻编辑也会对公司、企业客气一些。编辑们本身就是迎合“自己顾客”的商人嘛！

实业家和上层人士感到自己令人厌恶、不受尊敬，我相信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他们并没有患妄想症。我这么说也考虑了在美国人们并不十分尊重他人的事实。如果社会学民意测验可信，那将军、议员的日于就跟律师、法官、教授、会

计一样糟，奥登本应该把我们这个时代叫作“妒嫉的时代”。

在国外，做生意从不是什么高贵的职业。正如德·多格维耶指出的那样，过去美国可不是这样。美国的生意人都是些离家出走的能耐人，所以他们一旦成了受歧视的少数人，就会感到双倍的恼怒。

商人虽是少数，但他们也有反击的办法。他们利用广告大肆宣扬资本积累的社会功能，宣扬盈利的必要性及自由企业的辉煌业绩。

全国制造业联合会甚至还资助出版了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结果它却成了商人们一知半解的话柄。不管经济学家解释多少次1美元销售收入中只有几分的利润，可该死的老百姓总是以为资方狮口大开，侵吞了大头。

知识分子口生是非吗？

正如担任兴旺的卡明斯动力公司总裁多年的J·欧文·米勒最近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市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商人们第一个幼稚的冲动就是把自己不受尊敬的处境归咎于社会学教授。考虑到大多数教授既非共和党人也非民主党人，我不得不同意米勒的说法：靠经济力量在大学虽宣扬“健康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并不能赢得民心。实际上，今天在令人敬佩的哈佛商学院里讲授的内容与内地那些蹩脚的大学和州立大学相去无几。

尽管我满怀敬意，到此我也不得不与米勒分道扬镳了。我认为即使商人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提供物资的任务，他们也未必能相应地得到进入天堂的便利。如熊彼特常说的，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经常出现低效率，因而人们才对它不那么

欣赏了。

乔治·奥威尔，一个憎恶极权主义与空话的社会主义者，最看不起那些一面批评吉卜林的帝国建设者，一面又吮吸着他们劳动果实的人。而等待着企业家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命运。

所以还是下决心抛弃友爱吧。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付点代价是好事。史实也许能给我们安慰，使我们冷静下来。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将大公司国有化并置于另一套官僚机构的控制下，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重返伊甸园并无裨益。

评判公司声明 1979年8月13日

目前，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公司正陷入困境。如果你去问三个经济学家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你会得到三种答案。要是你把我也算进去的话，你也许还会得到四种答案。

首先，坚定不移地信奉自由经营原则的人会说：“我们的制度就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的。既然他们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只好让人家吞并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制度只有更好，消亡与倒闭是一个有效经济系统中的有益的疏通。如果你这次搞了一个例外，下一次就会有五个人跑来哀求你帮助他们摆脱由他们自己的冒险和愚蠢所造成的困境。”

提出这种答案的人往往没有真正地思考过，也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们按照规章而不是通过讨论决定来进行管理，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一套特定的、公认的教条，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不渝。

糟糕的结局

你给了克莱斯勒这样的答案，那么，当佩恩中心公司遇到麻烦时，你也会如法炮制。同时的答案还会用于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或者富兰克林国家银行（如果该银行债务超过剩余资金的话）。当整个银行处于1933年那样的麻烦时，“只认章程不认人”的逻辑意味着任其自然，而不管人类和经济遭受多大的损失。

另外，还有务实主义者。他们对悉心照料穷人的做法，对在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没给社会作出任何相应的贡献却能得到福利援助的事实表示惋惜。务实主义者对陷入困境的公司的看法有所不同。请注意，他们并不希望免除那些无能的经营者的责任。他们说他们必须为工人和商人着想，否则工人会失业，而由于消费和再消费的减少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商人会破产。

假如我是帕金森或波特，假如我来给马基雅维里式的经理编写工作手册，我一定用那句古谚来提醒他们：“盗绢者下狱，窃国者封爵”。如果反正要破产，那索性规模大一些。

威斯汀豪斯公司一定受了这个学派的启发。该公司草率地签订了提供金属铝的合同，价格足以导致亏损，而有人认为它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却成了人们谅解它的原因。这使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想起了斯科特，人们控告他杀害亲生父母，但他却因身为孤儿而祈求陪审团的怜悯。

我这不是开玩笑。鉴于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可以得到反资本兼并的豁免保护，人们便会大肆宣扬自己的困难，以期得到特殊优待。司法部许多官员就把林一潭料一沃特公司接管莱克斯公司当作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个人的意见是要谨慎地考虑克莱斯勒的请求。首先要明确了解全部的关键事实。

美国汽车公司的三个巨头是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老亨利·福特和他的经理哈利·贝纳特曾一度使公司陷入困境，亨利·福特二世在其服务于美国空军的天才的年轻助手的帮助下，使福特汽车公司得到了振兴。

通用汽车公司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一个成本低、不断创新的生产商。而克莱斯勒的最后一个经营班子一直在危机丛中踉跄挣扎着，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新班子有根本的起色。

克莱斯勒那多达 10 亿美元的债券已失去信用，不得不以相当高的利率转卖给商业银行。克莱斯勒公司即使卖掉国外的资产也还是没有资金去研制适应能源经济状况、满足污染标准、有竞争能力的小型车，而这些在美国大陆已成了规律。

由谁接管

目前克莱斯勒公司要求立即减税。这一点如果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看到有其他企业要接管它了。这个企业可能是联邦德国的大众汽车制造公司，虽然该公司自己否认这宗交易。当然也可能是五六家资金雄厚的石油公司中的一家。如果价格适当，某个明智的大企业集团也会捷足先登的。

原则上讲，我并非反对所有的政府资助，但我认为我们每一次豁免都应经过慎重考虑。事实上，在丰田、大众、菲亚

特、沃尔伏和其他一些外国汽车制造公司皆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国内制造商由三个减为二个并不能严重地损害竞争。

如果山姆大叔最终确实插手的话，克莱斯勒的经理和我们这些股东一定要吃苦头了。

肯尼迪的反吞并建议 1979年9月3日

联邦贸易委员会已暂时禁止埃克森石油公司动用其通过欧佩克赚得的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购买莱莲斯——一家生产电器和汽车的公司。可从前莫比尔公司以其石油资产接管蒙尔格摩里·伍德公司时则没受到阻止。

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提出一个新的议案(S.1246)作为克莱顿反垄断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大石油公司吞并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这次建议值得我们作谨慎而客观的研究。

大家知道，肯尼迪是最勤奋刻苦的参议员之一。工作之余，他还四处请教。也就是说他和他那帮干劲十足的官员们常常找别人干事——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人。肯尼迪提出此议案时，请我在经济方面做出评价。他还就议案的最佳措词以及应用范围等问题征求了法学院专家的意见。

相 关 者

我不应有什么抱怨。牵涉到公众的利益总会产生相互影响，这是规律。当国家科学院有人获悉有位苏联学者应该得到离开苏联的许可时，他应该求助于谁呢？当然他应该去找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女议员米莉森特·芬尼克和马萨诸塞州的

民主党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他们会去想办法。

我对反吞并修正案的第一个反应是谨慎的。很多事实表明，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总希望它的资金从某些工业部门流向其他产出率更高的部门，这样可以达到高效率。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三年后，杜邦公司在军火工业中找不出什么好赚钱的地方了，它就开始向通用汽车公司投资。化戟为犁是件好事，这我们都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后来要求杜邦放弃对第二个大企业的控制是错误的。）

参照汽车工业的情况，我们再来考虑石油问题，有三点很值得考虑。

首先，国家需要在国内勘探新的石油。工业部门不断提醒我们这项切实的需要，以减少对石油工业高额利润的税收。如果是在“石油工业将其利润用于石油开发”的借口下美国人民才从容不迫地承担起了高额税收，那么，石油公司若打算将其利润用于能源工业之外的地方，不是就违反合同了吗？

看来事实正是如此。要记住，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全然属于石油工业、可任其支配的资金。在这些由能源稀缺而产生的利润中广大美国人民有权分享多少，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肯尼迪参议员坚决主张维护国家利益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诱使石油工业摊牌。他听信石油公司的话，要保证让石油供应的所谓价格弹性经受最大程度的检验。

这桩石油案中的第二个复杂的问题是我们果真希望石油工业所有的收入又都用于石油工业吗？为什么追求利润的人不能自己判断哪儿的资本产出最高呢？通常情况下他们能够

做到。然而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斯托保等人极力强调的那样，当石油输出国卡特尔对每桶原油要价 22 美元时，美国很有必要开发替代性能源，即使其成本相当于 40 美元一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可以控制欧佩克，防止它把原油价格抬到每桶 30 美元或更高。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一个私人石油公司（不管有多大）去进行这项谨慎的工作，因为这对私人投资是极为不利的。

放任自流

第三，我们还应从经济学角度去考虑肯尼迪建议中可能存在的优点。一个开放的社会要能容忍大型企业，只要它效益高并肯接受控制与协调。但有一个事实阻止了新寡头帝国的形成。

假如石油巨头打算在证券交易所向每个公司购买一部分有价证券，这样就会影响未来的石油开采，但这也使其无法在竞争的各个领域内获得霸权。再假如他们提高股息，情况会怎样？或假如由于受到国内税务局的监督而不能把普通收入非法地变换成税率较低的长期资产，他们大宗购进自己的股票情况又会怎样？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应把这些事情都讨论清楚。

若干与杜邦公司不相上下的商界巨头正在拚命购买证券，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让我们就此展开讨论吧。

实业家日益减少的特权 1972年春

很明显，所谓的私人企业会在未来几年里发现自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界约束。这是在哈佛商学院里做梦也想不到

的。公司经理们发现他们不仅不能推行造成空气污染的决策，连做生意中上百条传统的决策方法也不再行得通了。社会要扩大实业家的责任，并越来越多地干预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

那么制定经营决策有哪些必须遵守的新规矩呢？新的生活方式将如何影响国民生产及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呢？

在这广大无边的领域中不太可能有可靠详细的预测。研究过去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经济计量模型的经济学家常常可以略有把握地预测出某一特定地区是接近强烈的扩张期还是濒临相对滞胀时期。不管你在星期日增刊上读到的是什麼，技术的普遍规律总是稳定的，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加以预测。而社会环境则不同，它要求预言家们准确地预测出地球上将要发生的变迁。天哪！就是孩子重读一下历史也可看出，以往的预言家都不是真正的术士。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亨利·亚当斯或是奥斯瓦德·斯宾格勒，他们的预言根本不着边际。

尽管我无意闯入这些勇敢探索者的行列，但我认为，在不受严厉的批评家约束的前提下，进行推测或作出自由的假设还是有用的，通过经验和分析可以从这大量的可能性中作出取舍。

预测灾难

大约30年前，约瑟夫·熊彼特在他那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态。简言之，他对新世界前景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已进入了氧气帐——岌岌可危。他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还将苟延残喘，但他并不真的指

望这个躺在医院的病人能表现得像年轻的资本主义(依他的看法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那么精力旺盛。

熊彼特全错了。在他逝世后的20年里,现代混合资本主义运行得比鼎盛时期的资本主义还要好。日本的实际增长率持续20年超过9%,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在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愤世嫉俗的奥地利,衰弱低能的法国,精明活跃的意大利,还是洋洋自得的美国,其实际增长率和生活水平都远远超过了二次大战期间任何一位客观的观察家所能作的最客观的预测。

人们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它们曾被称为落后国家。如果说老实话,应该称它们为贫穷国家)增长没有技术发达国家快,两者之间日益如深的鸿沟让人惨不忍睹,忧心忡忡。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无论与发展中国家的过去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相比,这种差别都不是发展中国家贫穷状况的后果。正是技术发达国家迅速膨胀的富裕,才大大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事实上,6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地区所呈现的增长率还是高于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即维多利亚女王在巴尔摩拉尔城堡治国和卡尔文·柯立芝在白宫里打盹的时候)的强国。

尚未成熟的时机

熊彼特的错误仅仅是时机尚未成熟吗?世界上无疑还存在着物质文明发展较慢的地方。请看一下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奇迹。此外,连那些非常赞同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也看出来,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经济发展萎靡不振,他们没有什么可欢呼的。恩克鲁玛、纳塞尔、尼赫鲁等

人短时期内在合理计划的旗帜下所完成的事业只能让人失望。爱挖苦的人会说，与其说他们进了氧气帐还不如说进了精神病院。

尽管我不是拉美问题专家，但我还要指出，阿根廷或乌拉圭（一度的南美瑞士）或阿连德统治之前的智利的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与这些国家体制的不伦不类有关系。在他们的社会里，社会需求依靠工业，而工业却又不能满足此需求。官僚的生活方式和对私人企业的反感损害了社会运行机制。独裁者庇隆被废黜已数十年了，再把阿根廷经济停滞不前归咎于他就讲不过去了。但如果说那曾被庇隆一手操纵的民粹党的作用是说明阿根廷经济停滞这一奇怪现象的关键，那就有道理了。列宁有句格言，大意是要有效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就要搞垮资本主义货币。通过损害经济运行机制以使革命成功的时间提前是不明智的办法。欲摧毁现代混合经济，要求在短期内工资率增长40%到70%可谓最佳途径。而这种情况在不幸的拉美经济史中一再发生。

缩小企业特权

较富有的国家里新近形成了一些新势力。人们要求企业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过去的基本需求——更高的生产率及使所有人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仍十分迫切，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干预，企业将会丧失一些势力。在优先保证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当然总要做出一一些必要的牺牲。我不是指区域法令或对排废征税，它们无疑会制止未来的企业污染环境，当然应该实行。要求企业遵守有益的规则，企

业不会失去以往合法的法人自由。在这样的约束下，社会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巨头只会更好。

我感兴趣的是对企业从前所具有的特权的限制。例如在美国，经营者不能总是关闭亏损的纺织厂、解雇工人了事，以便把公司转移到一个劳动力净成本较低、更合宜的环境中。在意大利北方，企业不可随便按其效率专家的要求调整劳动力。雇佣工人人数、工资率、附加利润、解雇费等均要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通过劳资谈判决定。我不是为企业难过，而是意识到消费者与领薪阶层都希望避免惨重的损失。

社会力量

不管怎么样，合理的干预与偏执狂之间的界限是微妙的。我无意恫吓经营者。只想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企业所受到的新的压力。

拉尔夫·内德所代表的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运动远远不只是一个“用户保护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内德主义包括为工人和社会利益争取参与制民主的内容。如果你仅从内德运动所动员的反对资方的票数来看问题，那你太幼稚了。即使他说服基金会组织和大学投反对资方的票，要想使现在尚处于3%到5%的反对票数达到51%的多数，那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

我们不该从企业民意测验的投票结果，而应从人们的思想变化上来估计这场运动的力量。如果公众一旦相信通用汽车公司眼中的好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坏事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指望从股东与工人代表的投票中取得胜利了，他们会直接依法进行罢工。

我来举例说明。耶鲁法学院一些人最近提出一个巧妙的建议，登在《耶鲁学报》上，该建议指出，司法部反垄断机构应通过法令来阻止大型汽车公司每一年半载就大规模更换一次车型。耶鲁的改革者们认为，小阿弗里德·P·斯路恩借以帮助通用汽车公司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繁荣程度的创新型促进废弃的方法，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并增加了市场垄断。

乍一看，人们会倾向于把这种建议看做幻想，以为不会对企业的霸权产生威胁。但批评意见常可以促使官方作出反应并导致变革——哪怕仅仅是工业部门注意到这种意见并有所反应。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批评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过垄断规定最低回扣率，但根本没有多少作用。然而当司法部参与了这场争论并声明他们打算对这种出格行为根据反垄断法予以起诉后，没多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及交易委员会就大幅度地修改了他们的活动。

我们必须解决竞争的环境问题。企业正受着挑战，社会要限制企业的活动。我们能否闯出一条新路，一方面避免私人过分的贪心及管理者的狭隘，一方面削弱对企业权力的摧残呢？我们已经接近一个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能满足所有合理需要的制度了。

4

收入与财富

一个普通医师也许有三种类型的病人。第一类病人愚昧无知，无法理解人体的基本生理机制。第二类病人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也许颇有学识，可是对医学却一无所知。第三类病人是期望得到同行的客观独立见解的医生。作为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普通医师”，萨缪尔逊在这一章中向专家及一般读者提出了他的忠告。

有些人狂言已经找到了繁荣的源泉，萨缪尔逊难以接受他们的观点。在投资领域，要想一直比在其他经济活动领域内干得更出色，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几乎无人能很准确地在某一时刻进入或退出市场，从而使其利润高于多种经营或者坐着不动所得的利润。金融实践是一个好习惯的问题，它涉及勤俭的精神、多样化的手段，以及怎样使以时间、精力和费用体现的交易成本达到最小。

在此，着重点并不在于做好每一项单独的交易，而是要使得在他进行经济活动期间的财富总量达到最大。然而，当发生无法预计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经济低增长时，最大、最优秀的投资者都在尽量减少财富的损失。如果

仔细阅读的话，你会发现除了投资方面的建议，这些章节还提供了关于投资机会与市场机制方面的颇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在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权赋于个人占有资本并且从资本物上获得收入的权利。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资本量的多少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状况的好坏。因此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多内容都涉及这样的问题：多少资本存量才能足以维持经济的增长。同样，对机器、厂房设备的持续投资和资本重置就意味着充足的利润报酬。在此，萨缪尔逊结合普通股票讨论了这些问题。在70年代，资本股票收益率过低的原因是资本量过剩还是因为市场忽视了资本重置成本过高这一事实呢？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对萨缪尔逊来说，期望的收益率极低这一建议本应是合适的。可是萨缪尔逊仍然很确切地指出，政府刺激新的投资的计划也许能奏效，但其首要的结果是增加现有资本占有者的财富及安全。

人类所生活的这一世界与政治、经济状况方面的联系也许要大于与勤奋、性格等个人品性方面的联系。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的相对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肤色、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因此贫穷的人并不一定缺乏美德。按照萨缪尔逊的观点，我们应该减轻贫困的程度，扩大机会均等。他试图向人们指出，实现上述目标的经济代价是较小的。萨缪尔逊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担心：走向收入的平均会鼓励人们利用其他迂回的手段来谋取经济利益。但是他的平均主义仅仅很谨

慎地局限于收入、财富与机会的均等。例如，他既不赞成企业由工人作主，也不反对工资差别。最后，萨缪尔逊对保持新政中的人道成分表示关注，但是承认经济系统如不进行改革，崩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例如，正如现在在人口统计资料上的数据所表明的，在人们身体素质提高的前提下，政府规定退休年龄为65岁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必要的。

财富的维持

对 策 1975年2月10日

当人们问及阿倍耳·塞耶，法国大革命期间他都在干什么，答曰：“我活过来了。”就终身积蓄的安全而言，法国大革命的最后几年对中产阶级来说是充满了创伤的几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段时期，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然而总的说来，这段时期并未成为普通股票持有者的美妙时光。这是相对于前四分之一世纪的情况而言的。在那段时期，资本的持续迅速的增殖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复仇女神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热衷于看涨股票的小投资者在华尔街上一贫如洗，那些大投资机构——银行的信用部门、互助基金、人寿保险康采恩以及公司养老基金——的本金不管就实际的购买力而言，甚或就货币单位而言，均有所减少。

长期债券的利率一直高居不下，但是那些新的高利息债券的出现意味着人们手中持有的债券的价格已在下跌。就像

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债券也定会变老,变得不值钱。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并非笑料。自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还未曾见过像最近几年的取消大量养老金的情况。就连那些不具备冒险精神,将钱存入储蓄帐户和购买E系列债券的寡妇们都觉得所得的利息不足以应付生活费用的上涨。

股票行情的变易性

经济学家的职业病之一就是人们要来询问如何处理个人的金融业务。大家知道未来是捉摸不定的,因此,经济学家提出咨询意见时往往感到踌躇。但作为经济学家,其责任感又驱使他们一有机会就抓住这些既严峻又捉摸不定的问题。

在此,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过去在这一专栏中提出的关于投资方面的见解。

历史经验表明,多数人并不善于处理他们自己的投资业务。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与判断力,也没有时间去处理。所以中产阶级最好是雇用专人来处理投资业务并保存记录。

设想有一个拥有维持生计所必需的10万美金的寡妇。

假设,她能容忍的最大风险是将40%的储备金购买普通股票。对于她来说,普通股票不用支付佣金的互助基金是可取的,尤其是这种股票具有管理费用以及证券周转率低的优点。(这些年来,自从我写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以来,这种不用支付佣金的基金已获利不少,但却要以牺牲销售人必须收取佣金的基金的利益为代价。然而,互助基金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伴随着华尔街市场的跌价势头一起衰退。)

固定本金证券

假设,对于其余 60000 美元,她愿将其中一半投入到长期债券中去。跟踪每 1000 美元面额的债券的行情,管理附带的息票以及保存税收记录等杂务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能胜任的。所以她应当将本金的 30% 去购买定额债券基金,这种基金定期支付红利以维持她的生活。(如果她觉得睡不安稳,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可以购买三种不同的债券。)为了一箭双雕,她也许应将其 70% 的长期投资投入到不付佣金的平衡互助基金:一半购买债券,一半购买普通股票。

余下 30% 的流动资金又作何处置呢?在一运行良好的社会里,她能将其存入地方储蓄银行,并且得到与购买为期 90 天的 10 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单(CDs)同样的利息。然而,我们所处的社会并非运行良好。根据法律,地方银行的利率只能是 6% 或 7%,而大额存款单的利率却达 8% 或 9%,甚至达 12%。

所以除了存入街头银行里的 1000 美元的现金外,她也许应将其余的钱投入众多的新的类似大额存款单(CDs)的流动储备基金。自从我第一次撰文谈到此问题以来,这类基金越来越兴旺。它们既安全又方便,但得不到政府保险的保障。

总之,上述方案是个谨慎的方案。可是,也并非没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谨慎的。

投资的奥秘 1976 年 4 月 5 日

普通股票的价格自从 1974 年的低点以来普遍增长了 70 个百分点。30 个公司的道·琼斯工业价格指数跃过了 1000。股票周转量创造了新的日记录。

自然,经纪商对此感觉良好。渐渐地,他们的客户又回到普通股票的交易中去。一些在1974年的低点时转向债券交易的客户都一直在为现在回到普通股票的交易中是否为时太晚而焦虑。

现在似乎该是回顾华尔街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了。

首先,不管你从梅隆基金只拿出5000美元还是拿出数亿美元用以投资,都不存在可以避免的风险。考查一下近10年或近四分之一世纪期间100名声望最高的货币管理人的业绩。我们发现,总的说来,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购买标准及普尔公司的500种指数化股票,也不是简单地根据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西欧股票的典型市场价格而按比例购买股票以取得一个合适的证券组合。

在这100个人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特别成功。但是成功的接力棒的传递漫无目标,因此,训练有素的统计学家只得作出下列令人失望的假设。

在对证券记录的变易性及平均报酬作修正后,最优者及最劣者的业绩仅与运气有关。

金钱游戏

尽管要想一枝独秀是困难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把事情弄糟却很容易。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有一位医学博士,出于对今后时局的担忧,用其老岳母的一半养老储备金购买了黄金。有一位会计师,对商业一窍不通,却从事商品投资,结果落得了一贫如洗的下场。有一位拉了系语言教授,在18次交易中对佣金一再加码,最后竟花去10000美元的佣

金，然而在 1975 年行情看涨的多头交易中却以损失而告终，这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就他们这些人中的多数而言，问题在于他们喜欢投资过程本身，就像喜欢收集邮票那样收集股票。他们会为进入帐目记录的 7.5 美元的红利而感到欢欣，这样，他们可在俱乐部里告诉同伴他是怎样在两个星期中使自己的看涨股票增加一倍的。

在投资领域，几乎没有人能一枝独秀这一现象并不只是我的发现。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也纷纷指出了这一现象并对此作了检验。如果还嫌证据不足的话，华尔街后屋发生的事情当然也能加倍证实这一现象。

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吗？是对资本主义及市场制度的一种批判吗？完全不是如此。这大概正是亚当·斯密的追随者所宣称的：竞争的机制是如此有效，以致于人们忽视了那些能使技能与资源自由流动的最有效的价格信息。

不动声色的谨慎做法

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教训是显然的：

- 你必须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搞多种经营。
- 你必须避免在证券周转以及交易过程中由支付佣金所带来的致命损失。
- 除非你拥有 2 亿美元，否则你必须利用不付佣金的证券，银行混合信托基金或者互助基金。

选择哪家银行及什么基金最合适呢？哎！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会明显地优于其他。一小部分银行与基金正开始试验

全面多样化的经营方式。然而，不可能存在类似整个市场这么广泛多样化的 10 亿美元的基金，既不用支付佣金，管理费和佣金周转费又尽可能降到最低。我怀疑将来可能会出现这类便利的新型证券。同时，购买一小部分具有不同经营之道且不付佣金的基金还是很可取的。（对于那些在印象中能在普通股票与固定本金资产之间把握时机的人来说，这些证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易工具。）

谨慎的做法常常也是方便的做法。你可以雇用专人来掌管你的票证，并且为税收报告提供你所获的红利以及资本收益的记录。

这样，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中坐收渔利。你所失去的只是获取暴利的白日梦想，得到的却是高枕无忧。

指数化基金投资 1976 年 8 月 16 日

每当我在这个专栏上发表了有关股票市场投资行情文章以后，信件就一下子多了起来。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允许我以一个金融指导人的身份挂牌开业，但那些寡妇们却纷纷来信询问购买何种股票为好。

并不是所有的来信都是表示赞赏的。每当我谈到黄金行情不佳，南非与洛基山脉就有人来信对我进行指责。向人们揭示很难断定订约后先一次性支付佣金的办法是可取的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并不能增加揭示事实者在股票持有者中间的声望。货币管理人不情愿让别人来提醒他们关于证券选择的全部记录竟比非管理的指数化投资基金的记录还差，这种指数化基金实际上拥有所有那些用来组成标准及普尔公司的 500 种综合股票价格指数股票。

4月份，当我正在这个专栏上发表有关“投资的奥秘”的文章时，我得知富有的投资者和公司养老金计划能利用加利福尼亚的威尔士·法哥银行、美国国家银行、芝加哥的信托公司以及波士顿的贝特瑞麻金融管理公司谨慎地从事遍及整个市场的指数化投资业务。不过，我还是有必要告诉读者，不幸的是“至今不存在很便利的……投资基金，它既具有模仿整个市场的功能，又不需支付佣金而且费用周转和管理费都尽可能低。我怀疑将来会出现这种便利的证券。”

一种较好的“捕鼠器”

什么地方存在需求，就会出现通往那儿的道路。尚未来得及胆敢期望什么，内心真诚的祈祷就给我带来了回报。从一份简报上得知，一种叫做第一指数化投资信托的证券将要进入市场。

这种证券符合我所提出的五种有关谨慎的要求：

- 它适合于具有一般收入的所有个人与家庭——拥有1500美元至100万美元或更多均可。
- 除了小企业和那些可能会给受信托人带来困难的企业外，它比得上大多数标准及普尔公司的500种股票。（例如一个无线电报基金会即将破产的话，那些利用他人钱财去投资的人会觉得还是避开它为好。）
- 由于基本上不用管理，其管理费用以及全部花费仅为1%的全部净资产价值的十分之二——这也许仅是通常互助基金及银行信用部门的费用的四分之一。
- 这种指数化基金在周转过程中，所耗去的佣金是很低的。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这种指数化基金提供了最广泛多样化的功能。这使得人们能获得最大的平均利息，而且能使证券组合的方差与不稳定性达到最小。

申 诉

教授的祈祷很少能得到完全的回报。这种指数化基金并非一种不用支付佣金的投资基金。将你为数不多的全部储备金去投资，订约后需立即先一次性支付 6.01% 的佣金作为销售成本。（如果有超过 100 万美元的储备金可用以投资，则佣金会下降至 1.06%。）

人们并没有来买我的主意，然而，很显然我的这些见解若须抛售出去，那就得花钱。为了偿还重负的初期费用，有的人用一小部分财产购买普通股票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有之。事实上按照我的观点，也只有这些人会不得不运用订约后先一次性支付佣金的办法。

如果你幻想能走在市场前面——利用卡特竞选胜败而获暴利，或者能够在下一次衰退到来之际，即时抛售掉所持有的股票——你最好是选择一种多样化程度较小的不付佣金的投资基金。

在购买一种指数化投资基金时，你也得放弃这样的幻想，即在某一天，你能在俱乐部、游泳池中吹嘘：在追逐股票投资胜者的过程中你已经获得了 10 倍的利润。广泛的多样化既不会使你损失过多，同样也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

指数化投资基金并不能避免市场风险。如果整个市场不景气，那么指数化投资基金也会随之走下坡路。

在像最近这样的通货膨胀时期，一个谨慎的投资者所要

做的是决定将多少储蓄去购买股票，多少储蓄用于其他。对于适宜于进行股票交易的那部分钱，一个有效的手段是将它投入到一种不用管理的低周转、低费用的指数化基金。这样，也许就要求助于精于此道的人。

防范性投资 1976年12月20日

卡特必须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而担忧，公众必须为自己家庭的资产情况而操心。退休后的生活安逸与否取决于现在的金融决策。

经济学对此有所帮助吗？我认为是有的。经验表明如此重要的国民经济决不能让给非经济学家去管理。经济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家庭管理，但在引申到资产管理方面后，经济学的实践意义却没有得到很广泛地兑现。

现在，斯坦福、沃顿、芝加哥、麻省理工以及伯克利等大学的商学院是产生死板的管理知识的源泉。为了了解不切实际的金融神话传说，人类学家得去华尔街、拉塞尔街和国家大街。当货币管理人实际上是怎样实现风险经过修正后的平均利息这一问题初见端倪时，1976年已经给那些认为高薪雇用的货币管理人能使标准及普尔公司的股票价格指数黯然逊色的人当头一棒。

问题与解答

一年的年末是回答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的良好时机。

问：你已经对那些要支付佣金的互助基金进行了批评。它们的出售额是下降了，可是那些受到你认可的不用支付佣金的基金的出售额为什么也会降下来呢？

答：由自己管理证券不会交上好运。让别人管理，则佣金又会将你吞噬。完全的多样化也不可能，簿记工作将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互助基金或银行基金是可取的。现在互助基金得不到青睐的原因是其出售动机不对：人们购买化妆品的目的在于购买希望，而不仅是为了买那些滑石粉；人们愿支付8%的佣金是寄希望于获得暴利。

问：不付佣金的基金是理想的吗？

答：哎，也不是。它们交易太频繁了，这会消耗你的资产。它们经常给人一种多样化的假象。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也非常之高。而且还会捆住你们的手脚。尤其是那种费用低廉、几乎充斥整个市场且一直保持低周转率的投资基金更是如此。

问：购买债券的良方是什么呢？将手头全部的钱用于购买股票的做法肯定是鲁莽的吧？

答：由于普通股票并不是一种能减少过去10年通货膨胀影响的有效手段，所以固定本金资产应在均衡证券组合中占有一个重要的比例；或储蓄帐户、“金融市场”投资基金、开口债券，或“收入”基金，或“均衡”互助基金。

在此，我有意忽略了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对于私人来说，购买这种债券已成为一种不合算的买卖。每个家庭至少要购买一定数量的E系列债券。

就像那些具有应税利息的固定资产一样，储蓄帐户也会立即带来有保障的收益。

免 税 基 金

问：对于新出现的开口市政基金你怎样看待？

答：1976年的税改法案好容易弥补了一些漏洞。1976年后给人们带来的礼物是增加了遗产税的税率。财产继承者将继续支付资本所得税的责任。对于拥有相当数量资产的高收入者来说，就连从长期资本上获利的代价也是昂贵的。真值得为之欢呼两声！

国家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仍不失为一个避税港。伴随着即时流动性、最小的簿记量以及不用支付佣金的优点，新出现的开口市政基金还能满足对多样化的需要。我认为它的管理费用太高了，更理想的应是既不用支付佣金又不用支付管理费用的市政—债券—单位信托。但是除非是在做白日梦，否则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

问：最好是购买什么证券？

答：这谁又说得准？按现在的尺度，有6种最大的基金，其所在地是通常几个地方，而且要求的初始投资额最低。除有另外说明的以外，其佣金都为零。你应该对一下它们的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

1. 忠信市政基金有限公司(波士顿)。最低限额 2500 美元。
2. 凯姆帕市政债券基金有限公司(芝加哥)。100 美元，佣金 4.75%。
3. 德瑞福斯免税债券基金(纽约)。2500 美元。
4. MFS 管理市政债券信托公司(波士顿)。1000 美元，佣金 4.75%。
5. 斯库特管理市政债券公司(波士顿)。1000 美元。
6. 联合免税收入基金(匹茨堡)，1000 美元。

“货物”出门，概不负责！

投资动向 1977年7月27日

证券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利率竞争。大多数经纪所都有可能面临倒闭。

当由竞争泛起的泥沙沉淀下去后，社会将会减少投入到证券交易中去的资金。虽然普通老百姓将失去一些选择机会，但是他们还会获得一些新的选择机会。

总的说来，我怀疑情况将不利于那些想自己管理证券的人。为退休以及意外事故动员储蓄的工作将可能逐步转给公司养老金计划、保险业、银行业以及社会保险。

所有这些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的经济体制显然乐于把储蓄作为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之一。在为旧体制的死亡而抹泪以前，我们需要先调查一下现在梅恩街与华尔街在分配资本方面是否并不比J·P·摩根时期、昌盛的20年代抑或绩效显著的60年代起着更有效的作用。

有效的市场

多数的证据表明，1977年的一些债券、股票的价格要比1957年或1927年定得更合理，与1887年相比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们能够考察典型的经纪商客户是怎样行事的话，结果将强烈地表明，最好是仅仅购买和持有成千上万种已公开发行的按日计算的股票（在风险得到校准的前提下）。对于那些大的货币管理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大部分证券买卖的周转被证明是健全而剧烈的，这并不说明什么，而只是表明资源将在订单、电话费和帐单中耗尽。这也就是在华尔街上有这么多的决策者实际上成为“储藏室

指示器”的原因，他们为了顾全其他而放弃手中持有的过多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埃文公司以及柯达公司的股票。

最精明的投资者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证券周转过快的弊端。只要那些既有经验，又有条件收集、分析有关信息的投资者一发现市场在定价中有错误就准备介入市场，那么，我们其余的人就只能尽可能使自己的经营多样化。

良药苦口。在《新闻周刊》的成百万的读者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们能胜过标准及普尔公司的500种股票指数的管理水平。不然，金融界就连利息也支付不起。

不过，虽然我知道缺乏客观事实去证实，但我想在如此众多的人中，凡是能获取有关的信息并且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去证明在一定的时期内将赌注押在股票上是合理的人，恐怕还不足一千。要想理解投资业的动荡不定，就必须承认上述这一基本事实。

巴纳姆是对的

就像化妆品工业一样，证券业是在从事销售幻想的业务。有多少牙医有资格对大豆的期货交易发表重要的见解呢？可以肯定人数要少于干这一行的人数。

最近几年，对于股票业来说最合口味的莫过于股票期货的期权市场。（它由各种合同组成，使得你能够在将来任一时期内，以一固定价格进行特定的股票交易。如果股票的价格定得合理的话，你就会因此而获利。）各种交易都在为这些有利可图的买卖而相互竞争。

在郊区，我的一个邻居认为他能因买了买卖期货权而获

得每年 20 % 的利息。而另外一些人为了在股票交易中寻求高额利润而抛售掉由那些同样的股票组成的期货权。我的一些在学术界的同行已经解决了期货权定价的计算问题，所以他们既不愿与买方也不愿与卖方成交。实际的经验似乎肯定了这一计算公式的现实意义。

社会并不只是靠标准及普尔公司的 500 种股票生活的。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仍然需要完善有效的手段以评估、支持小的冒险事业。过去在这一方面，我关于金融改革的请求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回报，这促使我建议建立一种仅仅持有众多小企业股票的、不付佣金的、费用低廉的互助基金。

悬而未决 1978 年 2 月 13 日

以后，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变得越来越穷。一个人能够期望靠自己青壮年时的收入生活，这是生命的生物学事实的一个部分。众所周知，人们正是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而储蓄的。

吉蒂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以及所有那些积聚了巨大财富以留给子孙或捐献给慈善基金的富翁们，却戏剧性地不受一般经济生活规律的制约。正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法朗哥·莫迪利阿尼毕生从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只有生命·周期·储蓄·理论，才能最确切地解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资本形成过程。

虽然 1977 年是美国经济充满生气的增长年份，但人们手中持有的普通股票却在跌价。退休人员服务公司持有的养老金资产也面临同样的恶运。只有那些跟得上生活费用上涨的人才会将钱存入利率为 6 % 的储蓄帐户，但当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交了税后，他们的实际收入也下降了。

救命稻草

只有两种资产是保值的。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多数人的社会保险支付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而逐步上升。不管有关没有偿付能力的传说怎样周期性地到处传播，以社会保险为形式的家庭防务第一线无疑取决于国家收益能力的增加。而且，它能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提供基本的保证。

另外，在多数地方，房屋价格都在持续上涨。建筑成本持续地无情上涨，新建房屋价格的上升又抬高了老房屋的身价。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家庭认为有必要购买超过他们支付能力的住房，只是房价上涨这一事实使得他们不得不从这一近乎疯狂的想法中摆脱出来。

最近几年，在由常规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绩效的情况下，一些略为不常规的选择机会自然对人们很有吸引力。人们常常这样问我：

“如果去购买钻石、东方地毯、绘画、出版物、古董、邮票、农田、桔园、避税石油经营、太阳国公寓、山地、海岸权、金棒、金币（如美国的鹰金币、法国的拿破仑金币、南非的克拉格仑德金币）、金矿股票等等，是否算更加谨慎，也更能得利？”

“购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机器公司的买卖期货权、股票出售期货权或者其他类似的期货权，是否就能赚回、至少保住本金的实际价值？大豆的期货交易、猪肚、银、铜等的行情是否看好？谨慎地试着从事外币期货交易（德国马克、日元、英镑、瑞士法郎），是否就能保障老年以后的生活？”

并非点金之石

仔细的调查表明，对于智力一般的非专业人员来说，这些

策略没有一个会得到报偿。新天地总是呈现在恰好捷足先登者的眼前。专业上的知识、勤奋的精神会给人们任何形式的行动带来报答。

事实上，当资产变现之风正在刮起之时，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竞争市场上是无处可以躲藏的。你们天真地听信谣言，以为邻居们果真在伦敦商品期货交易或者私人发行的纪念币买卖中发财。

请不要误解：以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谨慎地购买一小部分闭口黄金基金或者金币还是有意义的。我认识的一位化学家，天天研究商品目录和拍卖信息，因而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晚年后他会因此而富裕起来。然而，这些并非是易于效法的样板。在难于保持净值的时期，遵循以下的投资金科玉律就显得更加重要：

广泛地将资产多样化，降低周转费用，使各种费用都尽可能地减少。

当人们问及阿倍尔·塞耶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都在干什么，他回答道：“我活过来了。”对于那些很难成为见多识广的人来说，生存的条件从未像现在那么好过。

明智的对策 1978年3月6日

现在，小投资者首次能在普通股票与债券领域内有效而便利地从事投资这一行当。在此，我想讲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拥有1000万美元的巨资，不想冒无谓的风险，也不沉迷于拿破仑式的幻想，即不认为自己是那种能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三倍的人。他舍不得花费时间去保存税收与个人业务方面的记录。并且希望在新年伊始或者准备所得税应报表时，才考虑

他自己的投资业务。

公正的金融界专家们为上述类型的人开了以下的处方：

1. 你愿意决定将多少养老金用于购买普通股票：0%？100%？30%？还是70%？这取决于你对持有普通股票所面临的不可削减的风险的容忍程度。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作出决定。你必须决定一个能使你晚上睡得安稳的比例，并确定股票是否能够比前12年更有效地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许多人都取50%这个比例。）

2. 在决定持有何种普通股票方面，可以遵循下面一条谨慎的金科玉律：

广泛地将资产多样化，降低周转费用，使各种费用（和簿记量）尽可能减少。

3. 这一规则（多样化等）同样适用于免税的和常规的债券。如果你拥有2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应税所得，其中大部分债券也许应是市政债券，即州和地方债券。由于国会拒绝弥补这一漏洞，所以这类债券可以免掉所有的联邦税。欠富裕的人在地方银行开户储蓄可能不会差于从事其他任何交易。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那么又怎么去做呢？

互助基金

对多数人来说，最好的也是量简单的方法是利用不付佣金的互助基金。不管是普通股票的互助基金，还是债券收入的或是金融市场的互助基金，或者是上述三类的组合的互助基金。

类似这样的基金有几百种。其中数十个具有费用最低廉以及广泛多样化的实效。就我本人而言，如果哪个小基金凑

巧在最近创下最好经营记录，我也不会因此把资金投到那儿去。

当我终于成为祖父时，我给小詹姆斯的礼物是第一指数化投资信托公司的股票。在该公司投资费用低廉，可与标准及普尔公司的 500 种指数化多样化股票相媲美。的确，1977 年有许多基金胜过标准及普尔公司的指数化股票。但在詹姆斯的面前还有很长的生命之路，所以我所考虑的是长远的优势。不用说，假如我把资金投在德瑞富斯、忠信、斯哥德、T·罗尔·普赖斯或另外六七家类似的全面服务的金融公司，结果可能也相妨。

· 有关的一个案例

为了明确起见，这里举一个年收入为 30000 美元、年龄为 53 岁的工程师的例子。以下所讲的也同样适用于继承了 200000 美元的寡妇。

1. 将你一半的净资产投入不付佣金、低周转的类似第一指数化投资信托公司这样的股票基金。使全部的红利与资本所得自动地返回再投资。在你感到方便的时候，可以支取一些用于日常生活与节假旅游。（每年只需过问五六张简单的报表；只需花 10 分钟的时间，即能根据这一年的报表，将你的所得税应报表归档。

2. 将你三分之一的资产投入不用支付佣金的市政债券基金中（像联合免税收入基金或瓦尔威克市政债券基金）。你能够在这一帐户上开取支票以备零用。如上所述，它们所需的簿记量是最少的。现在，市政基金支付 5% 免掉联邦税的利息，但还是有一些会引起资本损失的风险。

以上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行为法则。由于立即税为零，你自己的个人库夫养老金计划也许会偏向于利用高利息的收入基金(如忠信累进收入基金)。由于资产广泛地多样化，持有不值钱的债券所面临的风险还是可以承受的。

此外，那些认为自己善于把握市场动荡不定时机的人能够不费什么代价就从一个组织的基金转向另一个基金——例如，多购一些瓦尔威克市政基金的股票，减少手中的第一指数化基金的股票，而这两个基金同属于先锋集团。对于固执己见、老于世故的人来说，发生其他的变化也是可能的。

不过，你们中的多数都希望坚持基本的原则，因此金融教授将为你的真诚而给你打个5分，尔后你就能把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谨慎而精明的投资方式 1980年2月4日

我妻子常常满怀希望地倾听朱丽叶·柴尔德的诉说，随后放下手中的铅笔说道：“为了一个煎蛋饼不值得去惹这一切的麻烦。”

这也是许多明达之士对管理他们终身储蓄的杂事的想法。如果说学会谨慎的代价是必须阅读《巴伦斯》、《福布斯》及《机构投资者》，留意商业部的重要指数，推断大豆生产地区的雨情，那么对于工作繁忙的生物化学家、律师以及家庭主妇来说，这一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好的习惯

对于这些忙人，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有一种管理储蓄的方法，你们自己只需花费最少量的工作。但是你们

会问：“就不存在一种既正确又便利的方法？当我迫不得已使用便利的方法时，为了保证安全和获取平均利息，我们必须牺牲点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上述的好消息上吧。按简单的方法行事基本上是不会有什麼不谨慎可言的——只要你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当我在训练我的妻子怎样像寡妇那样自己料理金融事务时，我曾详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从关于资产选择的科学与艺术中我所学到的证实了已故的阿尔·凯帕曾告诉过我的有关动画片制作的情况，他说：“我发现如果一周中花两天以上的时间去制作《李尔·艾伯纳》滑稽片的话，那就会把事情弄糟。”

你们那些每天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并订阅《伦敦金融时报》的郊区邻居也是如此。他们所花的证券佣金一再加码，这使得经纪人赚的钱比他们自己赚的更多。（当然，例外是有的。我这里所讲的情况是指在著名金融机构服务的能干的货币管理所取得的平均水平的成功。）

关于谨慎而精明的投资方式，其主要诀窍如下：尽量利用不付佣金的互助基金，尤其是那些费用低廉的基金。现在，让我来举一些例子：

• 假设你的孩子已经出世，并且将在 1998 年进入大学学习。在一年或阿年里每年给她一份免税的 6000 美元作为礼物。将这些钱投入到金融市场基金——任何一种大的基金都可以——而且使她的资产以其低额的税率而得以积累起来。在美国的多数州都有低保管法案，而且你也用不着雇用律师。每年你只要花上半个小时就能从基金会给你的单子中整理出所得税申报表。（疑问：就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答案：谁能

告诉你今后 20 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波士顿大学的慈维·波德尔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对于最短期的固定本金资产，在实际购买力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小的。）

• 假设你和你的配偶年收入共 50000 美元而且要纳相应的税，那么你将现金投入到一种免税的、且允许你在这上面开具大于 500 美元面额支票的金融市场投资基金，而不是用现金购买大额支票或者存入储蓄帐户。这样，你就可以利用银行支票去支付小额票据。在这一免税基金上写上一大额支票就能使你的基金得到补充。利用这样的支票，你可以支付财产税或用作去欧洲旅行的开销。

• 假设你是一个 60 岁的寡妇，留有 300000 美元的保险金额。在你尚有的 20 余年的寿命期内，它将一直为你所用。我希望你能够购买一些能保证实际购买力的年金。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年金。你所能做的是使风险尽可能的小，而不是回避风险。

便利的方法

地方银行的信用部门能为你服务。或者，将钱投入到三个不同的互助基金也能取得与此相当的结果。（如果它们同属于一个机构，你只要挂一个电话就能都联系上。）其中的 1/3 也许应投入到具有广泛多样化功能的普通股票基金中去。选择哪一种基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稳定时期，你不应该一张证券也不要。另外 1/3 也许应投入到债券基金。最后的 1/3 也许应投入到金融市场基金。免税与否取决于你的税率等级。（警告：一旦你已经选择了一条广泛多样化的道路，就不要再寄希望于它能给你带来两倍、三倍的暴利。）

如果你能正确行事的话，保存记录所需的工作量将是最少的。因为基金保管银行会为你做好一切工作。如果你注意研究一些募股说明书，你会发现一些好的基金的年费用率低于资产价值的 1%。

在开始之际应稍稍做一些研究。在知道你已使不可削减的风险与簿记工作降到最低程度后，你就可以轻松一下了。此外，你总是能以最小的代价改变主意。一旦觉得时机来临，你便可抛售手中持有的证券，而去购买其他证券。

想入非非的投资方式 1981年1月26日

人们常常这样问我：要保护自己的储蓄，应阅读些什么。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多数有关投资的畅销读物可能对你有害无益。

这是我的观点。这一观点依据的是我数十年的个人经验，既是作为一个私人投资者的经验，又是作为应非赢利组织之邀提供咨询意见、并偶尔无奈与朋友们讨论金融方法的经济学家的经验。

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哈瓦德·鲁夫喜欢与我作对。数百万人买他写的告诫人们提防银行倒闭、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以及法律与文明崩溃之类的书。

受 骗 者

许多作者总是向人们提供类似以下的忠告：

- 卖掉你的股票与债券。
- 取出存在银行储蓄帐户中的钱。
- 购买一片土地，在树林中将小屋装满足够的粮食以使

自己能在大灾祸中幸免于难，并且要手持来福枪以防范走投无路的受骗者在大难临头时闯入你精心修整的房前草坪。

对于那些持有不同于常规理智的观点的人，我并不想与他们互相讥讽。佛朗兹·匹克、赫瑞·舒尔兹、赫瑞·勃朗、埃略特·吉纳维、乔·格兰维尔以及其他富有的权威们一路笑到银行，认为我正是那种还沉睡于傻瓜天国里的人。

由于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所以他们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明摆着的事实表明，你不能完全相信他们。

从本质上说，科学不是什么个人的奇谈。科学，尤其是非精确的科学，是可复制以供人们分析的公共知识。近50年以来，各商学院的教授们都在研究股票交易统计分析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平均预测准确度。所有的互助基金、养老金、保险服务业和投资顾问都已经将股市分析家的目标与统计行为作了比较。

研究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干得好些，有的干得差些。干得极好与极差的只占一小部分。在英国博物馆里，如果你待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发现那儿趴在打字机前的猴子也会正确无误地复制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内容来。因此，要确定在每一时代为数很少的最佳分析家的预测平均准确率是否有惊人之处，科学家必须进行有意义的统计检验。

结果会怎样呢？大量的证据表明股票买卖是在“有效的市场”上进行的——即在有许多制约平衡关系的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决定了市场价格，这一价格包含了一些不可忽视的信息，而且它恰好能将空头与多头区分开来。

总之，唾手可得的容易事是不存在的。除非你有特别的信息来源，对得到的信息又能很快地加以分析。一般情况下，

你仅根据过去的股票价格的波动规律是不可能获得风险修正后的超额利息的。事实上，既有特殊信息来源又能成功地把握时机的人是非常少见的。要找出他们，就像要认准股票交易一样困难，而且你会发现，要借用他们不寻常的能力，就得支付高额“租金”。

实践检验

关于股票选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即使格兰维尔在选择特定股票方面绩效平平，那么各服务机构能成功地把握时机的证据又是什么？如果仅仅购买并持有股票，你能寄希望于通过每年支付数百万美元给咨询机构，它就能在遇到像1974年那样的坏年景时告诉你该退出市场，而在遇到像1975年那样的好年景时告诉你进入市场吗？

在此，大多数的事实同样也是令人失望的，但也不否认有的咨询人员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在南佛罗里达州，到处都有自封为格兰维尔的人，其中有的人——就像博物馆里的猴子变戏法一样——当道·琼斯指数为800时会成功地购买股票，而当道·琼斯指数为1000时又卖掉所持有的股票。对此，统计学家并不会感到惊奇。

魔术师穆林从不向人透露他所特有的魔术的奥秘。巴纳姆还告诫我们，即使在所揭开的奥秘中也要权衡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用来糊人的。在此基础上，我要告诫大家应该当心，以防受骗。

最后我要警告大家的是，从事任何买卖都可能丢钱，黄金、房地产、一般的指数化股票等也都一样。只有多样化才能降低你所面临的风险。

扼杀金融市场基金? 1981年4月20日

在1939年,是我发明了金融市场基金。在《经济学季刊》上,我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利用用于购买物品与支付帐单的现金来赚得利息呢?为什么不能利用对土地、树木、厂房、机器等社会资产的计息产权来作为货币的供应呢?

以往,我走在了时间的前面。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已使我那镶嵌在象牙塔中的美梦成为现实。由德瑞福斯、忠信和先锋公司提纵的金融市场基金会将14%左右的利息按天支付给你,并且允许你在这种基金上开取支票以支付大额帐单。通过电话或电报,他们会将你的资金送至地方银行。年终,他们在各大城市的管理银行会送交一份关于基金利息的通知书,它有助于你填写所得税申报表。

银行家对金融市场基金的发明者恨之入骨。梅恩大街上,那种只能挣得5—7%利息的短期帐户正移往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结果地方上的建筑商正因得不到抵押贷款而受到损失。

保护主义

当你竞争不过较强的投资商时,你往往会敦促你的银行和建筑业的院外活动分子劝说国会通过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法案。如果国会否决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提案并介入这场论战的话,金融市场基金就需要有一些不生利的储备金存于联邦储备银行中。这多少会使基金顾客的收入有所降低。

在这一事件中,怎样的公共政策才算好呢?请允许我简略地描述一下基本的事实。

不管是不是失误,将储备金强加于金融市场基金头上的

立法只会抑制它们的发展。在发生通货膨胀的不稳定的年代里，金融市场基金有它的经济作用。它们所提供的不止是一个为你我交易现金的便利形式。

芝加哥大学的尤勒·法玛教授所作的统计表明，金融市场以国库券、商业票据、可流通的银行储蓄证书的形式间接替我们持有的流动资产比普通股票或者长期、中期债券能更好地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价格指数上升时，短期利率具有预先对付通货膨胀的保险作用。当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两位数时，为期 30 天的基金产出也会上升为两位数。以此对付通货膨胀，不是很完美吗？不是的——但从 1971 年以来，这些基金已经成为城里最好的投资方式。

有一个办法，国会能给梅恩大街的银行家们一个震动，让他们为我们的银行帐户提供一个与金融市场基金相当的利率。但是根据现行法律，它们之间是不允许相互竞争的。

其实，这对地方建筑商是不会有更多的帮助的。在剑桥，如果我的地方银行想从我的金融市场基金中获得收益，它会不得不去购买商业票据、国库券以及可流通的银行储蓄证书(CDs)，以便与这些金融市场基金的利率相匹配。它不能把我们的钱冻结起来。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安东尼·唐博士认为：房屋建筑因政府补助而剧增。我还要补充一点，对银行以及 S & Ls 所支付的利息的封顶已使更多的资源流向建筑业，这要比人们口味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更大。

果 实

这种基金是否也为生产目的服务？要避免发生那种幼稚

的错误。当我们将钱送至纽约后，它并非就停留在那儿不动了。如果仅在华尔街周围流动，这些基金不可能结出如法玛数据所示的实际“果实”。

在此，果实比喻社会的实际产出，而且如果同意这样的比喻，那么这些“果实”是由经济之“树”——机器、工厂和实际资本物——结出的。而草原上的脱粒机，梅恩大街上的装备，矿山等——这类资本物是计算机输出文件上的另一半，它表示了现金的平衡。

由于每种本金都会遇到风险，那么怎样才能保全我们的钱财而不管所基于的资本物的价值是上升还是下跌？正是那些寄希望于普通股票利息的股东忍受着支付给我们利息后残余的风险。而我们面临的唯一风险是明天的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不过，幸运的是，其实际的“平均利息”显然是平稳的。

我知道这样一个案例，联邦储备委员会要求金融市场基金持有储备金。

为了稳定价格杠杆，我们应该控制住社会的货币总供应量。如果金融市场资产成为唯一的货币，那么金融市场的组织就相应成为唯一的银行，而且就像现在银行所面临的问题那样也要设法控制储备金。

资 本 形 成

卖出的时机 1978年12月11日

在卡特总统宣布其挽救美元的新计划前的一个小时，我正在接受牙齿定期检查。我的朋友脸色苍白地说道：“现在

让我们来谈一个严重的事情，我是否应卖掉所持有的普通股票？”

这可不是一个让经济学教授来回答的问题。我希望和我的牙医一起度过一长段好年景。现在提出劝告，效果不一定好。如果你的劝告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很自然会夸耀自己接受你提出的假设是多么的聪敏，不然他们只会记住是在哪儿首次听到这种说法的。

然而，我听到自己也在发出人们已经听腻了的警告。一个人如果一张股票也没有，他不一定就比人家安心。如果通货膨胀加剧，那些利率锁在 9% 的长期债券就会非常令人沮丧。即使在前 12 年内普通股票对付通货膨胀不灵，但是经验表明，从长时期来看……

进与退的策略

在早晨的其他时间里，我舐着牙龈，默想着过去做过的事情。确实，在总统表现出未曾预料到的果断后，道·琼斯平均价格指数上升了 30 个百分点。

然而，我依然心怀希波克拉底似的誓言，在没有发生非常事件的情形下，经济学家不应干损人之事。在陈述各种机会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原因时，经济学家应根据不确定性来加以描述。曾经有人要我对当今杰出的经济学家作一非正式的评价，我是这样来评价我的一个朋友的：“除了‘也许’这个礼物外，上帝给了他所有的天赋。”

而且，我感到自己很顽固不化。让我简述一下理由：

首先，我能作出现在应卖掉股票的判断。过去，在经济进入衰退之前，股票价格就已经趋于下降了。（“市场已经正确

预示了9次类似前5次的衰退，”有些贤者这样认为。)最近，大多数可敬、优秀的经济预测家都认为，1979年会有一场经济衰退。明年春天，人们也许能以低价将股票买回。同时，在复苏的债券市场上也许能够即刻获得高额利润。

我也能在这一买卖策略中找出漏洞。搞这种交易要能够敏捷地抓住时机。事情往往是等股票价格开始上涨后你还没有开始买进股票，然后等价格比现在还高时，也许你才买进。经验表明，能成功地玩弄出入市场游戏的人是很少的。你所知道的，人家也都知道。你为什么会比人家幸运呢？华尔街也许已经忽视了将会发生最糟情况的可能。

金融市场的象散现象？

接着就是下面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美国，股票的价格是怎样根据其固有价值而定的？虽然经济学家已经学会尊重市场制约平衡机制的有效性，然而关于上述问题，他们的观点很有趣。

人们能够作出富有说服力的判断：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股票价格还算是低的。为什么？因为公众错误地估价了通货膨胀对股票价值的影响。

通常，人们忽视了通货膨胀利润中的虚假成分；低估了隐藏在金融资本价值中、产生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提高了美国生利资本的再生产成本时期的收益；并且没有注意到当用现金支付时从债券持有者手中转移到普通股票持有者手里的收益。

可以肯定，会有办法用于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假象利润征收超额利润税——如果当纳税义务所容许的历史成本的下降

不能弥补更新成本的下降时。然而在进行各种必须的修正后，我们的观点仍然如此。

当我们期望价格一年上升5个百分点而不是一成不变时，债券利率从5%上升至10%还是合理的，即债券的价格—收益比从20:1下降至10:1。但是因通货膨胀而使普通股票的价格—收益比下降至原来的一半却是不合理的。然而这些正是华尔街上所发生的事情。

总之，持有股票也许是件好事。也许！

资本短缺还是过剩？ 1974年8月26日

“教育就是下断言。”伟大的教育史教师、哈佛大学已故的克伦·布林顿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提醒我们，“教育还在于提出疑问。”

所以，我必须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现在是否真的很缺乏资本？我们确实需要较少地消费、更多地储蓄吗？（毕竟，总统过去一直敦促美国人再将其收入的1.5%存入银行。）

环境主义者的院外活动集团是否真的降低了公司资本的单位产出，从而耗尽了各种资本形成来源的基金而且扼杀了人们从事新的生产厂房和装备投资的积极性？在考虑到厂房、装备的真实重置成本以及因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意外收益而进行某种修正后，余下的一小部分利润是否已经用尽？如若这样，又怎么和声称的资本稀缺而不是资本过剩的观点相一致呢？

上述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而且，从上次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召开的经营经济学家与工商业家的最高级会议上我们获悉，在营业处工作的人十有八九给上述这些问题以肯定的答

复。

他们很可能是对的。不过一群经济学的助理教授们却不会确信如此。

主 张

首先,我们可以保证,多一点生产资本总是件好事,但并不是说很多资本。具有更好的消费标准,拥有更丰富的公共物品(不需代价),得到更加人道的政府的收入转让都是好事。

其次,在资本—证券这一问题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使在现在的衰退期,一些基本的材料工业——造纸业、钢铁业、化工业、塑料业、家用石油精炼业——也是昼夜 24 小时不停地运转。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它早期不合适的能力指数作了修正,那么分析家们对缺乏超额能力这一显然的事实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再次,环境问题也是值得担忧的问题。就像任何其他有益的活动(例如,对空调的需求,对旅行的需求,对室内网球场的需求)那样,环境问题也将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正加泵机、催化剂以及过滤系统的制造商所知道的那样,环境上的考虑对于工业远远不只是一种阻碍,而且还会创造出获得利润的机会。

资本缺乏问题就说到这儿。

相反的主张

下面是另一方的观点:

1. 如果说资本稀缺,那么其税前、税后的利润应是上升

而不是下降。但是事实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资本利润都在下降，而且一直在下降。在 1974 年关于经济活动的布鲁金斯论文集中，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华德就已经计算到这次衰退。对因通货膨胀导致的虚假利润作了详细的修正后，他发现，在 70 年代，税后的真实资本利润已经下降至 5% 至 6% 之间。而在 40 年代后期，平均的资本利润率在 8% 以上，60 年代也是如此。你别以为仅仅是税收在作怪，诺华德的报告还告诉人们，公司资本的税前利润也是下降的。

在意大利和英国，情况更富有喜剧性。联邦德国与日本在这一世界性的资本竞争中也未能幸免于难。

2. 在可支配收入中，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相比，现在美国家庭用于储蓄的那部分钱并不少。在 70 年代，我们将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储蓄。而且公司看来倾向于以利润的形式而不像过去那样以支付股息的形式来将储蓄用于再投资。这些天来，倒是投资于新企业的资本却在步入困境。

3. 鉴于人们能够廉价购买到美国企业的现存资产，对于新上市的股票难于浮动这一事实，人们难道能不表示诧异吗？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在 7 月份的《摩根抵押评述》上计算出，华尔街上美国资产的卖价与他们用于再生产时的实际价值之间的比例只及 10 年前的 2/3。

资本稀缺吗？然而在自由市场上，资本为什么又要降价卖出呢？

股票的窘境 1979 年 6 月 11 日

美国正处于增长性衰退时期，这是事实。1979 年是否就会见到一次真正的衰退，这还需要讨论。

现在我认为，即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2个百分点或甚至更多一点，经济状况还是已经有所好转——拉斯·凡格斯资产流动性测试将赌注押在是否会出现衰退这一点上。而卡特总统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也许卡特是对的。

经济学不是一门很精确的科学，因此事先不可能在彻底的衰退与增长性衰退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然而对于你试图保存储蓄以及保证将来的生活水准的做法来说，能不能划出一条确切的界线。这个问题是否很关键呢？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该抛售股票而转向债券的时机了呢？

人们是否应该在经济周期的这一阶段耐心等待，继续持有短期银行票证以及金融市场基金呢？为期30天的国库券的年利率为10%，它胜过各种已在为你服务的股票和长期债券——即使这还低于刚刚宣布的13%的消费品价格年增长率。

华尔街年鉴

在我身处的舞台上，人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没有人能提供确信的答案。不过，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和那些有必要加以分析的事实。

梅恩大街面临困境时，意味着华尔街也往往面临着困境。当贸易商与投资者焦急地凝视着前方预期的麻烦而又低估了它的严重性时，道·琼斯平均指数就会率先下降，原因就在于此。一旦复苏已在眼前，那么普通股票甚至会在生产与就业情况好转以前就会提前看好。

我们不必夸张市场的先见之明。市场发展的道路已经历了许多错误的起点并且走了很多没有意义的曲折弯路。我为过去没有竭力宣传“股票市场已预测到9次类似前面5次的

衰退”这一格言而感到内疚。

总而言之，过去的经验表明，当萧条在前面隐隐出现时，应将股票抛售出去。一俟利率自然下降或者被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紧缩政策强压下去时，精明而又能把握时机的投资者就会在长期债券价格的暴涨过程中抓住好时机。当最糟的营业期快结束时，他们又会机敏地在复苏之机恰好回到股票交易中来。

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不是吗？那么为什么又几乎无人能在这场玩弄时机的游戏中获得成功呢？对此请不要发生误解，互助基金和货币管理人员把握时机的绩效记录衰明，正是许多人的失败为每一成功的人铺了路。保险公司和信用机构经常利用许可证来禁止运用自由选择权限，并且在股票与固定本金资产之间运用长期多样化准则，原因也在于此。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并且利用经济上升与下降之机赚取利润的话，那么我们都会试着去这样做的。怎样才能力克群雄呢？

在被识别的经济周期成为历史上的不朽之物以前，经济一直处于本身的危机之中。吐温说，不同的观点应该像赛马一样地互相竞赛。在关于什么东西有利于华尔街上的3000万股日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疑惑。将来，空头将会转向多头。只有美国国内税务局才会在明年4月份获悉究竟会出现哪个。

在出发的门前

人类并不是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已经交得更加复杂而且更为焦躁不安。我经常遇到下列这些新的转折。

“我正在为衰退而欢呼。就像轻啤一样，较少的啤酒会溢出杯来，轻微的通货膨胀也会使得股票价格上涨。待到我们已能看见下次复苏的曙光时，购买股票就等于冒险让气球在没有拽住的情况下飞上天空。”

也许如此。上一次如果按上述的推理，那么等到他人得到信息，你就得付出近 1/3 的储备金，现在向人们指出这一点是没有用的。时过境迁，这才是关键。

我猜想，正是由于一个相当特殊的观点——即股票价格总的说来定得过低这一广泛流传的疑惑，才使股票价格上涨。正是由于在过去的 10 年中通货膨胀使股票实际上严重贬值，现在购买这些股票可谓是大好时机。

麻省理工学院的弗朗哥·莫迪利阿尼和伊利诺大学的理查德·库恩在上一期的《金融分析》上叙述过这一情况。文章既简单又有说服力。文章的内容摘要如下：“因为投资者以名义上的利率（没有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而非经济学上加以修正后的利率，将股票的收入再用于投资，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把因名义上的公司债券的实际价值贬值而给股票持有者带来收入的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当债权人兑现时），所以他们经常将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估了 50%。”

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让资产多样化。

胜者与败者 1980 年 11 月 24 日

竞选日以后，我问我的助手她对竞选结果有何感受。

“我投了里根一票，”她说。

“那你一定会很高兴，”我傻乎乎地说道。

“我怎么会高兴？我的姐姐会因此失去福利补助，我的外

甥也会因此不得不放弃学习计算机课程而去擦皮鞋。如果再停止给他们发放食品券,我真不知他们将靠什么度日。”

也是那个早上的晚些时候,我在银行门前遇见一位富有的工程师,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我讲授的经济学课程,获得“A”的成绩。显然,他投了约翰·安德森一票,不过他却还是在咧着嘴微笑。

复 杂 性

当我问起有什么事情使他这么高兴,他解释道:“如果这个国家不景气,你不能怪罪于我。我是投票反对硬通货的。”

我以在研讨班上讲课时的最佳姿态说道:“也许财政紧缩和控制货币增长的可靠计划会导致阻止通货膨胀的结果。自从你学习经济学以来,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储备银行出现了一种叫‘合理预期’的新学派。他们声称消除通货膨胀并不痛苦——只要你决心对此有所作为而且着意贯彻始终。”

“你所讲的是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在英国推行的一套。”

“是的,但并不完全如此,”我答道,“事情在那儿尚未了结。此外,货币主义者声称撒切尔还没有很严格地控制住货币的供应量。”

“智利、阿根廷情况怎样?”

“智利的货币主义者表示已将年通货膨胀率从最糟时的1000%降至32%,当然这不可能不带来痛苦。”

“阿根廷呢?”

“那儿的事情也没有了结。不过让我来告诉你,1923年,德国成功地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还有现在澳大利亚、

波兰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

哎呀，我的研讨班方式已退化为讲课方式了。从他那直勾勾的眼神中我知道，我正在讲的经济学内容超过了 he 想知道的范围。所以我想通过问他选举对他个人将意味着什么来对此作一补救。正像我喜欢讲授经济学那样，我也喜欢学习经济学。

“由于选民已转向保守，我也许还是赚钱为好，”他说道，“30 年以前，我常常要支付 91% 的边际税率，而且发现，为保障老年以后的生活，还需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随后，艾森豪威尔使我的边际税率降至 77%。在尼克松当政时期，我以仅为 50% 的边际税率纳税。所以，现在我不必像以前那样努力地工作。里根将边际税率降至 35%，应该说是有效的。这样，就是在周五，我也能像在周三那样去打高尔夫球了。”

“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里根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从 28% 降至 20%，那么冬天我也许就能去佛罗里达度假了。”

为了控制话题，我插了一句：“不过，至少在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下，你应将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且去冒更大的风险；这样，国家能形成更多更好的资本，使得提高美国生产率的条件得以具备。”

他以带屈尊俯就的口气说道：“教授，你最好只搞理论金融研究而不要管实际的金融事务。你完全搞错了，既然所得税如此低，那么我就不必再去冒任何风险了。我把我的常规资本收入转化为保险的长期资本收入。这几乎就像是基南教授过去给我们讲的热力学中的永动机一样，而且这完全合法。里根当政后，我将有比卡特时期更多的钱可用于支出，而我也没有必要积蓄那么多。”

教 训

从上述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些什么呢？首先，人们的投票并不总是与自己的经济利益相一致。

更重要的是，金融实践证实了经济理论家必须始终明白的东西。世界上不存在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管这些方法是保守的还是开明的。

期望在以后几年出现供方奇迹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你希望对提高生产率有帮助的许多措施将不再使人们感兴趣，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措施确实能够提高生产率，但是只有在长时期内你才能观察到这种改善。

收 入 分 配

不 平 均 1973年12月17日

汽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会损害穷人的利益这一可能性在提醒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是很不均匀的。要说多数人都是穷人，这是不确切的。应该说多数家庭属中等收入水平，其收入在12000美元左右。不过，由于生活费用剧增，而且大家都在生活上互相攀比，因此，除了其正的穷人，这一收入水平对人们来说似乎是够低的了。

如果某个人工作很努力，或者，某个有某种特殊的需要，那么相对于多数人，他的收入高一点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抽象地来看，减少不必要的贫富不均仍将被视作一个期望的目标，无论是从伦理上、宗教上，还是哲学上来看都是如此。

然而,当我们看了有关收入与财富的统计数据后,我们发现过去的数十年中,总收入在最高的 1/5、最低的 1/5 以及中间 1/5 人之间的比例没有多大的改变。社会总财富是增加了,但各份额的分割却与 1950 年的情况大致相同。这是一个我们不愿忍受的、令人感到不快的事实。能告慰我们的也许是希望随着所分享的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能从凄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贫困已成为人类多数人的特性。

冲突的观点

无论从极左还是极右的观点来看,这一完全不平均的守恒规则都是不会令人惊讶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一位幻想破灭了的自由主义者,他曾追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直至对法西斯主义的幻想也破灭了。他认为他能制定出宏大的社会规则:

每一社会都存在着同样程度的贫富不均现象。要改变这一现象,政府所起的实际作用是非常小的。

而任何一位尽职的马克思主义看都以轻蔑的眼光看待这样的命题:经过和平的经济改良,在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它会愿意甚至能够让人们在更广的范围内共享繁荣。

我属于那种持中间立场观点的人,我认为,提高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的最低标准是我们期望的一个目标。我还认为,逐步降低贫富悬殊程度并逐步实现机会均等是一件吸引人的事,同时也是可行的。

但作为一个学过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人,我的个人经验不允许我认为完成这一任务是件容易的事情。哎,这又不是简

单地劝说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要求各贸易单位降低利润以提高工资总额水平。劝说国会在任何程度上修补我们在累进的收入税和遗产税结构上的漏洞是够困难的。

尼克松先生对这一漏洞的利用只会震惊那些不那么深谙世事的人。美国政府和国会要为制造这些漏洞而感到羞耻，因为那不是光明正大的。

世界潮流

广泛而言，人们有理由感到充满希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欧文·柯瑞维斯教授 1973 年 9 月在《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术年报》上提供的资料收集了众多有价值的已知信息。下而是他的一些发现。

- 在贫富不均的程度上，发达国家倾向于低于不发达国家。（这样，拉了美洲以及亚洲东北部的国家比美国更贫富悬殊。而丹麦、以色列以及那些民族比较单一的福利国家则比美国平均。）

- 在一个国家刚开始进入起飞阶段时，那儿的贫富不均程度也许会加剧。（这样，东方世界的“绿色革命”也许已大大地帮助了那些拥有资本的农户获取可以用以提高杂交作物产量的水、肥等。）

- 在增长的后期，即接近欧洲和美国的富裕水平时，贫富不均程度又会下降。

但是，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的迅速增长与富裕难道非要靠贫富不均来换得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美国已不再处于富裕的顶端。在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我们所占的比例在持续

下降。平均主义的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我们，瑞士和联邦德国也许也是如此。

我们是否注意到这一重大的事实了呢？

穿过黄金通道的黄金 1975年5月26日

新涌入的越南移民，会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人们首先得推测一下21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一生的最后20年在哈佛度过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常常过于吹捧美国。与英国相比，他所颂扬的一件事是我们的多民族特点，他把此归因于我们这个国家移民来源的多样化。不管大自然是否喜爱多样化，那些最终得到她的爱的种族，即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的种族，都经常得到她的赐福。从这个观点出发，越南人是亚洲人、具有与我们不同的种族这一事实，应该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还有，这127000名未来的移民远远不是南越社会的一个随便拼凑的样本——就像迈阿密的古巴人不是卡斯特罗以前的古巴社会的一个随便拼凑的样本一样。现在住在关岛和本土难民营的人当中，有些人被公认是法国人、美国人以及当地殖民帝国主义者的高级“走狗”。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生气勃勃的中产阶级：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企业家和自学成才的机构领导人。就像能在奴隶船的船舱中漂过波涛汹涌的海洋一样，能挤上即将起飞的直升机也是衡量才能与智谋的标准。

进口智力资本

进入我脑海的类似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群才

能超群的俄罗斯难民，就更不用说那些二战时来自希特勒欧洲的难民了。库塞维兹克、提莫森科、郁波库、索罗金、里昂惕夫、库兹涅茨、斯特拉文斯基、巴朗钦、克斯特库斯基——有名的学者与艺术家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来。连这样的人才都不需要的社会，与其说是被人羡慕还不如说是让人怜悯。

人们还能回忆起英国从法国对胡格诺教徒的驱逐中得到巨大的财富而法国却因此陷入贫困的事例。

只注意登上顶峰的人是一种错误，我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许多得过博士头衔的人最终只能以驾驶巴黎出租汽车而谋生。对这些越南人来说，情形也将是如此。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开始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底层。就像在南北战争以前，南方的逃生者在诗与歌中所记载的那样，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是相当困难的。

尽管埃玛·拉扎罗斯对挤作一团的贫苦大众对黄金国的向往有过一番赞扬，然而，那些新近来到我们黄金国的移民却拥挤在臭汗熏人的贫民窟。这一景象今天再现在波多黎各人聚集的贫民区以及美籍墨西哥人居住的洛杉矶东部。

债权与债务

当有人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跑到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时，可以预见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上升。那些富国的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土地所有者、资本物持有者以及具有各种技能的工人）会从那些新来的劳动力身上获得利益。因此，如果不谈环境拥挤，美国会因越南、古巴、波多黎各以及爱尔兰、德国、英国劳动力的输入而使物质上更加富裕。

瑞士、德国和法国已经因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西班牙、土耳其、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的“宾客”劳力的输入而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事实上，瑞士的公民更像是古时候由奴隶伺候的雅典自由民。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而且，没有一个瑞士人需要干脏活。这种活在每个社会里总得有入干：就像在培肯山上的米拉弟自然是由一个叫做布里奇特的人帮助她干家务一样，瑞士人自然是让“客人”帮助他们干脏活。

尽管在加州帝国山谷那儿非法入境的墨西哥工人拿的是最低工资，享受的是最低水平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收入要明显高于同样地位的在国内干活的人的收入。只有那些在移民接收国内与新来的移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长的工人才会感到受到了损害。在这个重新分配财富的年代里，他们有这样的要求，一个合理的要求，即要求我们其余的人拿出增加了的财富来补偿他们的损失。

为什么我不谈现在我们正处于衰退期，就业机会太少以致于连我们自己的人民都难以满足这一事实呢？因为 35000 名求业者对于 1 亿个劳动力工作岗位来说是可以忽略的。此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伯恩斯博士有能力安余而方便地利用这额外的物质生产人力去扩大信贷。

失 业 1976 年 9 月 6 日

今天，徘徊在善良人心头的幽灵是持久不下的高失业率。最近的失业率达 7.8%。在复苏的阳光下，这一失业率下降的速度慢得令人失望。

福特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知道在选举前夕失业率仍在 7%

以上——仅在三年以前，我们还认为这一失业率高得不可思议。正如我从政府自己的竞赛计划中获悉的，在进入 1980 年之际，失业率仍然不可能降至 5.5% 的水平，而这在福特执政时是件很寻常的事。

期望加快疲软的复苏步伐的想法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必将成为卡特赢得那些忧心忡忡的中下阶层选民好感的竞选问题，这些人曾大批大批地背叛了民主党，投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票。

诊断与错误的药方

暂且不论政治，经济学家对现在这种长期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现象作如何的分析呢？

首先，众所周知，今天的失业比大萧条时期的失业有更多的自己选择成分。在我们的混合经济中，有一种精心设置的福利措施，它使得人们在即使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一些收入。

其次，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现在有更多的青年与妇女成了劳动力。与临近退休的成年男子相比，青年与妇女更喜欢变更工作，这样，在变更工作和进出劳动力市场之间就会经历一个失业期。然而，60 年代中期 4% 的失业率与近年来 7.5% 的失业率之间的大部分差别不能被解释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高失业率持久不下，许多人对此非常担心，他们写信给我建议减少周工作时数。或者只让每个家庭有一人工作（通常是男子）。或者我们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来解决被称为消费不足的长期性问题。

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回答，在这些答案中不存在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减少每个人的周工作时数，我们的现代化经济将再次产生助长长期性失业的滞胀条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提供全日制工作岗位。相反，为此而必须有的财政与货币能力是太大了。

基本的治疗方法

那么，为什么不去做我说过能做到的事呢？福特或者像卡特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不去要求制定足够大的开支计划使失业率下降——比如下降至4%——的原因是，担心实施这样的货币政策会再次带来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大致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担忧。他们的分歧点，或者说严重分歧点，在于怎样才算恰到好处：在通货膨胀这只恶狗摆脱绳索以前，在多长的时期里，失业率能安全地降低至什么样的程度？

福特的经济学家们更担忧通货膨胀。大部分成员由共和党任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如此。我认为他们过于考虑了通货膨胀这一因素。但是这不是说诚实的经济学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在国会抛出哈姆夫端—豪金斯议案的民主党人的观点。

我希望卡特能找到一条中间的道路。实际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财政刺激（降低税收以及增加支出）加上国会为求得适当的货币政策而加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头上的压力能加快复苏的疲软步伐。

这多少是点安慰，但还不充分。此外，我们需要探索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路子以使经济系统不易发生通货膨胀。

除了安排重新训练和重新安置的计划外，还应向有色人种、妇女、青年和无技能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使人道的系统更富人道，不过，让我们使它更像竞争性市场一样地运转。那儿未被利用的人材的压力抑制着薪金的膨胀。要成功地迎接这一挑战，困难是巨大的，但是社会所获得的利益也同样是巨大的。

税制改革 1976年9月27日

尽管似冰河移动般的缓慢，美国税法上的漏洞还是正在被逐渐堵住。通常，就像1976年对联邦税收法的修正一样，这是一个进两步还是退一步的问题。

为什么会引出一场关于适当的税收立法的争论呢？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不同利益集团的民主社会中。有些事情对石油钻探人虽有利，但却会损害多数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人的利益。虽然因此受惠的选民人数远远少于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数，但是在国会议员选举与总统选举的时候，后者所受的损害由于过于普遍而被人忽略了。

相反，税法中一条有价值的条款对一些公司企业来说也许确实实价值数百万。难怪有人支持院外活动分子去影响立法过程。奇怪的是海湾丑闻却是很少面不是很多。

美元增加了个人的有效投票，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只是观察家们夸大了“美元政治”的重要性。我想他们面此太少关注如下所述的有关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那些自己并不富裕的人却乐于和富裕的人站在一边，因而就会倾向于赞同有助于收入与财富不均等现象存在的措施。

以公平的眼光看待平等

直率地讲,许多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及思路清晰的人,对税制改革也怀有一种模糊的害怕感觉。他们将税制改革与加于他们身上的高税率等同起来,而且认为这样下去税率不知会提高至怎么高的程度。像哈佛法学院的斯坦莱·苏瑞这样的多闻博识的律师,或者像布鲁金斯的约瑟夫·佩克曼这样的研究税制改革的专业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计算表明,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只会从保证同等地对持具有不同收入的人的法律的修改中获得利益。

如果对某种收入形式不给予特殊的对持,那么就能使所有的收入税税率下降得比较低。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属资本收益以及属避税投资的市政债券的利息不用纳税或仅纳一点,所以人们必须为每美元通常的红利和利息交纳70%的税,并且为月薪中的每一美元交纳50%的税。

然而,有的人会争辩:“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些漏洞来呼吸。如果你认真看待美国的税制和社会保险系统在减少机会与条件上的不均等程度方面的作用,并且利用这一点为你服务,那么你一定危及其不断上升的高水平的美国生活水准。

有人认为聚集在一起为美好社会建立规则 and 法律的自由人民会同意保全市场产生的不平等的社会契约。经历过同样生活变迁的人可能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建立一个基于人民支付能力的累进税率网。从哲学上说,我不认为这一观点站得住脚。

公平与增长

现在,我的目的不是从哲学上面是从实际上考察那些认

真减轻不平等现象的国家的相对增长记录。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刚刚公布了属于该组织的国家的收入分布数据(1976年7月)。它证实了这样的猜想,即法国与荷兰、瑞典以及挪威相比,收入更不平等。然而,只是认识到法国最低收入阶层的贫困程度这一点才在法国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法国,占总人口10%的富人的收入是占总人口10%的穷人的收入的22倍;在德国,这个数字是11;在美国是15。

下而是11个国家税后收入平等程度的次序:荷兰、瑞典、挪威、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美国、西班牙、法国。

将这些事实与罗德里安关于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不平等的论点对比一下。如果日本,德国——就不要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荷兰了——能获得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且同时又减少不平等,为什么将税制改革视作坏事呢?

福利改革 1977年8月29日

狄斯雷利写道:英国被分成两个国家,特权阶层和平民阶层——或简言之,英国被分成了富人与穷人两部分。到1977年为止,我们的社会也仍然被分成穷人与其他人。

不过,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大笔一挥将贫困一次性地永远消灭呢?这确实就是15年以前密歇根大学的一些专家们认为能够做到的事情。由于这些人中有林登·约翰逊的卫生教育福利部长韦伯·库恩,所以值得研究他们在1962年所讲的话:

“美国已经到了贫困能被很简易地一笔抹掉的地步。现

在，将我们国家在维持生存收入线以下的家庭与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至维持生存收入线以上，每年大约要花费 100 亿美元（1977 年也许要花费 350 亿美元）。这一数字小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税收收入的 10%。它大约只相当于国防费用的 1/15（在 1977 年相当于 1/13）。”

你会说这是一宗好买卖？一次性就能将贫穷永远消灭了？

哎，我担心，这个问题不会就这么容易地解决。确实，如果亚伯拉罕·林肯以战前的市场价格将奴隶全部买下就能避免南北战争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先赚取数十亿美元的钱，更不谈什么解救数千万的生灵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花一点钱就足以消除苏联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或者解决癌症问题，或者解决寒冷与能源的问题。

阴冷的一极

最近，密歇根大学为政府做的一项关于 5000 户家庭的调查研究表明：对应于每一个实际上处于贫穷状态的家庭，还有若干家庭已处于贫穷的边缘。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早已知道的情况。

资本主义社会就像是一个旅馆。它的屋顶房间总是客满，但这 10 年的房客与过去 10 年的房客并不相同。而且它的地下室也总是挤满了住店的人。住在这儿的人也不总是同样的一些人，当威尔金斯·密克伯“跌”进地窖的同时，欧瑞哈·海帕却“爬”了出来。

对同样一组家庭从 1967 年至 1976 年的情况的跟踪调查表明，在这些年中一直处于按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很少，仅占 20%—30%；永远步出了贫困行列的人也很少

——不到 1/4。使客观的观察家们感到惊讶的是通常中产阶级的贫穷观点是多么不切实际，他们认为，无能的人自愿将贫困的枷锁套在头上。

这一综合抽样调查展示了哪些可用于驳斥那种奇谈的事实呢？下面是 1977 年收入动态研究委员会的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发现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证据能证明：像个人自信、野心、成就感、情感、未来倾向、对他人的信任、预期规划、节约、避免风险……等这一类的态度和行为，伴随着金融业务上的成功，事实上能导致经济上的进步。”

相反，处于贫穷状态就意味着是老人、黑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家庭主妇。因此改变家庭的构成被证明是关键。

《圣经》上说，光靠想象是不能增加你的身高的。同样，通过一个代勤·卡内基自我改良过程或者下决心成为节俭而精力旺盛的人不能改变你的肤色、年龄和性别，也不能带来金融业务上的安全。

卡特的建议

穷人并不永远是一小部分给点救济就能简单了事的人，从这一发现中我们还能够得到点什么呢？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应刺激每个人去从工作中获得收入，同时，对于他们自己不能满足的需要，应从政府那儿得到人道主义的帮助。公众在关于穷人中有多少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收入这一点上也许是不现实的。但公众的直觉是对的，救济既昂贵又会使刺激失去作用。

经验使人们怀疑能够创造出合适的公共和私人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以节省相当数量的失业救济开支。卡特的新计划

将制定这样的原则：调整福利补助，给人们一个能够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收入的刺激。新计划还试图在这一混乱的体制中引入一种不同形式的负所得税。对此，我要欢呼，万岁！

歧视经济学 1978年7月10日

与卷入上星期的贝克案件的情况相比较，减少就业上的歧视所造成的政策窘境还是比较轻微的。经济学原理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如果医学院允许在100名新生中有25名有色人入学，那么留给白人申请者的名额就只有75个了。这就是经济学家和数学家所谓的“零和规则”。在这一对策中，少数民族所获得的每一个利益都要以牺牲其他人——白人、官僚集团、新英格兰人的利益为代价。

协作还是竞争

“零和规则”中的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可以说也存在于外国人与移民之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担忧新的移民涌入美国会损害原已在美国的人的利益。追溯至19世纪末，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当时美国最负声望的经济学家金·弗朗西斯·瓦克也同样持敌视移民的观点。当新来的移民从当地人手中夺取工作而且全面压低了薪水水平时，瓦克坚信美国本土的出生率会降下来。其结果将由德国人、爱尔兰人、瑞典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斯拉夫人取代新英格兰人。

妇女为求好工作而与男子竞争同样是笼罩在许多男子头上的阴影，他们担心这么多的妇女热衷于获得一个永久性的

职业会影响男子的薪水、奖金乃至威信。大萧条年代，在许多州，丈夫在职的女教师的就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有人争辩道：“我们必须合理分配有限的工作。允许一个家庭中有第二个人出来工作，从而夺走别人的饭碗，这是很不公正的。”

经过对经济体系本质的精心分析，经济学家发现这不一定是个“零和规则”。经济学家将那种坚信在任何时期——1973年或1978年——只有那么一些就业机会的观点称为“包干就业谬误”。经济学家指出，为了在尽可能多的人中分配据称是有限的工作与收入而坚持要减少工人的周工作时数的做法，是一种虚假的绝望观。

劳动者、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工具及装备的拥有者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社会总财富的大小并不固定，因而也就不会存在分享利润的人越多，则每个人获得的薪水就越少的局面。相反，国家的总产出是由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资本物和通过教育训练而造就的人的才能——协作生产出来的。

当一个国家由于出生率高于死亡率或者由于移民以及妇女就业的增加而获得新的人力资源时，同样数目的土地和资本物的补充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人力资源的增加在多数场合会提供新的工人。雇主不会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给工人任何东西，工人只是挣得他自己的生活费。

好消息

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会带来一系列重要的结果。上诉至最高法院的那个问题——僧多粥少，如何分配？——不是我们在寻求种族平等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每一生产性投入都是有报酬的，男子与劳动力市场上新增的妇女都期望得到高收入的职业。白人中的穷人以及社会中其他群体的人都不必担心增加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的后代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的福利会以降低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准为代价。

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发现。上面所讲的东西还要受到另一条件的制约。报酬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在一固定的土地和资本物上集聚过多的劳动力时，那么相对于以前较少量的劳动力投入，所享受的薪水水平会有所下降。幸运的是，最成功的经济计量研究表明，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响。

社会 保 险

社会 保 险 A—OK 1975 年 4 月 14 日

在社会 保 险系统成立已将近 40 周年之际，一次彻底的检查已安排就绪。为老年人退休养老设置的社会 保 险系统从 1937 年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开设至今，已经历了 38 年的时间。人们担心社会 保 险系统实际上是很不健全的；更糟的是，人们担心将来它会破产，不能支付给人们非常需要的而且有权得到的养老金。

我们仅有两个独立的审计单位。一个由 13 人社会 保 险咨询委员会主持，它由公众代表、劳工代表、管理人员代表和自营人员代表组成。主席由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列担任。委员会包括各方的头面人物，似乎略偏保守。

另一个审计单位由社会 保 险金融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

会是根据 1974 年的参议院决议任命的，其任务是“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地位提供独立的专家分析意见”。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威廉·C·L·肖任主席，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保险统计专家。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包括另外三位保险统计员和另外二位经济学家。如果这些保险统计员具有与我们经济学家相当的名声，既优秀又有公正的思想，那么肖的委员会就会增强人们的信心，并且它的那些颇具价值的观点是对瓦列委员会关于社会保险系统检查的补充。

健康清单

临床检查的结果是好的。社会保险系统这个病人情况尚佳，其寿命可以按世纪为单位计算。两个权威组织都赞同这样的诊断。

可以肯定，社会保险系统是存在着一些小毛病，就像千里之堤的蚁穴，若不加注意，就会不断扩大，构成危险。为了保护自已免受通货膨胀的打击，退休人员应将他们的养老金指数化。这一方案是合适的。但是尚未退休人员的薪金计算方法是存在缺陷的，而且在连续几年通货膨胀后这会导致既沉重又不公正的利润成本。正如医治一个小毛病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一样，修正退休前指数化的计算方法也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两个委员会都建议应立即关注这一问题。

社会保险系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考虑资金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现在出生率下降，退休后寿命延长这些事实以及经济中的生产率趋势和平均通货膨胀周期等因素。通过对这些事实和因素作出最合理的推测，人们发现，我们现在所作的有关税收改革和税收收益的时间安排，到 80 年代末有耗尽

为社会保险设置的所谓信用基金的危险。这一发现中并无什么新的东西，专家们对此熟悉已有好几年了。然而，肖委员会估计，在50年中，这一计划的费用相对工资总额来说会从现在的10%增至20%。这一估计比瓦列委员会的估计更合乎实际些，也是对官方预计的一个相当大的修正。

需要进行的改进

要使保险系统康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现阶段并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做的，但是这两个委员会都相信最好是现在就计划增加税收。

瓦列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值得注意，虽有分歧但仍反映了这一并不激进的组织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该建议认为，应该利用财政部的一般性税收收入，而不要继续完全依赖未来养老金领取者现在的工资税收。这是一个大胆的观点，经考虑，我赞同这一观点。重要的是原则。委员会的具体建议，即关于全体公民应承担医疗保险的负担的建议，倒不是很关键的。

现在，我们的保险制度非驴非马，但并非不伦不类。它不像私人保险，它是一种社会保险。工人交的保险费不足以完全支付未来的保险费用。然而仍然有必要坚持这一原则，即未来的收益与现在的收入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每一个获得收益的人都认为他们有权享受这一收益。

要使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继续运转良好，就需要加以经常性的改进。最终我们会有一个健全的保险系统。在此之前，我祈求有一个能比较公平地对待妇女的改进措施。

养老金筹集 1978年4月4日

不幸的是，对工会养老基金的处置并不总是明智的、可信的。这已成为老生常谈。今天，卡车司机工会的法朗克·弗兹孟重蹈他的前任吉米·霍法和大卫·贝克的覆辙。

同样不幸的是，长期以来，许多公司养老基金没有能够得到最佳利用。除了赤裸裸的欺骗与失信，公司破产时往往不履行对工人的义务，使他们在退休后领不到养老金，只能领到一点可怜的社会保险金。

当听到人们在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险法案的新规定怨声载道时，我想起了旧系统所存在的流弊。由于刚开始的那种歇斯底里已经消失，所以我们不再听到许多关于雇主因害怕官样文章而在别人劝告下取消养老金计划的事例。

在如今这个时代，胡乱使用养老金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一个机构，若想得到良好的、谨慎的管理，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在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上，虽然人们能决定明智的程序，但谁也不能担保一定有幸运的投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上，管理得如何也许是一回事。例如，就在上星期，纽约市的几种养老基金退过将它们的一部分资产转化为“指数”基金而对其证券业务进行了改革。

老办法

对养老金的管理不总是如此方便的。从历史上看，由于一些无法控制的原因，工会在养老金管理方面搞得焦头烂额。

行业工会通常是始于19世纪的互助协作组织。活着的工人要为支付死去的工人的安葬费以及到这退休年龄的工人的

最低生活费用而交纳会费。这种义务性质的筹措基金方法看来是办不到的。然而只要这种行业工会不断扩大，这也无关紧要。但是当工业界不再需要新的玻璃吹气工，或者当新工人为了避开不断增加的义务而离开互助组织时，这些自愿形成的系统就会因此而崩溃。

我在一所罗马天主教的小学院举行讲座时，发现许多修士也同样面临一个类似我们今天的危机。一个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修女告诉我，由于她的寺院不能再招募新成员，她的老年生活费用来源就会成问题。“为什么不依靠社会保险呢？”我天真地问道。她的回答令人伤感，“那需要先付100美元才能获得，而我现在正缺钱呢。”

当代陷阱

我应再加上一句，我们的社会保险系统也是一个未备基金的保险统计系统。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进入还是退出保险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幸运的是不存在那样的危险。这代人仍然抚育着数目与前几代人相同的孩子。因此，当出生于50年代生育高峰时的孩子在下一世纪到达退休年龄时，他们的退休金对于那时较少数目的在职人员来说将是一个更重的负担。

此外，工会养老基金还面临着两个危险。第一，总是有一些人——雇主、被围攻的城市财务主管、梦想“工人资本主义”的友好的国会议员或者虑及工厂不能破产的地方谈判代表——倡议养老金应投资于工人自己的行业、企业或城市。有时，这样的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不过，这种违背风险分散原则的做法对老年工人来说代价高昂，但这也不是罕见的。雇

员退休收入保险法案对这类业务规定了适当的限制。

第二，那些有良好愿望的工会领导往往将委托他们管理使用的资金投入到的有益的事业中去：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建房项目、资本—发展银行、环境保护等。其动机是好的，然而当你一心一意去追求这一目标时，要想保住或增加资本存量是相当困难的。既想为上帝服务又想为贪财之神效劳是极其困难的。

什么是好的管理呢？实践经验与理论经济学都表明有下列一些简单的基本原则。

以最低限度的周转率与放款费用配额来分散持有股票与债券——这是一条金科玉律。

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坚持这样做呢？

不幸的一代 1977年10月10日

民主有其自身特殊的行为模式。国会对能源问题会花上一年的时间进行毫无结果的辩论。然而或许在某一天的下午，当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正在观看球赛时，国会可能废除退休年龄为65岁这一日后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律。

我们是坐等获利的一代。财富从穷人那儿向富人这儿转移：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现在，30岁年龄组的人值得我们同情。因为，这一年龄组人口的剧增是战后生育高峰的产物。在那个时期，青年人在郊外尽性娱乐，如痴如醉，接着就是生儿育女，一生就是三四个甚至五个。

1947年，幼儿园的数目相对于当年出生的婴儿人数而言

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他们此后在校期间的命运也将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学院的竞争是极为激烈的。

等到他们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各种最不仁慈的削减又在等着他们。理由有二：

相互竞争的求业者

1. 他们人数的绝对数目需要他们为相对少量的工资而互相竞争。与我这一代或年青一代人的工资相比，社会保险的工资数据表明，他们的工资收入被压得很低。

2. 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喜欢道丽斯·黛的形象，而去仿效玛丽·泰勒·摩尔，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为求得终身职业而竞争，只是在生育一二个孩子时才会暂时中断工作。这些事实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是很明显的，即在就业更替水平下将集聚更多的潜在性失业人口。另一同样明显的事实是，正当妇女强烈要求结束在工资与就业机会上的歧视与不平等时，老板可在她们的无数姐妹中挑拨离间，从中渔利。

当意大利人充塞了瑞士的低级职位时，当墨西哥人在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干脏活时，他们所拿的并不是中产阶级名流们所享受的工资。相反，瑞士的合宪公民过着古希腊雅典自由民般的、以奴隶劳动力为根基的美好生活。

在社会保险数据中，人们能看到40年代后期出生的那些人的父母干得比较出色，白人男子尤其如此。随着年龄的增如，他们的收入与地位也会自动地得以提高。现在，多亏了国会，一个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或者耶鲁大学的教授可以在所享受的最高工资待遇条件下推迟5年退休。

由于在校人口的增长速度已下降下来，那么怎样才能使

这一篡夺最佳就业职位的现象能起到帮助而不是限制年轻人选择就业机会的作用呢？如果将过去平均 30 年的工作年限延长若干年，在新的稳定状态下，每代人中间至少有 10% 的人不能希望得到这样的就业空缺。在今后 5 年中，就业更替的机会实际上将降至零。

晦 气

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不公平的吗？就像有的哲人所观察到的：谁说生活是公平的？此外，如果我们这一代已经剥削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他们不能寄希望于在以后很长的时期内牺牲他们下一代的利益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呢？

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玛丽·泰勒·摩尔这一代人将只会有很少数目的孩子，所以当他们将近 70 岁时，他们实际上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不管是由社会保险还是由自愿养老金安排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届时，他们的生活标准将不得不取决于我们那些为数不足的孙子辈们所生产出来的财富的多寡。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查阅了哈佛人口研究中心关于美国未来人口的最新研究报告。1975 年，每个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 6 个年龄在 15 岁至 64 岁的青壮年人来支撑他们的生活。今后这一比例将会缩小。到 2025 年，将减至 4 个这样的工人。

得到的教训并不是要我们建立一个严格的年龄限制条件去公平地分配有限的就业机会。假如现代医学赐予人们更长的健康寿命，并且假如我们也想工作赚钱的话，这一系统的运行基础是，这一选择不会夺取他人的就业机会。在处理工资

率上的更加灵活变通——给予年纪很轻的人和老年人以较低的工资——将是朝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

社会保险纳税 1978年4月17日

去年国会提高了所得税的税率，认为有必要将社会保险放在有偿付能力的金融基础之上。当今，不少人强烈要求减税，以减轻企业与工人的负担。

讨论之中的许多改革建议的是非曲直是什么呢？这个系统会崩溃吗？“统计保险的可靠性”这个概念在社会保险的领域内应起什么作用呢？一般的税收收入是否应起一定的作用？

让我们从一些基本点着手。基本经济问题与我们是否保持拥有政府证券的储备金毫无关系，这些证券的利息和本金可以在将来取出，作为早先承诺的福利资金。

基本问题是，到本世纪末，这一系统将支撑更多需要养老金、残废补偿、医疗保障的老年人。问题是要多少年龄在20岁至70岁正当盛年的工人被迫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赡养这些老年人。

由此看来，显然我们中的一些正当中年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们这代人制造了1940——1960年的生育高峰。在我们退休时，在我们的儿女中间将有许多纳税工人。除非这一系统陷入低效率、挥霍无度的状态，否则不管是从工资单还是以一般收入形式从公司与个人头上征税。筹集这些资金的征税税率，公众是可以承受的。

面临的困难

生育高峰时出生的那代人将会面临着困难。如果要继续

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即早早结婚并为最起码的人口更替而抚育两个以上的孩子，那么在早期阶段会再次出现连锁形式的增长。

然而，不会再有这种可能。至少自 1957 年以来，在人口统计中反映出一种转向出生率急剧下降的趋势。

现在，人们的结婚年龄在推迟。更多的妇女终生在外工作。最终，家庭的规模正在缩小。因为越来越多的妻子推迟到 30 岁以后才生第一个孩子，更多的家庭则在尚未达到目标时就已解体了。

因此，展望 21 世纪，我们看到在职的年轻人将肩负起更重的赡养老年人的负担。

然而，1977 年就没有出生率上升的一丝希望吗？时尚的变化使得姑娘的裙子忽长忽短，在人类生儿育女的领域，时尚就不会发生变化吗？

我所交谈过的大多数人口专家都怀疑，1977 年出生率的上升会意味着一个长期的、有意义的恢复。他们指出，这一出生率的上升主要只是反映了 20—30 岁这代人人口膨胀的事实，即这一生育率的上升是从过去生育高峰承继下来的暂时性现象。然而，在这一上升的出生率中也确实有真实的增长成分，可能是那些长期以来推迟生育的妇女们觉得现在是她们生育的最后机会的缘故。不管什么原因，我们仍然处在更替水平以下，并且尚未有迹象表明将会恢复到更替水平之上。

从现在开始准备

现在的争论几乎没有触及这些基本点，这本身就是引人

争论的问题。今年有比明年更多的企业处在危机之中。

如果未来的几代人必须为生产者与老年被赡养者之间较低的比例而作打算的话，那么我们是否现在就应当提高税收以使公众习惯于忍受更高的税收？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想法是，这好像是我在拍打绳圈以帮助我的孙子辈们在将来所面临的“拳击赛”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经考虑，经济学家认识到 1978 年的这代人能以现在较少的消费来帮助 2018 年的一代人，旨在使今天更多的资源能以形成资本，这样到 2018 年就会有更多更好的工厂、设备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劳动生产率以赡养那时的老年人。

为了将这一点与社会保险税联系在一起，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在忍受较高的税收（是从工资单中还是从收入中征收，这无关紧要）。如果这会使需求减少至足以使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以利于所有的资源从消费交易转移至资本形成中去，那么在原则上我们准备用这一代人的钱去帮助下一代人。

老年经济学 1981年3月31日

这个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建议我们为保护自己的胰脏而戒掉喝咖啡的习惯。早先，我知道在从咖啡中摄取咖啡碱的过程中也许会留下致癌物。作为一个关注社会保险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我一直在思考去年 7 月份斯坦福医学中心的詹姆斯·F·弗瑞斯博士的论文，题为《老化、自然死亡以及发病率的下降》。弗瑞斯企图使我们摄作起来。他的论文颇富戏剧性。我将他的论文意释如下：

单驾马车

荷伯斯说,在过去,生命一向是短暂而野蛮的;而弗瑞斯认为,人的生命不会陷入无限延长至不尽人情的危险境地。科学不能保证在85岁之后我们仍然能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的年龄极限时,我们的细胞就会自行毁灭,而且和过去相比,这一年年龄极限并没有延长。

高加索人和安底斯人在百岁之后仍一直活着的神话是基于缺乏充足的出生登记纪录的缘故。而在出生登记纪录被保存下来并为科学家注意到的地方,现在仍健在的人中寿命最长的只有114岁。

从考虑社会保险负担问题的保险统计员的观点出发,这是一条好消息。弗瑞斯的第二个发现也是好消息。

即使85岁是一般人的寿命截止点,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活到88岁。而且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很良好。

“父亲精神良好地活了85岁,尔后安祥地去世(或者最后只因一些小病死去)。”人类寿命达到弗瑞斯预见的生命矩形表所示的水平时,这将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生命矩形表”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所有100个出生于1981年的人都活到2066年,而且所有的人都在85岁生日的那天死去。这样,表示100个人中有多少人活到每一年龄的曲线是一条直至85岁这一年龄的水平直线,这条直线在85岁这一点骤降至零,就像一个匣子或一个矩形的一条边。当然,这只是一种极端情形,是我们正在向此靠拢的一种情形。

你是否记得奥利佛·温德尔·荷梅斯诗中奇妙的单驾马车呢?它的各个部位都非常平衡,100年后所有的部件在同一

时刻散入泥地。民意测验表明了我们所有的人是怎样等待死亡的：突然地、没有警告地、在蒙受天恩下死去。

在我对弗瑞斯的论文所作的描述中，有一个关于经济学的真理。我们不会成为玛士撒拉，能无限期地活在世上，这样自己感到不舒服，还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然而，医生会在黑暗中轻声道出乐观的诊断：感冒也许不会再持续下去。当代表生存概率的生命表越来越接近矩形时，代价高昂而郁闷的寿命年限正在不断地延长而不是缩短。

要证实这一不加渲染的事实，你们可以就近巡视一下家庭护理的情况。通过抗菌素、抗高血压、静脉注射以及其他紧急救护手段，其中一些人——据他们自称是些不幸的人——的寿命最终被延长至90多岁。当保险统计员用显微镜察看死亡的力量（每天死去的风险）在85岁和85岁以后的变化情况时，他们并没有发现死亡的力量间断加剧的神奇的时刻。荷梅斯单驾马车的例子仅是一个过于富有戏剧性的隐喻。

过早退休

我的第二个观点就陈述至此。弗瑞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

鼓励并迫使人们在65岁甚至更早一点时间就退休是没有意义的。

对妇女，这样做就更没有意义。从统计的观点来看，一个70岁的妇女比她的67岁的兄弟离死亡更远。相对而言，她的手指比较灵活，头脑也比较清楚。而且保险统计员还警告我们，在死亡之前她需要照顾的时间更长。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德国的小说家，他将人看作是同样年龄的人，不是假设他们在同一时刻出生而是假设他们在同一时刻死亡。我们应该以这一观点为基础来制定一个合理的终生计划，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险系统。

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划鼓励人们早点退休，这是一件丑事。通常，一个老人在他新增的收入中只能获得其中的35%，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工作呢？

事实上，像55岁和60岁年龄的人在过去都仍然是劳动力。现在的人口普查表明，已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在这个年龄就已退休了。

应该使国会注意到弗瑞斯的发现。而且70高龄的罗纳德·里根意识到钟声为他鸣响——正像为我们所有的人鸣响一样。

5

促进国内外经济繁荣的线索

在国际经济学方面，萨缪尔逊是一个正统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新古典派原封不动地承袭了亚当·斯密的比较利益原则。在前面的章节中，萨缪尔逊建议政府不要支持病态的克莱斯勒公司。但如果民主过程决意干涉，他很乐意讨论关于对其支持的条件问题。萨缪尔逊坚决反对关税保护。这里，并没有自相矛盾。市场所给的报酬可以在国内调节。但我们必须面对国内与国际生产率相比较的问题，这是不灭的真理。

萨缪尔逊概述了浮动汇率制产生的原因。首先，自1971年以来，浮动汇率使美国能够根据世界变化情况及不断上升的油价，以最少的痛苦来调节国内经济。其次，它使一个国家能无需顾及进出口收支状况而制定合适的国内政策。如果进口超过出口，美元将贬值，从而降低外国商品对美国公民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增加美国商品对外国人的吸引力。第三，美元的供求力量对确定其与国家目标相一致的合适的汇率是最有力的。最后，萨缪尔

逊驳斥了关于在自由世界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通货其价值应稳定不变的说法。萨缪尔逊指出，政治力量与强货币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

文化传统中留传下来的勤奋和节俭的美德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萨缪尔逊指出，为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一个社会可以在承担忽视其他价值观念的风险的前提下作出选择。有人认为，制定更加完善的产权制度，或者政府对私营工商企业采取不干涉政策，或两者并行，必将导致或维持繁荣。对此，萨缪尔逊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假如普遍让渡财产所有权，民粹党民主会毁掉经济增长。

在这一章里，读者可以从下面三点去看萨缪尔逊。首先，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他清楚在长时期内平均消费水平是不可能高出生产率水平的。在政治领域，他懂得政治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致是极其脆弱的。其次，作为政府和家庭事务的顾问，他在集中精力注意长期生存和健康发展问题时，往往采用谨慎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做出选择。最后，他注意到了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国家制度和国家大量财富变动的问题。

自由贸易

钢铁政策 1968年2月26日

钢铁工业正在发起一场强有力的保护性限额运动，以对付国外具有竞争力的钢材进口。去年，他们一直在要求国会通过征收“临时性关税”的法案。不过，他们深知，在对竞争实行

保护的要求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临时性”的政策,而且,一旦你要求国家为了你的利益面对进口进行干预,你就等于放弃了信奉自由经营的原则,因此,钢铁工业现在已和纺织业、玻璃制造业和石油工业一起,为对进口实行数量限制而进行院外活动。

让我先来说明一下钢铁工业的情况,然后再对其作出评价。

正反两方面的主张

1. 从欧洲及日本进口的钢材数量一直在加速上升。而过去一直居世界前列的我国的钢材出口,却在迅速减少。

2. 根据美国钢铁协会(即该行业的代言人)的看法,这种趋势将会延续至将来。到1975年,钢材进口将占整个钢材市场的20%,而不是12%。这些增加的进口将使约60000名钢铁工人失业。

3. 我们的市场被进口“侵入”的主要原因是:尽管按照钢材厂及钢铁设备厂每人每小时的工作量来衡量,美国的钢铁工业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但是,我们比国外高出的生产效率仍然没有超过美国工业必须付出的货币工资与国外所付货币工资之间的差额。根据罗杰·勃洛夫的观点,美国钢材公司每天必须付出40美元才能从其他行业吸引工人;而日本的钢铁企业仅需付出相当于一天10美元的工资就行了。我们的工厂效率更高,不过并没有比国外高出4倍,也不可能做到这点。

4. 为了国防和国家的需要,我们的国内工业应受保护。引用勃洛夫先生的话:“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需要的1/4或更多的钢材是从那些提心吊胆地与苏联和中国为邻的国家进

口的话，我们能够对我们现代国防所需的强大的钢铁工业基础放心吗？”

5. 目前，世界钢材的生产能力过剩。钢材堆放着要比在国内出售花费的成本低。没有哪个国家允许普遍实行钢材自由贸易，为什么我们倒要这样做呢？

6 将钢材进口限制在过去3年的百分比(约10%)水平上，将会改善我们今后的进出口收支状况。而这种状况确实是需要加以改善了。

下面是经济学家们的回答。

如果我们购进的货物所含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在国际贸易中我们就会获利。当某一行业在效率方面高出国外的平均比例比不上在货币工资方面高出的比例时，我们在该行业就缺乏比较利益。让这样的工业萎缩，我们可以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钢铁工业自己承认缺乏比较利益。正像只要美国钢铁公司不能生产出便宜的动力就向外购买一样，美国应当在最低成本市场上购得它所需的钢材。通过这种途径，我们能够拥有最丰富的钢制品，而且，我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会达到最高。

如果钢铁企业的院外活动集团说：“对钢材进口加以限额控制，他们将会以相同数额的美元侵犯美国在其他方面对外出口的利益。”那么，没有一个有知识的国会议员会听他们的保护恳求(自然，这里不包括来自加雷及匹茨堡的国会议员)。

判决：不应保护

美国的外贸顺差每年仍然有数十亿美元。这表明其他工业确实具有钢铁工业所没有的比较利益。说真的，远离我们

本土的冷战及我们对外援助的需求是如此之大——尤其是这种需求还要加上我们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要求——因而，我们私有企业的贸易顺差对于这些需求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关税、限额和直接控制能暂时弥补这一缺口。然而，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钢铁工业没有特殊理由要求得到贸易保护。而且，我们要记住，限额是保护的最有害形式，比关税更糟。

从国防方面看，钢材必须与商船一样需要补贴，一旦这种时候到来，它将很难与国有企业区分开。这个日子仍然遥远。

新关税造成的威胁 1980年8月11日

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潜伏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在其他国家，情况可以说也同样如此。除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外，法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也总是不断想建立限制进口的关税壁垒或实行进口配额，或在正规的立法范围之外对贸易设置官僚障碍，并在商业活动中对外国人制造的商品采取歧视的态度。

现代各国总是与他们自身的卑劣本性作斗争。我们所有的人 口头上都主张自由贸易。国家领导人时常举行最高级会谈，宣布断的削减关税和缩小限额的范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代表着官方为推动国际贸易向更自由方向发展而共同努力的潮流。关贸总协定的办公机构设在日内瓦，其宗旨是推进自由贸易这个崇高的事业。

是自由贸易吗？

在20世纪后半叶，国际商业活动已经普遍趋于自由化，

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世界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世界实际产量的增长。关于这一点，人们一直谈论得很多，这是因为世界实际产量的增长再也无法维持像 50 年代和 60 年代那样的模式及发展速度。与亚当·斯密以前的重商主义时代及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两次战争中间的一段时间相比，现在的国际贸易确实算得上是自由的了。

被认为是好辩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普遍赞同下述观点：如果根据各个国家的比较利益实行专业分工和交换，社会必定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普遍受益。这是一个大体上看来已经被以往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所证实的教科书原理。

一个国家依靠堵绝国外进口的办法成功地提高它的生产率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这样的事例是很难找得到的。相反，通过进口和出口使国家得到迅速发展的例子却举不胜举。如 19 世纪的英国，摆脱封建主义、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德国和日本。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杰迪什·勃哈瓦地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妮·O·克劳埃格为国家经济研究局作了一项研究。他们从可得到的事实中推断出：增加出口的制度比进口保护制度更能使经济发展取得成功。

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扩大出口的过程中是如此成功，因而，人们有时称它们为“四人帮”。在这几个地方及马来西亚、菲律宾，制造业生产指数上升很快。而另一方面，西欧、北美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和就业却普遍衰弱。尽管瑞士和联邦德国的统计资料表明，自 1973 年的高潮以来，相对来说我们做得比他们要好些，但是，美国当然不可能不受制造业竞争的影响。

自 50 年代以来，钢铁工业的领导人一直在争吵着要求保

护。日本和联邦德国汽车公司的侵入已经将底特律那些主张彻底的自由贸易的人转变为争取对他们的市场加以保护的院外活动分子。道格拉斯·弗雷泽，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最终还是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认输了。

坚持到底

目前的衰退会扩大保护主义者的政治影响。那些由于进口竞争而失业的工人不可能立即找到别的工作。

目前是否存在适于实行保护的经济形势？明智的进口限额能否逆转我们实际收入的恶化趋势？

不可能。一旦我们决意不再要华盛顿有意制造出来的衰退，我们知道，采取减税和放宽信贷的办法能够结束这种局面。经济学家们并不倾向于依靠实行关税来创造美国的就业机会，而是喜欢让美元上下浮动来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能力。

在实际工资水平超过我们生产率所能支持的水平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做到为所有的就业提供保证。

汇 兑 率

黄 金 1974年7月8日

国会和总统准许美国人再次合法持有黄金的时刻正在到来。从经济学——就业、收入、利率、通货膨胀、终生储蓄——的观点来看，黄金没有一丝一毫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和凯恩斯在一件事上的观点是能够达成一致的，那就是黄金对人类灵魂具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当时剥夺黄金持有权的法令是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促成并经最高法院确认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常常会因在他们出生以前对他们权利的强行剥夺气得发抖。

金本位作为自动决定全世界货币供应及物价水平的办法已经成为历史。即使是在最佳情况下，金本位也远不是一种完美的体系。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间，当工资与物价能上下灵活变动时，金本位制才是运行良好的。

上升还是下降？

允许美国人持有黄金将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会在黄金价格方面导致很大的波动？是否会使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300美元，也就是大约目前自由市场价格的两倍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已定死的每盎司42.22美元的官方价格的好几倍？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批新的黄金主顾的出现可能会抬高黄金的市场价格。不过，几乎同时，官方金库可能会把作为新的补充的黄金一齐抛到市场上来，或者像今天的意大利那样，采取典当手头所有流动资产来支付石油债务的办法。这样，将造成黄金价格的下跌。

另外，华尔街有句老话，叫做：“听信谣言买进，得到消息出手。”全世界的投机商对此时华盛顿的风势走向都很清楚，而且有很多人事先一直低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公民持有黄金合法化这件事。因此，黄金迷一直盼望的价格猛涨可能是短命的，或者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

谁会关心这个问题？南非会。南非是黄金的最大产地，并

且它的矿产品是它出口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

苏联也会关心此事。苏联的黄金储藏居世界第二位。去年，它以超过每盎司 100 美元的价格做了一笔黄金买卖，这笔买卖确实为它的人民的温饱起了点作用，并为进口它长期工业发展所需的技术设备筹措了资金。

除这些国家以外，黄金是不重要的。因此，对加拿大和美国西部而言，说黄金是花生米已经是夸大了它的重要性。毕竟，花生决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农作物。

黄金贮藏家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大部分人是想冒险获取资本收益。然西，在最近两年中，每当有两个人在金币、金条或在南非金矿股票上获利，就会有十个人在最近十多年的黄金投机中所遭受的收益及价格方面的损失得不到补偿。

钱币商人在这场冒险中下了个赌注。我无法理解，一个有能力行医的人竟会蠢到多付 14% 或更多的钱从在金融报刊上登广告的商人手中购买价值数千美元的银条。他们几乎不付任何佣金，就能从纽约和芝加哥有组织的期货交易中得到银条或银币。不过，没有哪个傻瓜比得上既担惊受怕又贪得无厌的蠢货。不单单是医生在浪费金钱。就连一些最出色的银行家最近也上当受骗，成为报界的头条新闻。

政府的蠢行

在自由国家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失去他的金钱。不过，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政府没有必要惊慌失措。我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成员国，不要因想加强和保持官方黄金储备的清偿价值而采用官方保证维持黄金价格于目前市场

价格范围内的方式，来创造新的黄金需求。

这一点可别弄错。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每盎司140—160美元范围内的官方黄金价格，那么，就不会结束黄金投机和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状态。黄金迷很可能会哄抬黄金价格使之高出任何官方价格水平，然后，他们会以要求更高的官方价格为理由而将黄金价格指向更高值。

黄金和美元 1977年10月31日

美国的进口额超过其出口额的消息，月月都在传来。看来，这种状况不会结束。专家们预测，1978年我们的经常国际收支逆差仍将是巨大的。现在是不是到了该稳住美元汇率，为世界性灾难到来时捉摸不定的情景而忧虑，加入到黄金迷行列中去的时刻了？

美元浮动会带来其他后果。日元相对美元向上浮动达到了使日本人感到不舒服的程度。丰田和本田汽车比起福特和雪佛莱汽车来说，变得更加昂贵。甚至购买一辆美国人造的汽车也开始有意义了。

瑞士在金融吃紧时时常会成为一个招引不稳定货币的安全港。而货币的流入往往会抬高瑞士法郎的比价。传统的瑞士表很久以前就已经变得过于昂贵以至很多人都无力购买，瑞士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也由此遭到了沉重打击。

联邦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仍然非常坚挺。更出人意料的奇迹是，由于北海石油的恩赐及预计差额的逆转，英镑也在升值。英国的净储备一直在上升并达到零点，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改善。

混乱的逆流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比大部分国家低，而且，与周围国家相比，美元不是最疲软的货币。加拿大元更加疲弱。这没什么奇怪，加尔布雷思主义者的价格—工资控制并没能成功地控制那儿的通货膨胀。魁北克威胁说要脱离加拿大。那些到过许多国家的资本家认为，加拿大的投资环境是最差的。那儿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

瑞典的奇迹也许已经结束。用来抵消巨额工资增长的显著的生产率进步已经走到了尽头。瑞典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在绝望中，工党政府的后继者摆脱了马克的束缚，并在一夜之间将克朗贬值 10%。

这些国际事件引起了有产者们的恐惧。而一旦有疑虑，老年人往往会把兴趣转向黄金。年轻人则信奉“更为愚蠢的”理论，在黄金期货市场上冒险行事，希望靠黄金价格的上涨捞取钱财。一时，全部行动变成了一个自我完成的预言。那些在摆脱敌手方面最机灵的人很可能率先退出这种冒险。

1974 年 12 月 31 日，也就是美国人开始合法持有黄金的那一天，黄金价格达到了每盎司 200 美元的最高点。到 1976 年秋季，黄金价格几乎下降了一半。自从那次跌入谷底以来，价格回升很慢。最近黄金价格又大大上涨，超过了每盎司 160 美元。

黄金迷又回到市场。他们会为半张纸的广告筹措资金。一个即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有关黄金的集会将会像是一个家族的联欢会。

消息灵通、关心国事的市民及政治家应从中了解些什么？这些事对经济繁荣及失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华尔街应密切

注意哪些动向？

重要的问题

为了有助于思考这些重要问题，让我们先从不重要的问题着手。黄金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黄金价格是否会上升，南非政局是否会发生动荡——这些问题仅仅对那些拚命想靠抬高黄金价格获利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

亚当·斯密和查尔斯·戴高乐已经成为故人。没有一个学识渊博的观察家会认为世界会回到金本位时代或回到类似于修正了的布雷顿森林制度。黄金价格的螺旋上升是目前金融业所发生着的事件的症状，而不是这些事件的原因。

坦率地讲，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曼瑟接受美元向下浮动是正确的。我们的复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美国和世界的粮食收成非常之好，而且我们的石油定价有利于消耗中东的石油储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因此，是经济规律支撑了马克和日元的升值。

德国和日本社会正在为它们不景气的经济付出可怕的代价，一旦它们的经济开始复苏——这是很可能的，我们的贸易逆差将会得到改善。提高美元比价的毫无成效的努力只会浪费储备，增加钢铁工人失业，并推迟达到平衡。

我们应当慎重地分配我们有限的精力去处理使我们深感忧虑的事务。让我们在美元浮动问题上节省一点脑力，而更多地去关心引起美元浮动的缘由。

美元本位制 1978年1月23日

现在，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元正处

于困境之中，而且美元汇率疲软正预示着某种不祥之事的发
生——这些事情将不是发生在丹麦，而是发生在美国。

尽管普遍存在的印象可能是非常错误的，但有时到最后
却是正确的。所以，我希望再深入探讨一下使那些明智的人
对我们浮动的美元出现疲软表示担忧的那种情况。

对美元疲软，我们眼下应采取行动吗？是不是应该采用抛
售马克、日元、英镑和其他外币的办法来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以
支撑美元？

接替亚瑟·伯恩斯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 G·威廉·
米勒是否应当全力以赴向通货膨胀开战？是否应当停止抑制
利率上升？甚或促其进一步升高？卡特政府是否应当降低1978
年的增长目标？

我们敦促德国和日本采取行动加快复苏步伐，这样做，错
了没有？我们是否应当听取别人的劝告，将美国经济推向德国
式的萧条？要防止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维护美国繁荣，我们是
否需要依靠这种大转变？

我们认识到：（1）美国在自由世界有其特殊的责任；（2）
美元是国际交换及持有的一种关键性货币，如果有必要，我们
是否应当有所准备，为维护世界秩序而牺牲某些经济福利？

历史的教训

我相信，对事实和可能性进行周密的分析，将会证实，对
以上那些有争议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而不是肯定的。理由如
下：

首先，“彻底浮动”政策（即政府忽略“良性”或“恶性”）不
是民主党的政策，也不是卡特或迈克尔·布鲁曼瑟的创新。这

项政策是由里查德·尼克松的财政部长乔治·舒尔兹首先提出并坚决主张的。也是为 80% 的经济学家——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沃尔顿·海勒所赞赏的。最近两年多汇率涨落的经验还没有使他们放弃原来观点而转向固定汇率。

第二，将“伟大国家”与“强货币”等同起来是对历史的一种幼稚的误解。丘吉尔在 1925 年仍然将英镑维持在 1914 年以前的比价水平上，然而他并没有恢复大英帝国的统治，相反，就相应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而言，他的这一行动等于在棺材上又钉上了一根钉。在 1939 年以前，法国固守金本位，结果它的经济和社会都为此付出了骇人的代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史学家们发现，这样做毫无目的。

第三，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的形势发展已经证实，如果仅仅让卡特宣布美国将会对浮动美元进行干预并使联邦储备委员会按此办理，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在今后几年中，甚至在不存在美元贬值危险的情况下，由于更多的外国人想在我国投资，我们的进口很可能会超过出口。如果真是这样，试图将美元汇率固定在一个不现实的高度就是愚蠢的做法！

目前的危险

欧洲的守护神们还没有幼稚到对此毫无觉察的地步。目前，他们正在表露出他们一直希望美国走的下一步，即要我们强力实行高利率，推行反通货膨胀、放慢经济增长的政策，采取所有钉在历史金本位制的十字架上的国家都会采取的“保护本国货币”的一切措施。多少专制和蠢事就是在这样的名目下产生出来的！

卡特总统一直试图从由美元疲弱造成的普遍恐慌中得到

某种利益。为使全体选民对能源浪费尽快采取行动，实际上，他在说：

“你们是否想要一个更好的股票市场，更为坚挺的货币以及世界主要产品的更低价格？你们是否想避开这场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为维护美元而采取的冒险措施所带来的货币危机？如果你们想的话，那就得通过我的能源计划。”如果这一着成功，那很好。首先我们自己不要歇斯底里。

对银行家们，我要说的是，他们应当对自由贸易树立某种信心。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我要说的是，为支撑美元而采取的反投机措施，只有在能使其赚钱而不是浪费钱的时候才可以实行。对国家来说，我以为没有必要仅仅为了满足美元汇率稳定这样一种虚荣心而去制造一场衰退。

维护浮动汇率制 1978年3月27日

最近，一位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悲凉的话：“听到那些知名人士、报刊及电视台评论员谈论经济事态，我为什么经常想哭？”

关于所谓的美元危机，我认为罗伯特·索洛的抱怨，其无知程度已经达到了极点。下面是一些证据：

在对事态进行一番研究之后，吉米·卡特最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使世界确信，美元下跌已经过度了。

在如何估价基本平衡价值方面，总统知道些什么？赫伯特·胡佛总统断言，1929年的崩溃使股票价格跌到了其固有价值之下。他对所说的话非常自信，就像1940年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真诚地鼓励人们将他们的积蓄轻率地投入到诸如美国储备公债那样的债券中去一样。

可以肯定，卡特先生有很强的后援力量。蔡斯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断言，美国的政策行动必定会有效地抵消已经使美元向下浮动的投机心理力量。哈里曼的布朗兄弟公司的罗伯特·V·罗素以前曾任主管涉外财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他像洛克菲勒博士一样，在经济学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罗素博士赞扬美国对美元稳定施行干预的一月声明是将我们和世界从“一种新的混乱冲突”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行动步骤。

一个开放的实例

大部分记者在写报道时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浮动汇率制已被公认为是一种灾难性的东西，只有对投机商来说是例外。我能向读者证实，从事国际贸易分析工作的专家几乎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美元相对联邦德国马克、日元和瑞士法郎仍然能以某种方式保持在去年那么高的比价水平上，那么，今天经济体系的境况会好一点。

那么，人们悲叹的是什么呢？如果卡特总统和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曼瑟给施密特总理和福田首相以出路的话，美国为稳定美元所进行的干预将会使今天多损失数百亿美元，而且在1978年将会发生一场由大幅度的汇兑比价调整所造成的危机。

要对我们犹豫不决的干涉给予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早应对货币供给强加限制，从而削弱建筑业和私人投资的复苏力量。可以推测，这样，生产将比现在更为低落。（尽管利润会更低，一些华尔街人士还是认为股票价格会由于美元坚挺而上涨。）

为损害美元浮动制而采取的任何干预措施都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现在的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而不是6%。

何人受益？

究竟是为了何种目的，我们要付出由限制所造成的这些代价呢？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通货膨胀吗？麻省理工学院的鲁迪奇·多恩布施教授所作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对浮动汇率进行干预，估计现在的价格水平会比目前的实际水平低1个百分点。到1980年，物价指数可能还会减少1个百分点。这对选民来说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如果我们听从德国人和瑞士人的劝告，他们的境况是否会好一点？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削减美国进口可能会导致全世界的复苏陷入软弱无力的困境，甚至使复苏停步不前。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西欧各国也不可能避免这场冲击。

我的观点不是说政府永远不应该对外贸市场进行干预。自由及个人的自主权不会因浮动制遭到损害而失去。实际上，为保护那些无法保护的东西而作的大部分干预是愚蠢的努力，那样做只能为狡猾的投机家提供便利。

我的看法是：我们还不清楚美元价值是否已经从根本上过低。况且，如任何图表将表明的那样，今年的交易市场已不再像1973年那样混乱不堪和反复无常了。

如果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如果美国的能源计划能限制我们的石油进口，美元在今后可能会向上浮动。认为现在美元汇率过低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请少动笔墨，多多思考，多多观察实际情况。

国际金融 1978年10月2日

凯恩斯勋爵过去常说，在经济领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公众观点，另一种是内部观点。

凯恩斯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是一个在学识方面很势利的老学究。很自然，他会通过与政府官员、企业银行家及经济专家内部圈子里的知识和观点相比较，低估那些未受专门教育的公众所持有的一般观点。

现在，情形不同了。在美元问题上，内部意见发生了分歧。如果对银行家及国外政府官员进行一次调查，我想，你将会得到类似于下面所讲的那些观点。

1. 美元对德国马克、日元和瑞士法郎的汇率下跌是一个灾难。

2. 卡特总统、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曼瑟和副国务卿理查德·N·库珀必须为他们不愿为维持美元汇率而采取干预措施一事承受对他们的责难。他们没有能够及时采取行动。尽管目前进行这种干预所付的代价会更大，美国还是应该去做它以前没能做成的事情。

3. 美元疲软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极度浪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引为自豪的1975年的复苏已经好过头了；这件事表明我们忽略了通货膨胀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国会在能源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只是和稀泥而已。

经济学家们的看法

在由5000名美国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上，我们对他们进行一次调查，以此作一个对照。或者，一种更好的办法是挑选

1000名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并听听他们的意见。3/4的人会坚持下面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另外，我相信，在西欧，如果同样对经济学家进行一次调查，也会有稍过半数的人持下面的观点。）

1. 美元向下浮动（或者说向上浮动）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它是否接近平衡。

2. 摆脱以旧布雷顿森林制度或软弱的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固定汇率的束缚的最大优点是：它允许每个国家追求其自身的经济目标。因此，在灵活的汇率下，德国人坚持不惜以短期萧条为代价来对付通货膨胀，那是他们的权利。于是，当美国的产出相对于他们来说是增长时，马克就应当上升，而美元应当下跌。如果日本的低成本给它带来了巨额出口顺差，那么，在我们进口逆差降低到可承受的水平之前，适宜的调整办法就是降低美元汇率。

3. 仍然有必要严明经济纪律。一个国家应当以民主形式，针对市场收入的私人分配问题，从费用—收益关系着手分析分摊社会负担和满足社会需求这两方面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国民生产总值中以税款方式征取国家认为从逻辑上来讲有必要花费的那部分资金，用于公共事业。国家还需要对如何在物价稳定和就业机会两大目标之间取得短期折衷这个问题作出决定。问题的关键是，一旦灵活汇率制度给每个国家以最大的自由权和自主权——这种自由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也可以被滥用——上述那些基本决策将成为国内的事务。

现行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年一度的会议，现在正

在华盛顿召开。这个会议提供了一个论坛。在那儿，上述几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将可以在公开场合及旅馆走道上展开争论，最后，必将以某种方式产生一种统一意见。

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走上永久性逆转之路。因此，必须提醒各位要谨防下面那种颇具诱惑力的假设，即认为美元早已跌落得如此厉害，因而可以很放心地设想它是一种贬值了的通货。现在采取不可知的态度仍然是妥当的。我们必须对卡特提出忠告：不要过早地同意采用大规模干预及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的办法来维持美元汇率。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米勒意识到，美国的复苏可能会在1979年转向一次微弱的衰退。我相信，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不会屈服于欧洲大陆银行家们的要求，也就是为对付通货膨胀及稳住目前的美元汇率我们应该有意引发一场衰退。随着1980年竞选的到来，这样一种走走停停的政策以后会引起民粹主义者的反应。

谁需要“新秩序”？ 1980年10月13日

对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人们的评价比对同类会议要高。不过，这次会议还是使那些拼命想寻找“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人士的希望再次落空了。

在当今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们已经习惯于失望。经济学家们是否应当为后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制度的根本改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感到遗憾？我想不必，而且，在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撇开了政治主张，在代表绝大多数的美国经济学家说话。

在讨论主题之前，让我先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精彩的辞职演讲表示敬意。他在出任世界银行总裁达13年之久以后即将离职。在他的演说辞中，他着重强调了一个与全球性贫困作斗争的行动主义者的政策，这甚至使那些不易激动的银行家与金融家都为之感动。而且，很显然，他的讲话使后而卡特总统缺乏色彩的演讲相形见绌。

黄 金

早在总统竞选前，候选人里根就因对把美国拉回到金本位制感兴趣而知名。有谣言说阿瑟·拉弗教授是里根的顾问。拉弗教授是“拉弗曲线”的首创者。他的理论对肯普—罗斯减税以及对减税将会带来更多的企业活力因而不会使国家税收减少的承诺提供了经济学基础。撇开这一点不谈，拉弗教授以偏好基于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而闻名。他一直在公开批评尼克松的浮动汇率政策，该政策最早是由前财政部长、拉弗旧时的良师乔治·舒尔茨提出来的。

9月中旬黄金价格的上涨，是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消息说，一些重要的中东欧佩克国家正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压力，迫使其让黄金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扮演一个更为显要的角色。而且，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畏缩不前，那些欧佩克国家就会单方面增加它们自身的黄金储备。不过，至今还未发生这类事情。

肯定会使黄金投机商更为失望的是，人们发现罗纳德·里根正推举阿伦·格林斯潘及乔治·舒尔茨为他的经济顾问，而摆脱像阿瑟·拉弗那样以贩卖供应经济学灵丹妙药为业的那种人。尽管两伊冲突尚未平息，黄金价格已经跌到最

近的最高水平之下。期货市场上货金价格的快速螺旋上升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金融市场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稳定下来的。

由于绝对不存在任何迹象表明世界将会回到 1914 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因此，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全部含义多半是一句口号，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则意味着旨在改善它们与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货物卡特尔协定。这几乎与法国人及其他稳定汇率的支持者头脑中的东西毫无共同之处。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目前的浮动汇率制和政府为减少汇率波动所进行的强有力干预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讲，就是必须在目前的体系和已经在 1971 年崩溃的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作出抉择。

为了确定这样一个选择，我们有必要求助于经济学原理及历史经验。依我的理解，经济学原理和历史经验所提供的依据都强烈否定固定汇率原理或者说固定汇率的可行性。

应该记取的是，金本位制的寿命向来很短。在每次危机中，金本位制总是要崩溃。

这是过去的历史经验。而最近的事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布雷顿森林制度命中注定是无法挽救也不值得挽救的。自 1959 年以来，美元价值一直过高。因此，对清醒的投机家来说，它是一只静候死亡的鸽子。当纸牌做的房子最终倒塌时，人们会感到安慰。

现在的制度并非杂乱无章，而是运行良好。真得感谢上帝——在这个时代，欧佩克的实际石油价格增加了 8 倍，并在

无形中造成了数千亿美元国际储备的重新流动——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灵活汇率制度。

当明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召开时，没有人再需要了解马克、日元和美元应如何估价。事实上没有人在做这件事，这真是一大幸事。

世界各地

富裕国家发生什么问题了？ 1971年9月

30年前，当卡内基基金会想委托进行一项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时，它挑选了瑞典的甘纳·迈荅尔，这样做恰恰是由于他不会受到有关这个题目以往知识的干扰。按照这个标准，我正好有资格对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是因为，我对那些国家现代生活的深刻潮流只有极肤浅的了解。

对美国当代趋势的了解很可能部分地弥补这种不足。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认为，所谓“欧洲的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最早富裕起来这个事实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在其达到很高收入水平情况下想干的事情结果与另外一个国家在同样情况下想干的事情非常相似。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像德·托克威尔那样带着异乡人的眼光来观察美国，这是一个优点。他能抛开欧洲人的偏见，观察到发展中的美国社会的新的特征。

1950年的瑞典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人们常常想用“中间道路”那种陈旧的、多少有点错误的说法来说明斯堪的

纳维亚国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调和，而“中间”这个双关语在这儿是指它的阶级内涵。贵族除了留下日益衰落的印记之外，已变得毫无价值，不仅如此，新增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实际上已进入中产阶级阶层。在这一点上，瑞典那时正在接近早已在美国占优势的那种状态。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盖洛普博士，他属于中产阶级。我认为，这种模式刚好与英国的情况相反，在那儿，狄斯累利^①的“两种国民”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工人阶级看来，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上夜校，想使自己生活得好些，并且想往上爬，是不友好的表现，这种真实的感觉往往与口音及学校背景交织在一起。而在任何美国人眼里，这种思想方式是很古怪的。

尽管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和瑞典都还是中产阶级社会，不过，我想，在瑞典进入中产阶层就意味着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这种说法是恰如其分的。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可能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定的收入和收入分配中占有一定的百分比，还意味着如托马斯·曼的自传体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家庭所具有的习惯和潜意识的偏见。在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戏剧中，你可以看到在紧张的冲突、犯罪和虚伪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阶级的特征。除俄罗斯外，在19世纪这个伟大的小说时代，从·J·奥斯汀到G·艾略特，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都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反映了那样一个社会的习俗。要理解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差异，美国的例子是很有启发性的。很久以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富豪统治的社会。只要有钱，到哪儿都可以很快跻身入高贵者之列。我以我妻子的家庭举个例子。她家有一个靠遗产节俭度日的老处女，直

^① 狄斯累利(1804—1881)，英国的政治家及小说家。

到她临终前，那份遗产还保留完整。这类事情在欧洲很普遍。而在美国，除了新英格兰和旧日的南方，这种情况就非常罕见。

现代生活的腐蚀

当我把瑞典描写成一个在 1950 年就已经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时，我想着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生活一直在暗中腐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骨头和软骨。一个到斯德哥尔摩的访问者往往会受到这种腐蚀。在瑞典，访问者预料会碰到比其他任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多的正规礼仪——鞠躬，握手，欢迎词，对美食的谢意，鲜花，糖果以及对女主人的感谢。只有在日本，才会碰到如此繁杂的礼仪。不过，我的观点是，访问者每隔五年去一次瑞典，就可以注意到这种礼仪会不断衰败，至少在操守这些礼仪的严肃性方面是如此。在上星期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周期间，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致欢迎词时不是这样原谅自己的：“本来按习惯我是该发表讲话的。不过，现在就不必了。”然而，很显然，这与他本人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倒是想更多地表示一番诚挚的欢迎的。

我认为，人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表落，看来最终可归结为两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是富裕本身。当我的一位比利时熟人从纳粹占领区监狱出来，发誓要生十个孩子时，他的父亲吓呆了：“我们世代代都很节俭，可你们这一代要完全抛弃我们的节俭习惯。”在一个富裕社会中，避免重新跌入贫困深渊的节俭不再是必要的了。

导致中产阶级价值观腐蚀的第二个原因看来是高等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首欧很流行：“当他们已经见

到过巴黎，你怎么可能再把他们束缚在农场上？”我还想问一句，如果他们已经到过耶鲁或乌普沙拉，你怎么再能使他们在辛辛那提和哥德堡制造和出售肥皂时也感到幸福呢？”

我们只来考虑一下瑞典的中立这个古老的问题。20年前，所谓中立的含义是很清楚很明确的。一个在拿破仑时代最后一次看到战争的国家，即使战争是正义的，也不愿卷入。如今，情况是多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由越战（不管那场战争有多坏）所引起的突变的一种反映。早些时候，敏感的有良心的人士会强烈反对英国发动的英布战争和希特勒迫害少数民族的行为。然而，在那时，反对的意见只是私人良心的反应而已，而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主题。

代沟问题使这些变化更加突出。年轻一代的文化总是趋向于预示普通文化的变化方向，这不仅是因为年轻人会成长，还因为人们在年轻时较少拥有以往社会模式中的既得利益。让我用我经历过的一件小事来说明一下看来还在继续发生的这些变化。去年12月，负责出版我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瑞典文译本的出版商招待我吃了一顿美餐，我问他：“为什么你要找麻烦搞一个瑞典文译本？所有受过教育的瑞典人都懂英语。”他回答说：“我们的学生正在把英语丢掉，比起上一代人，他们只是在到国外旅行所需要的口语词汇方面强一些，而一涉及语法和难以捉摸的词汇，他们对语言的掌握就大大退步了。这是因为他们不像以往那样在学校用功钻研了。”

我发现这种说法难以置信，但我问过周围的其他人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是这么回事。而且，他们使我确信，就是我这样一个基础教材的译本会使这种过程进一步加剧。对这样的回答，我仍然不能感到满意，直到有一个人为我提供了解开这

一难题的线索。“实际上，没有哪个人喜欢用一本非母语课本学习以应付考试。我读书时不喜欢，我父亲读书时也不喜欢。不过，今天的学生不想做的事，他们可以不必做。”

伯克利病症

伯克利病症，也就是剑桥、巴黎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病症，在到处流行。任何一个还能记起那些尊重他人而又沉默不语的斯堪的纳维亚经济讨论班成员的人，必定会欢迎这些变化。不过，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暗中破坏业已形成的处事方式。这种过程看来不会结束。许多在 23 岁时就加入到年轻人的新型文化中去的那些人，等他们到了 33 岁时，将会适应商业及职业生活的郊区化模式。尽管如此，若认为下一代中年人还会像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一样，是非常天真的。

社会遭到侵蚀的过程到什么地方会终止？最后，什么东西会留存下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可预测的办法。正像俄罗斯人正在明白的那样，一旦你允许社会结构松动，那就无法说出到底能走多远了。维多利亚时代以后的人早就得到了同样的教训。

在我看来，现在的时代完全可以与 19 世纪早期的那个时代相比。爱德孟·柏克为正在成为过去的封建制度而哀叹。而对杰里米·边沁及其他效用主义者来说，英国的习惯没有一样是不可侵犯的。他们问道，为什么女伯爵可以不受惩罚地侵占一个地区的公共土地，而那儿的妇女却要为了偷一块手帕而被吊起来？那些业已形成的法律和生活模式经不起如此的推敲。

现在，人们提出了同样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允许美国的

钢铁工业污染大湖？这不仅是人们问问而已的问题。有关部门永远可以对超越企业范围的外部影响制定规则和分区管理。现在，《耶鲁法律评论》能够严肃地提出建议，要求不再允许通用汽车公司每年更新汽车式样，尽管这改进对该公司的长期利润是有益的，而且它的少数几家大的竞争对手也可采取同样的方针。确实，不存在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随便哪一天，拉尔夫·雷德都可能会来敲你的门。他会用公众意见的力量迫使某公司做它一向认为是在它自身处理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不仅如此，法律的力量会严厉地紧跟在公众意见的后面。公众需要检察官的保护；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董事长逐渐认识到，在他的私人参谋人员中，需要有一个新文化的代表，以便为他事先预告下一次龙卷风可能刮起的方向。

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基本是中肯的，那么，这些思考对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是如此富裕，又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我们的物质进步速度能够逐渐减慢而不带来任何革命性的后果。我们将只是朝着更富裕的目标推进得稍慢一点。

很可能，瑞典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瑞典经济在继续增长，其速度并不落后于与它处于同等地位的美国。与日本、意大利或联邦德国比起来，它可能会发现它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削弱。它可以自我安慰：将来也会轮上那些国家在富裕中停步的。不过，很可能这种自鸣得意的境界对一个小国家来说并不真正适合，因为它没有福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卓越的物质成就归功于它的独创性及新教伦理基础之上的勤

奋。

我最近从瑞典访问回来，在《新闻周刊》及其他地方写道：瑞典这个福利国家包含有某种奇迹般的东西，很难使人相信，存在着这么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立法上的平均主义与高生产效率、计件工资和其他刺激机制同时并存；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微调与对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及全体警觉的选民对政府的民主制衡的积极保护同时并存。

自从发生像专职人员、白领工人的罢工和反叛那样的事件以来，事态的发展表明，那种社会确实已经好到不真实的地步了，而且，不久以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致性会渐渐消失。对瑞典，这很难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不过，我知道，要是整个世界都向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看齐，那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想起像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教授那样敏锐的批评家提出的批评。罗宾逊夫人脱离了她自身的社会，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希望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有所放松，现在她把视线转向了中国和朝鲜。在她的所有文章中，我记不起有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任何评价，而这种模式一直存在于我们这一代美国经济学家的头脑中。

“社会主义”这个词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纳塞尔和恩克鲁玛在他们的旗帜上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愿望没有给每个盘子都放上鸡。瑞典能够依靠平衡行为在社会再分配的框架下取得迅速的技术进步，一旦这种平衡行为丧失了其原有的作用，那么，在这下面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灾难？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恐怕墙上的阴影不是列宁或毛的极权主义革命，也不是维多利亚女皇或柯立芝总统自由经营的故态复萌。我敢说，阿根廷模式是这样一种典型——没有一

个现代人能面对它而不口中念念有词地在自己的胸前划十字：只有靠上帝的恩赐。

在 1945 年，没有一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会预料到像阿根廷或智利那样的国家在以后的 1/4 世纪没能取得迅速发展。那时，这两个国家都具备适宜的发展环境，可以说正处于飞速发展的起点上。然而，即使不考虑人口的突然膨胀，他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几乎一直为零。这个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一直把阿根廷发展的停滞归罪于庇隆的日子早已过去了。而曾被称为拉丁美洲的瑞士的乌拉圭并没有独裁者，但也没有能够取得经济增长。

这是为什么？我怀疑答案非得到民粹主义的民主中去才能找到。如果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已经享有这样的政治权力——即在一代人中纠正生活的不平等和少数特权阶层靠大部分人的血汗过着舒适生活的现象，那么，工业革命能够继续是很值得怀疑的。其结果就不会是像丁伯根教授或弗里希那样的人掌握下的合理的计划经济，而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货币工资年增长率高达 40% 的经济了。这样的话，结果很可能与我们在拉丁美洲国家所见到的那些情况非常接近。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而在政治上却发展得很完善或者说已经过头了。

熊彼特的预言

罗马不是在一日之内建成，也不是在一日之内衰落的。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现实危险——在今年或以后的 10 年中，瑞典、加拿大或美国会走向拉丁美洲式的萧条。30 年过后，再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现在的时代，很可能只有明智的社会观察

家觉察到了我所描绘的那种过程已经开始。30年前，我的年迈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曾经预言，正是混合经济的成功使得它一开始就背离了它的初衷。他的判断不合时宜，完全错了，甚至是非常错误的。但是，现在漫步在普林斯顿、斯德哥尔摩或多伦多大街上的人，谁能否定他的预知呢？

重访日本 1971年11月15日

12年后第一次重访日本的感觉是极其强烈的，尤其是此刻正处于日美关系危急之际。

林肯·斯蒂芬斯有句话可以解释为：“我看到了过去，而过去是成功的。”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勿需赘述。上帝的压榨机在榨取10%的利润时是运转神速的。

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号经济大国。无疑，在本世纪，它将超过苏联。到2000年，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超过我们，就像我们超过了1800年时的经济冠军英国一样。

日本人将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称为“尼克松冲击”。企业调查表明，对衰退的恐惧心理比我以往所见到的更为强烈。

我认为如此绝望是过分的。一旦日元对美元比价提高15%，更有能力的日本出口商们将能掌握住他们在世界市场中的那些份额。也就是说，如果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他们沒有特定的进口限额目标，那他们是有竞争力的。

一个柯立芝式的世界

在日本，我像是被带回到了20年代孩提时代的世界。这里有一种火车按时开动式的民主；是一个人们跑着赶时间

的社会——注意，是跑，而不是走。

日本和德国公民被追求荣耀的领袖们引到了军事失败的灾难境地，但最后他们还是从国家和政治的战争创伤中走了出来。一个有能力的日本青年不再梦想进入外国人的服务业或到军队服役。他像 1925 年时的耶鲁毕业生一样，希望在自己的庭园里耕耘，换句话说，他想发财。他的妻子希望拥有三大件——汽车、彩电和空调。而且，她正在得到这些东西。在日本，甚至农民也很富裕。这些都显示了对一个贫穷国家而言节俭和 10% 的增长率所能带来的东西。

凯恩斯说过，一个人对其钱袋施行暴虐比对其邻居施行暴虐要好，也许他的说法是对的。一个从火星——或者金星——上来的不知道战争和偏见历史的人，很可能会将德国和日本列为战后世界两个最体面的社会。

问题是，世界其他地方能够负担像日本那样的增长吗？还有，日本人能在下一个 10 年中继续按他们过去所坚持的那种模式发展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问题。

贫瘠之乡便是制止邪恶之地，
财富聚集之处便是人类腐败之所。

东京又脏又乱。只有日本人能够在那里生活。纽约人只会把在东京住上一个月当作一种刺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京可能是污染最严重和最拥挤的地方。

而这不过是一个忽视社会经常开支资本的典型例子，而且，这种现象还会在一代人中继续下去。人不能单靠收音机

生活。一个政府如果关心车行道甚于人行道，是不会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费用需要的。

我不必夸张，平均寿命——作为检验繁荣是否遍及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标志——在日本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我们的一般水平。

白色人种构成的危险

日本不再是一个贫穷的亚洲国家。它是能够提供它所忽视的住房的。如果现在尼克松冲击能使她的经济转向国内，这倒可以被证实是一大幸事。

实际上，日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按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要求，日本在70年代的增长必须达到160%，而我们国家与欧洲各国只需达到60%。为了保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它的出口维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9%的水平上），日本的出口增长速度非得达到其余国家的三倍。

既然日本在贸易总额中已经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份额，那么，它想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是否真的可行呢？

日本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这里面有更深的的原因。我们不再蔑视日本人，把他们看成是只会做做圣诞树上劣质装饰品的民族，而是把他们视为超人。他们的成本之低和精度之高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永远无法与之竞争的。实际上，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而且在经济方面，我们必须与丑恶的种族主义作斗争。

下一次，我必须回过来谈谈大家都不愿谈论的自愿和强制的限额问题。这是尼克松总统的专门小组——大名鼎鼎的斯坦部长和他的副手——正在努力强加给纺织、钢铁、汽车和

电视机进口的一项政策。目标是对准日本人的，但刀子反过来也会割我们自己的喉咙。

两个成功的故事 1981年3月9日

人们研究病理学是为了有助于学习那些对身体健康有用的课程。我们不乏经济失败的例子。比如：撒切尔政府前后的大不列颠；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倒退；还有，就在我们周围的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问题。

人们也可以离开病房，退过对已被证实是成功的生活例子的观察，学到有关身体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不是说我们应当相信由那些喋喋不休的老寿星所提供的每一个长寿秘诀。相反，在评价声称是成功的例子的时候，对可检验事实保持某种怀疑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经济成功的例子？人们经常会想到日本。美国人想接受日本成功的事实，但又嫉恨日本人的机灵、干劲、聪明和节俭。我认为，在这儿无需再对恐怕已成神话的日本经济的成就添枝加叶了。

奥地利和挪威的经济成功不像日本那样闻名遐迩。当美国人正在权衡是否遵循里根的愿望，回到市场资本主义那儿去时，他们的例子显得格外有意义。

奥 地 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哈布斯堡皇族的统治发生分裂时，小小的奥地利看起来像一个被截去四肢的病人。据说，那时奥地利在拚命挥霍它的资本。阶级斗争正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这种法西斯主义是最初在奥地利内部滋生，后

来由纳粹分子盛行起来的。

二次大战以来，奥地利的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克的执政党名义上是社会民主党，而实际却是保守的。年复一年，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增长，甚至到了70年代还在上升。去维也纳旅行一次，你就会相信，那儿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确实维持在最低水平。

为什么奥地利会成功？一位高级官员向我解释道：“奥地利确实干得不错，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出口给了英国和美国。”我不同意这种开玩笑似的解释。

奥地利和芬兰一样，生活在苏联集团的阴影下，其内部集团的分裂能得到缓解，是因为最近几年奥地利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另外，托马斯·卡莱尔坚持认为我们不应低估精明而受人爱戴的领导人布鲁诺·克莱斯克所起的联合作用。

因此，努力工作和节俭找到了创造缓慢进步奇迹的机会。尽管奥地利不是共同市场的成员，然而它却享受同联邦德国及自由世界发展贸易的种种好处，与此同时，它与它的共产主义邻居也有贸易往来。

挪 威

生为挪威人就意味着可以有超过75岁的平均寿命，可以享受儿童健康保健和教育，在壮年时可得到工作机会，退休以后还能获得与你工作时的生活水准相接近的收入。像我们都知道的存在于布朗克斯及西弗吉尼亚的贫困，在这儿确实已经绝迹。

同时，挪威人能够发表他们自己的见解：可以咒诅流产，

可以用漫画讽刺首相，可以参加共产党同时又保持在大学里的讲席或政府部门中的职位。此外，出了奥斯陆 20 分钟，就是一个第一流的滑雪场。

公平地讲，我必须承认挪威是一个民族单一的社会。如果它的人民像我们一样呈多样化，那么，由容忍及意见一致粘合起来的胶合板就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不过，如何来看待北海石油？事实上，如果没有石油所起的关键作用，你就不可能谈论挪威的富裕和进步。在那儿，还有更多的石油有待开发。

挪威人所面临的挑战

一个社会怎样利用它的机会，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英国有丰富的北海石油，这使它至今仍能保持英镑坚挺。另外，据说北海石油给英国人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英国人想要这个喘息的机会做什么呢？是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创造 1850 年曼彻斯特的市场刺激及由此带来的供方奇迹吗？

要是出现像荷兰的北海天然气那样的情况，挪威的特权阶层是否会赞同扩大的政府福利计划？他们是否能向沙特阿拉伯或伊朗学习，让石油在国内制造淘金热般的通货膨胀——顷刻出现百万巨富，而社会稳定遭受破坏呢？

挪威人现在正在争论这些问题。大卫·斯托克曼和杰克·凯姆伯可能会建议政府从石油买卖中摆脱出来；给每个公民发放石油发现所有证；并让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当挪威人在某个早上醒来感到头痛时，他们可能会怨恨自己，但自由是为了什么？

我怀疑这种观点在奥斯陆会有市场。